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

第一册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

内部发行

统一书号: 11017·41

定　　价: 0.51 元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

第一册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俄语编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Типография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Уделов

С.-Петербург 1905 г.

内 部 发 行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

第 一 册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俄语编译组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 3/8 101 千字

1978 年10月第 1 版 1978 年 10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417 定价：0.51 元

中译本序言

本书编者尼·伊·维谢洛夫斯基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汉学家”，1892—1912年间曾长期任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蒙语文教师。他发表的著作有《冒充商人霍罗谢夫的柳比莫夫1845年塔城、伊宁之行》(1909)、《俄国东方语言官方教学情况》(载《1876年彼得堡第三届国际汉学家会议著作集》第1卷，1879—1800年)等。编入本书作为主干著作的《历史纪事》，它的作者是沙俄派驻北京第八届传道团团长，俄国东正教会的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此人毕业于基辅神学院，曾在帝俄莫斯科大学讲授东正教教义和圣经。索夫罗尼于1794年来华，在北京住了十三年半，因侵华“有功”，回国后受到沙俄当局的奖赏、提拔。索夫罗尼死于1814年。收入本书的另一篇重要作品即《历史纪事补篇》的作者瓦西里·瓦西里耶夫(1818—1900)，1837年在喀山大学东方历史语言学系毕业后，于1840年随第十二届驻北京传道团来华学习梵文和汉、满、蒙、藏文。瓦西里耶夫曾将《论语》译成俄文，把尊孔与侵华紧密联系起来，颇受沙俄当局的赏识。归国后历任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的教授，1886年当选沙俄科学院院士。

东正教是沙俄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十七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侵略的加强，东正教的魔爪也伸到了雅克萨等地，在那里出现了第一批东正教堂，它们成为沙俄进行精神侵略的机构，直至沙俄被迫退出黑龙江地区才被彻底扫除。雅克萨战役之后，北京又出现一个东正教堂和一些东正

教徒，这是十七世纪沙俄侵华的产物。北京的第一批东正教徒是在雅克萨战争前后被清军俘虏、投降或投奔清朝的哥萨克，为数大约一百人，即俄国史籍上所谓“阿尔巴津人”。清政府允许他们加入旗籍，把他们安置在北京城的东北角，允许他们信仰自由，并赠给他们一座庙宇。他们就在这个庙宇里设立了东正教堂。此事引起沙俄当局的极端重视。于是彼得一世借口北京东正教堂需要神甫主持，经过和清政府多次交涉终于获得允许后，于1715年派遣第一个俄国传道团来北京。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缔结后，沙俄正式获得在北京设立教堂和派遣教士、“学生”来华传教学习的权利。1728年以后，沙俄每隔十年(后改为五年)改派传道团来北京，接替前届传道团。从1715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沙俄先后共派遣十二届传道团来北京。每届传道团以修士大司祭一人为团长，一般包括修士司祭二名，修士辅祭一名，加上学习语文的“学生”，共计十名左右。传道团的规模不大，但能量不小。它挂着宗教招牌，到处刺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机密情报，直接为沙皇政府效劳。驻北京东正教传道团的无数侵华罪行，是我们研究沙俄侵华史时必须予以认真清算的。

维谢洛夫斯基的《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这本书所收入的有关东正教的资料比较集中、完整，它们都是历届传道团成员的记事本和作者本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比较有用的有：(1)历届传道团成员包括教士、“学生”、监护官以及其他随同来华的非宗教人员比较完备的名单；(2)历届传道团派遣来华的经过，在北京的活动情况，包括对教士“学生”违法乱纪、腐朽糜烂生活比较真实的描述；(3)传道团的某些团长、“学生”和沙俄政府的特殊关系，为沙俄政府效劳的经历；(4)沙俄政府对传道团的“工作指示”等。这些对沙俄侵华史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各部分的作者由于教会内部矛盾，虽然也透露出一些东正教内部黑暗情况，但他们往往把东正教会侵略活动的内幕隐藏起来，讳莫如深。例如，1780年沙俄当局给第七届传道团的“工作指示”第九条规定，在华东正教士“应尽量把当地动态认真详细地写成材料上报”沙俄当局。他们是怎样执行这项“指示”的，本书没有任何反映。本书作者站在侵略扩张的立场上，许多问题在他们的笔下是被颠倒、被歪曲的。例如，本书把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的入侵叫做“猎人骚扰边境事件”；硬说雅克萨不属中俄任何一方；胡说“中国以武力威胁”沙俄逼签尼布楚条约等等。本书记载第一个俄国传道团到达北京的日期是1716年，但这是错误的，《异域录》(图理琛著)和《1619—1792年俄中外交文献汇编》(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两书都作1715年，应据此校正。另外，本书关于中俄两国围绕雅克萨的斗争和尼布楚谈判经过的叙述，也错误百出，所有这些都希读者参考时加以注意。

本书俄文原文比较难读，译校者在译校过程中，曾做细致的加工，付出辛勤的劳动，作为读者，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杨诗浩

1978年3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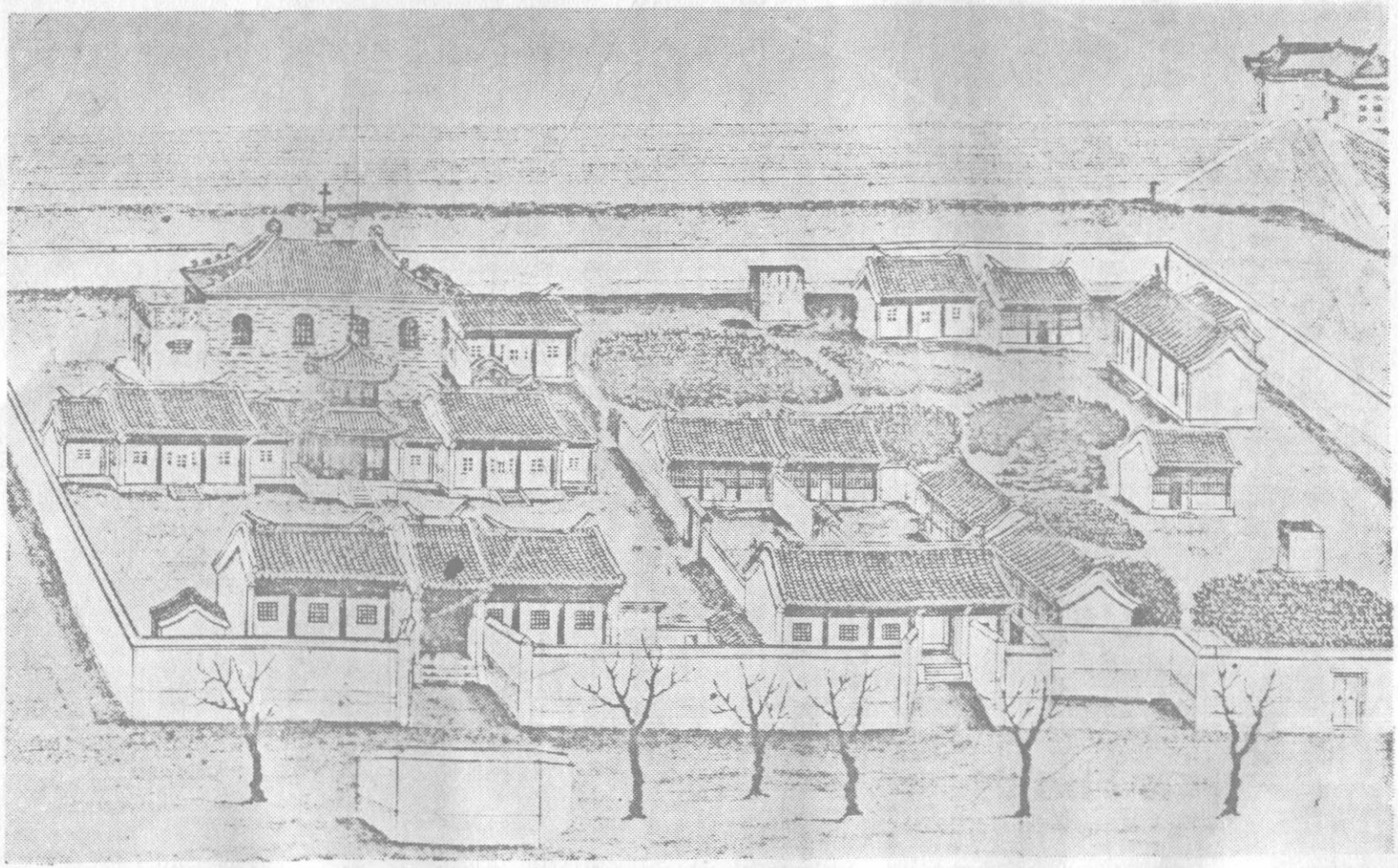
目 录

原书编者序 …… 5
第一部分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历史纪事 ……15
前言 ……15
第一章 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中国定居的问题 ……17
第二章 关于划分边界的简单情况 ……24
第三章(一) 关于阿尔巴津人被带至北京后的情况 ……26
第三章(二) 关于俄罗斯佐领 ……31
第四章 向北京派遣俄国传道团的原因 ……32
第五章 ……35
1. 关于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及条约缔结前俄国宗教人员在北京的给养情况 ……35
2. 关于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 ……39
3. 关于俄馆中的奉献节教堂 ……42
4. 关于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 ……43
5. 关于传道团团长拉夫连季 ……46
6. 关于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 ……47
7. 关于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 ……51
8. 关于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维特 ……54
9. 关于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 ……55
10. 关于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56
第六章 关于派往北京归修士大司祭管辖的宗教人员的简况及教堂辅助人员的人数 ……60
第七章 关于历届派往北京由修士大司祭管辖的学生人数 ……66

第八章　由俄国前来北京的信使……69
第九章　俄罗斯希腊正教在北京的早期情况　被俘的阿尔巴津人及其后代以及信奉正教的当地的中国人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对待正教的……70
第十章……75
1. 关于俄罗斯馆的仆役……75
2. 关于俄罗斯馆的专门记述……77
第二部分　对派至北京的传道团的补充记述……79
第三部分　瓦·帕·瓦西里耶夫所作的补充记述……82
第四部分　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前往中国京城北京的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的工作指示……89
第五部分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呈文节录……96
第六部分　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所著《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择录……102
附录一　俄汉译名对照表……111
一、人名……111
二、书刊名……118
三、修道院、教堂名……119
四、神职人员职称……120
附录二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第1—15届人员名单……122

帝俄考古学会批准刊行

书记　B·德鲁任宁



左图为北馆①，原为我国传道团所在地，现已不复存在。该图系中国画家所绘，现藏于亚洲博物馆。承卡·格·扎列曼②盛情将此图提供编者复制。关于北馆的布局，请看季姆科夫斯基所著《中国旅行记》第1册，1824年圣彼得堡版。——原编者

① 原址在北京城东北角，今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地。——译者

② 卡尔·格尔曼诺维奇·扎列曼(Залеман, Карл Германович, 1849—1916)，俄国伊朗学家，科学院院士，彼得堡大学教授。自1890年起任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译者

原书编者序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这个由于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原因而产生的1独特机构，曾经为俄国政府在与中国交往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我们在研究中国人民及其语言文学方面之所以能取得现有的成就，也与它有很大关系。因此，任何一份尚未发表的、但有助于弄清该传道团历史的资料，无论就了解历史而言，或者就了解风土人情而言，都必然要引起人们的兴趣。

第八届驻北京传道团（1794—1808年）团长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及北京之有俄罗斯希腊正教的情况报导》一书，就是这样一种史料。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这部著作早就为《西伯利亚通报》的出版者斯帕斯基所知悉。他在《俄中贸易和国事交往的早期情况及俄国教堂和传道团在北京的设立》一文中，就曾引用过这部著作①，并指出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还搜集了一些有关我国各届驻北京传道团的资料②。契尔尼哥夫教区至圣的菲拉列特·古米列夫斯基在其所著《俄国宗教文献一览》③一书中曾经指出，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记述了俄国各届驻华传道团的情况（系手稿）"。

后来有一段时间，这部手稿下落不明，其原因读了下文即可明了。修士大司祭尼古拉·阿多拉茨基为了撰写驻北京传道团的历

① 《西伯利亚通报》，1822年，第5册，第143页。

② 同上，第7册，第190页。

③ 见该书，第3版，1884年圣彼得堡版，第2册，第414页。

史概况① 曾经找过这部手稿，但遍寻无着，以致对是否有这部手稿产生了怀疑。这一点从下文中就可以看出来：

2 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在其所著《雅金夫·比丘林神父》一文中曾经指出，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记述驻北京各届传道团的著作（手稿）在北京传道团中并无人知晓，因此他怀疑人们是否把这部著作与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的著作混为一谈了，或者这部著作与也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是否就是一回事，或者就是1810年出版的《俄国圣秩制度史》第2卷中所载的那份北京修道院历届修士大司祭的名单和那一封公文②？

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在同一篇文章中认为，可能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提供了有关驻北京传道团的史料，这些史料由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编入1810年出版的《俄国圣秩制度史》第2卷。因此，他（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在其所著《雅金夫·比丘林神父》这篇历史研究性文章中说："契尔尼哥夫教区至圣的菲拉列特在其所著《俄国宗教文献一览》中有可能把大概是索夫罗尼所编的有关以往各届传道团的资料理解成为索夫罗尼的著作了。倘若如此，则这部著作就已印刷出版，而不再是手稿了。"③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在其所著《关于耶稣会教士的详细资料》一文（系以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的著作为兰本）的序言中曾经宣称，他还著有《阿尔巴津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及向北京派遣

① 《东正教驻华传道团二百年》，载《正教之友》，1887年2月号，第252—266页；3月号，第317—351页；4月号，第460—507页；5月号，第99—136页；6月号，第167—190页；7月号，第310—340号；8月号，第402—455页；9月号，第30—58页；10月号，第188—213页；11月号，第287—343页。又见《东正教驻华传道团二百年》，单行本（两卷集），1887年喀山版，第5—367页。单行本没有收入《正教之友》1888年1月号第148—156页所载的有关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历史的文献目录。这本学术著作只写到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那届传道团为止。

② 《正教之友》，1886年2月号，第168页。

③ 同上，第179页。

传道团的缘由》一书。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在其上述关于东正教驻华传道团的学术著作中，虽然也引用了索夫罗尼所说的这些话，但他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说："在外交部档案馆中没有发现这本书。根据以上所述的情况推论①，可以认为，这本书无非也是斯莫尔热夫斯基神父的著作的抄本而已"②。

现在对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著作的一切怀疑和猜测都应该消释了。

帝俄考古学会名誉会员、名著《佛教》一书的作者至圣的尼尔·伊萨科维奇曾于1838—1854年主持伊尔库次克教区。他在伊尔库次克发现了一些有关中国的文献。后来尼尔大主教调往雅罗斯拉夫尔城，他把关于俄国驻北京传道团的一部文集手稿赠给了考古 3
学会，并附有1858年5月16日第927号公函一件。在文集的扉页上有尼尔大主教的亲笔题词："有关中国及俄国驻北京传道团的历史纪事。大主教尼尔，1852年，伊尔库次克。"根据这项题词可以推断，尼尔大主教曾经打算发表文集中的材料，但不知为何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在雅罗斯拉夫尔，尼尔大主教在《雅罗斯拉夫教区公报》1861年第50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与主教英诺森·库利奇茨基的关系的短文，就是利用了他在这部文集中发现的材料写成的。

这部文集装订成一册，大小与普通书写纸一样，封皮是红色精制羊皮，封面上印有金色的基督受难处各各他③的十字架。考古学会收到这份赠品，当即交给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④

① 修士大司祭尼古拉想说的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利用了载于1822年《西伯利亚通报》上的修士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耶稣会教士在中国》一文。

② 《正教之友》，1887年11月号，第329页。

③ 各各他：耶路撒冷城外小山名。——译者

④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俄国汉学家，1840年随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所率领的那届传道团到北京学习满汉语文，从1855年任彼得堡大学教授，1866年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译者

审阅，他又特别增补了关于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驻北京传道团的资料，对这部文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正如一些学者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忘了把这部文集还给考古学会。文集到哪里去了，学会也无案可查。这部文集就是这样失踪了四十多年。瓦西里·帕夫洛维奇死后，他的继承人整理文件时发现了这部文集，才把它交还给主管部门。

这份手稿的第一部分系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及北京之有俄罗斯希腊正教的情况报导》及他本人所作的注释(手稿第1—88页)。这正是最近认为并不存在或已遗失的那部著作。索夫罗尼的这部著作写在兰色厚纸上，系出自文书的手笔，其上有不同的笔迹作的修改和增补。不知是谁还把记述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的第九届传道团和修士大司祭彼得·卡缅斯基的第十届传道团的资料作为附录列入了这部文集(手稿第88—91页)。

此外，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又增补了关于修士大司祭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的第十一届、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的第十二届和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卡法罗夫的第十三届传道团的资料。关于修士大司祭古里的第十四届传道团，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只是提了一下。由于当时已决定再由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卡法罗夫率一新传道团前去替换第十四届传道团，且帕拉季·卡法罗夫于1864年9月16日已由彼得堡出发，而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并未提及此事，可见他的增补是在这一年以前作的。

其次，文集中还载有：

1. 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1780年给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的工作指示(手稿第93—100页)。

4 2. 满清中国的省份、司法衙门、官吏、国家收入等一览表及其

数目①（手稿第101—107页）。

3. 嘉庆帝关于查办大学士和中堂②的谕旨（译自满文③，手稿第110—114页）。

4. 至圣的托波尔斯克大主教伊格纳季给司祭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信（抄件）④（手稿第117—121页）。

5. 一篇报导，内容为：（一）俄国人是怎样开始在中国居留的，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外国人难以接近的国度以及他们是怎样来的？（二）从何时开始派遣修士大司祭及其属下人员的，派遣的原因是什么？

这份报导写在普通大小的灰色书写纸上，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关于驻北京传道团的第一篇文章的另一抄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和拚写法与第一个抄本略有不同，文句也略有增补。所有重大改动之处都加了注解，并注明系**第二个抄本**所改。看来，这第二个抄本得以保存下来，要归功于尼尔大主教，页边上的某些批注可能也是他加的。

6. 一篇没有署名的呈文节录，内容写的是驻北京的修士大司祭在使中国人改信基督教时必须予以重视的困难⑤。

---

① 文集中没有这个标题。那里写的是《中国简介》。这里所用的标题是引自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标为己著的《纪事》（《正教之友》，1887年11月号，第330页）。这份资料现已无甚价值，故未收入本书。

② 指和珅。——译者

③ 这道谕旨系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以个人名义提供的。叶·费·季姆科夫斯基在其所著《中国旅行记》第2册第133—140页予以发表，并说明译文系出自修士大司祭彼得·卡缅斯基之手。

④ 这封信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在北京发现并交给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正教之友》，1887年11月号，第342页）。该信由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收入《俄国圣秩制度史》，1810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495—500页。《伊尔库次克教区公报》1864年第10期又根据该书予以转载。因此，尽管该信的抄本对已发表的版本作了某些修改，但本书亦未收入。

⑤ 这份呈文节录无疑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写的。可参阅《正教之友》，1887年11月号，第308、322页。

7. 修士大司祭彼得·卡缅斯基1826年2月5日用希腊文写的致伊尔库次克省省长(？)的信，内容写的是中国西部领土上发生的事件①。

8. 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所写关于驻北京传道团的一部书的摘录。

5 9. 一张汉字表，其上列有若干汉字，并注明按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发音，这些汉字如何读法。

10. 一本会话书，作者系托特马商人的儿子福马·瓦赫鲁舍夫(四开本，内有汉语原文，每行下面均有俄语译文)。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两篇著作已经在刊物上发表。《西伯利亚通报》1823年第1册中载有《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1808年从北京到恰克图旅行记》②。《皇家俄国历史和文物学会会刊》1861年第1册(第23—119页)载有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的另一篇著作：《关于中国(即今满清中国)的报导》。这篇著作也出了单行本。这篇著作是由H·C·舒金提供给《会刊》编辑部的。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在北京住了十三年半。虽然在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第八届③传道团的工作指示中曾经严令"一到中国就要努力学会使用他们的语言"④，但是索夫罗尼既不懂汉语，也不懂满语。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与其属下相处得并不和谐。根据第九届传道团团长雅金夫·比丘林神父的正式报告，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几年都不给其属下发薪，以示惩罚，"致使他们遭受极端的贫困。最后还把他们全都开除了教籍，不准他们参加圣事活动。大约有三年的时间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

① 这封信依据的是传闻，没有多大价值，故本书没有收入。

② 出版者在附注中指出："这篇旅行记是出自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的手笔。"

③ 应为"第七届"。——译者。

④ 《正教之友》，1887年11月号，第292页。

面”①。总的说来，雅金夫神父对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从俄国出发的时候，他(索夫罗尼)就没有具备任何足以胜任其职的才能,有的只是一直在北京伴随他的‘了无经验’。十三年当中,他根本就没有做任何事情,因此,他损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完全陷于固执和任性之中”②。

回国后，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将传道团的工作报告呈给了上级,并把一份关于他个人的著作的专门报告送呈外交部,为传道团没有取得多大成绩进行辩解③。

由于曾在中国供职，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得到了一笔奖金，并在他的病尚未痊愈时,就被派往莫斯科新救世主修道院任职,于1814年5月17日卒于该院④。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的著述借助于驻北京传道团第一位历史编纂学家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的研究成果到何种程度,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后者的著作尚未发表。不过根据本书引用的斯莫尔热夫斯基神父《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中的片断，可以肯定,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借助于其前辈之处甚多,而且他自己也没有隐讳这一点。 6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修士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的著作。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在其所著《中国北京修道院简述》一文中就已指出(可能是根据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的话):“当斯莫尔热夫斯基尚在北京时就写了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及曾在北京居住过的我国所有传道团成员的详史。不过,他所著的历史充满了对其同道的愤懑和

---

① 《正教之友》,1887年11月号,第323页。

② 同上,1886年2月号,第179页;1887年11月号,第323页。

③ 同上,1887年11月号,第324—330页。

④ 同上,1887年11月号,第342页。

攻讦之词，所以直到如今尚未发表”①。

斯帕斯基在发表《关于俄中贸易与国事交往的早期情况》一文时，也重复过同样的话：“该斯莫尔热夫斯基还在北京时，就写了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及曾在北京住过的所有传道团成员的详史。不过，他所著的历史充满了对其同道的粗野和讽刺的言词，所以直到如今还只不过是手稿，并未发表”②。

叶·费·季姆科夫斯基对斯莫尔热夫斯基的著作的评价是：“斯莫尔热夫斯基神父关于驻北京传道团的纪事在许多方面都是很有趣的，证明该修道士肯下工夫并有说俏皮话的本领。这些纪事还都是他亲笔所写的眞本，保存在驻北京传道团的图书馆里”③。

修士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的著作《耶稣会教士在中国》一书的一个片断已由斯帕斯基发表于其所办的杂志上，但未注明他是从何处得到这篇文章的，而只是在这篇文章后面对该文的作者加了一条这样的注释：“由于年轻，性好讽刺，部分地也可能是由于他所记述的对象本身的特点，所有这些使作者对在他以前的驻北京传道团成员作出了用词相当尖刻的评论”④。

修士大司祭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考证如下：“驻北京传道团历史的撰写者这个荣誉应属于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
7 基。他的著作在北京一直保存到第十一届或第十二届传道团（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后来传道团的某一成员得到了这

---

① 《俄国圣秩制度史》，第2卷，第480页。

② 《西伯利亚通报》，1822年第7册，第171页。

③ 同上，1823年第1册，第75页。《中国旅行记》，1824年圣彼得堡版，第2册，第29页。

④ 《西伯利亚通报》，1822年第8册，第198页。在同一页上还有斯莫尔热夫斯基的生平简介：他曾任基辅神学院教师，后来在莫斯科在去北京前由基辅索菲亚修道院修士辅祭晋升为修士司祭。从中国回来以后，被派往塞夫斯克修道院，并授予修士大司祭之职。1758年卒于该院。

部著作，并把它带回俄国，直到现在还在私人手中，因此不可能对这部著作作出评价。达尼尔神父曾经见过费奥多西神父这部著作，把它称之为《日志》。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具有按时间顺序记述的原始形式。根据作者近乎病态的性格，他所著的传道团史也具有笔调辛辣的特点，因此他描述的主要是正教传教士生活的阴暗面”①。在另一处，修士大司祭尼古拉把修士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的文章称之为“骂人之作”②。

凡能得到斯莫尔热夫斯基神父著作的人，无不借用其中的材料，但均未注明究竟哪些东西是属于这位作者的。因此，如果这部著作保存了下来，人们还是极其希望能把它刊印出来。修士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所侧重的那些阴暗面，现在当然不会使任何人感到难堪，更不会因此而抹煞驻北京传道团的功绩。斯莫尔热夫斯基神父所列举的那些细节，与其说是给这一机构罩上一层阴影，还不如说是对很久以前那段时期作了一个鉴定：当时外来文明的漂亮外衣仍然掩盖不住我们祖先的尚未开化的粗野性格。

编者认为有必要预先声明一下：在刊印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文章时，在拚写法和标点符号方面都不可能严格遵照原本。原因是，就拚写法而言，手稿并非作者的亲笔所写，而是出自文书之手，其拚写法没有始终坚持如一，而且有不少地方作了改动，字母 ю 和 е 大都写反了（例如：*ослеплюны*③）；就标点符号而言，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打标点符号的地方，与我们现代的打法有所不同：他往往用逗号把谓语和主语分开，在补语的前后一定要加逗号，而从属句则常用句号与主句分开，等等。如果保留这些

---

① 《正教之友》，1887 年 7 月号，第 335 页。

② 《正教之友》，1886 年 2 月号，第 179 页。

③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ослеплены*。——译者

特点，怕是只会使读者感到困难，而不会使读者对一百年前我国人的书写法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

尼·维谢洛夫斯基

第一部分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历史纪事(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及北京之有俄罗斯东正教的情况报导)

前　言[1]

在我接到去北京的任命以后，我便怀着很大的希望想弄清下列问题:

一、俄国人是多早开始在中国定居的?

二、向中国派遣修士大司祭及其属下人员是从何时开始的?派遣的原因何在?

我到达北京以后，想弄清上述问题的好奇心使我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在送别我的前任以后,就设法在教堂里四下寻找，看是否在什么地方还留下一些记事本之类的东西，从中或许可以了解我所希望弄清的问题。我在档案室里未能找到这类记事本以后,就开始检查教堂各个角落，幸好在贮藏室里[2]找到了不少记事本。在这些记事本中,除记载了其他内容外,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北

① 原文此处无标题。这个标题是我们根据本书原文的目录加的。——译者

② 第二个抄本补充说是"在垃圾堆中"。

京定居和派遣修士大司祭及其属下人员一事也有所记载①，并未疏漏。这一发现促使我原来的愿望更发展了一步，即想写出一部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以及关于派往该地的宗教人员的情况的报导②。为了很好地安排我所写的报导，我除了从记事本记载的大量材料中挑选出我所需要的内容外，还决定将我所写内容的每一部分再分为若干章节。再就是为了弥补记事本原有记载不足之处，我又做了不少增添，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将曾任六等文官的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译自满文的俄译本③第10卷第153章的内容也加了进去。凡是记事本手稿和上述俄译本不同之处，我都作了注解；凡是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有疑问的地方，我都在相应的注解里，对某些汉语词汇或满语词汇的词义用俄语作了注释。

---

① 这里显然指的是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的著作。——原编者

② 第二个抄本作：《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清国定居的以及派遣宗教人员到北京的情况》。

③ 指《八旗通志初集》满文版俄译本。以下凡是提到满文俄译本或径作第10卷第153章的，都是指该书中所载的《郎谈传》而言。——译者

第 一 章 2

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中国定居的问题

第 一 节

阿尔巴津城建立在阿穆尔河①的北岸。这个城是根据在俄国人占领以前一直生活在那里的一个达斡尔酋长阿尔巴津②的名字命名的③。

第 二 节

俄国猎人为了猎貂来到了阿穆尔河，发现这里是一个盛产野兽和鱼类的地方，于是他们便攻占了阿尔巴津城。他们在修复该城以后，还修建了一座主复活教堂(后来这座教堂改作了修道院)和另一座以圣尼古拉的名字命名的教区教堂⑤。

---

① 即黑龙江。——译者

② 我国史料作：阿尔巴西。——译者

③ 在满文俄译本中，无论何处均未提到阿尔巴津城曾经住过一位似乎即以其名作城名的达斡尔酋长，但是处处都提到阿尔巴津城为俄国人所建〔第二个抄本补充说："满人称阿尔巴津为雅克萨和屯。(和屯：满语，即"城"的意思。——译者)阿尔巴津城的名字可不可能来源于阿列克谢·伊拉里昂诺维奇·托尔布津的姓。托尔布津曾任该城的军政长官，也可能是该城的创建人。"见《基廉斯克修道院志》第8页〕。

另一种笔迹写道："也未提到达斡尔诸酋长的其他城堡，然而哈巴罗夫的报告证实有阿尔巴扎、托尔恰、卡基列伊等城堡。帕尔恰切甫人现在还看到过这些城堡的遗迹。

④ 在记事本中没有说明在占领阿尔巴津城初期是由谁主持该主复活修道院的，主持了多长时间。占领该城的初期是否已经就存在这座修道院。另一种笔迹补充问道：猎人们到过阿穆尔河沿岸的哪些城镇？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只好满足于现在的报导。第二个抄本接着写道：1665年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拉夫连季·阿夫杰耶维奇·

第三节

3 俄国人占领了阿尔巴津以后，有一部分俄国人仍重操旧业；其他的人则开始在阿穆尔河捕鱼，不过他们也没有忽视种庄稼。由此处起，我将把我所记述的猎人称为阿尔巴津人。阿尔巴津人在打猎时同与俄国边界毗连的索伦族猎人和其他部族的猎人起初常常发生争吵，后来就发展到斗殴，而斗殴又往往以杀人告终。俄国人常常把索伦人猎获的黑貂和狐狸抢走。这些放荡不羁的俄国猎人，虽然非常明白他们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并且也不知道（由于没有划界）这一地区归何国所有，然而他们的粗野行为却丝毫没有收敛。他们谁也不怕，一味掠夺别人，干尽坏事。可是这也不足为奇。既然这些粗野之辈只知猎取黑貂和狐狸，他们当然只会如此行事。这些无知之徒把自己看作阿尔巴津城的统治者，他们之间的一切争端均由他们自己审理解决，一切事情均按他们自己的意思去做，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在仅凭愚昧无知来订立他们所喜好的种种规定的情况下，又怎能指望有什么良好的秩序可言呢？

奥布霍夫曾经来到基廉斯克视察该地的治安情况并最后征齐商品交易的什一税。7月24日夜间，当他乘船返回伊利姆斯克时，不知什么原因，有一伙人在波兰人或立陶宛人罗曼·切尔尼戈夫斯基的儿子尼基弗尔·切尔尼戈夫斯基的率领下，对他进行了袭击，并将他杀死在船上。这些罪犯由于害怕他们的罪行会受到惩治，因此他们商量好想逃往阿穆尔河附近的达斡尔地方，这是当时此类罪犯通常避难之所。此后不久，他们真的逃跑了。这些罪犯在离开基廉斯克城堡时，还强行带走了修道院院长叶尔莫根。这样，叶尔莫根在1666年就和上述逃犯生活在一起，住在这些逃犯在阿穆尔河畔所建的阿尔巴津堡。1671年，叶尔莫根征得阿尔巴津全体哥萨克的同意，在阿尔巴津上游不远的磨刀石地方，为仁慈的救世主修道院奠了基，后来该修道院即由他建成。那时，在阿尔巴津还修建了一座主复活教堂，这也应当归功于他。1685年，叶尔莫根在经历了中国人对阿尔巴津的包围之后，就和别人一道离开阿尔巴津前往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译者），并且不幸地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已被摧毁，因为中国人当时在占领阿尔巴津之后，即将阿尔巴津城内及其附近郊区所有的俄国建筑物都付之一炬。（见《基廉斯克修道院志》第6、7页）。

第四节

当中国满清皇帝顺治获悉俄国人骚扰边境、为非作歹的消息后，于1645年，即统治中国的第一个满清皇帝在位的第二年，派中国军队去攻打阿尔巴津人。这支军队打败了阿尔巴津人，捉了几名俘虏，并把他们带到北京。至于阿尔巴津城，当时并没有毁掉①。

第五节

1676年，即康熙十五年，阿尔巴津人又骚扰得很厉害。为了再将这些制造骚乱的人从阿尔巴津城驱逐出去，中国军队又奉命出征。这些制造骚乱的人在优势兵力面前尽管暂时安静了下来，4 可是他们并不愿意离开阿尔巴津城。因此，一看到中国军队撤走，他们就又重操旧业了③。

第六节

当康熙皇帝获悉罗刹④照旧仍在为非作歹时，他就作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毁掉阿尔巴津城之外，其他办法都不能根除这一祸

---

① 阿尔巴津人首次被俘是在中国第一个满清皇帝顺治即世祖（康熙皇帝的父亲）在位的时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那时究竟有多少人被俘，却并不清楚。在第10卷第153章第139页上写道，康熙赞扬都统郎谈及其同僚说："彼等击破为敌四十年之俄罗斯人，并攻克其城雅克萨和屯（阿尔巴津）②。"康熙是在什么时候说这番话的？是在他在位二十四年的时候。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统治了十八年。由此可见，阿尔巴津人是在清世祖在位第二年的时候被俘的。因此，从俄国人在北京定居开始到本年，即1805年，已有一百六十余年了，而那时距俄国人征服西伯利亚的时间已有五十八年，因此不难想象当时在西伯利亚已有很多俄国人，他们是有机会到阿尔巴津去的。

② 此处是按俄文译出的。在《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中这一段的原文是："……破四十年盘踞之俄罗斯于数日之间。获雅克萨之城，克奏厥绩"。——译者

③ 可以满有把握地断定，在中国军队第二次进攻阿尔巴津时，又有一些阿尔巴津人被俘。

④ 罗刹：满语，意即俄国人。

害。因此，在过了九年以后，即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谕令上述都统郎谈率领几名同僚和三千名士兵，装作似乎是去达斡尔林区捕鹿的样子，前去攻打罗刹(即阿尔巴津人)。同时康熙还谕令郎谈不要杀害任何一个罗刹；如果他们表示归顺，并自动撤离阿尔巴津城，则应保障他们的安全。郎谈到达杭屋莫之后，就派遣费奥多尔①等三人持康熙皇帝谕旨到罗刹首领叶尔涅希②那里去，然而费奥多尔等此行并未收效，后来郎谈就亲自率兵前往阿尔巴津。在抵达该城近郊后，郎谈即敦促上述罗刹首领叶尔涅希归顺，但是从叶尔涅希那里所得到的，除了粗鲁无礼的顽固拒绝外，没能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因此，郎谈只是察看了阿尔巴津城和地形，便返回兵营去了③。

第七节

在进行了这样的谈判之后，双方即展开了激战。阿尔巴津人的勇敢精神，在很长时间内都不逊于满洲人。如果都统郎谈没有想出三面烧城的主意，满洲人要取胜可能是大成问题的。当满洲人开始烧城时，罗刹的首领们④看到自己的城堡已经处于危急之中，而且自身也大祸临头，于是就向满洲人投降，并请求他们宽

---

① 费奥多尔是一个俄国人，在满洲人两次进攻(阿尔巴津)中的某一次被俘并被带到北京。

② 叶尔涅希，我认为就是阿尔捷米，这是因为这个名字译成满文时，其中有几个字母译得不正确的缘故。

③ 此处是按俄文译出的。在《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中这一段的原文是："五月二十日，兵至杭屋莫，先遣费咬多里等三人往雅克萨城，遵旨谕其酋长厄里克什。

二十二日，至雅克萨城，呼其酋长，谕以：'皇上好生，不嗜杀戮'等语。罗刹负固，出言不逊。郎谈同官保、班达里沙、公彭春等，周览其城，环视地势还营"。——译者

④ 第二个抄本加了一个附注：中国人通常总是把和他们打仗的对方将领称之为首领或匪首。因为不管是谁，不管是他们本国人，还是别的独立国家，只要同中国打仗，统统都被他们说成是叛匪。

恕①。不知那时阿尔巴津总共有多少居民，但在该城被围时，根据上述记事本的记载，该城有一百五十一人。阿尔巴津人看到敌营中已有自己的同伴，又看到对方兵力雄厚，所以非常害怕此时如不自动投降，就会遭到必然覆灭的下场；而且他们还设想，如不抵抗就投降，也许会得到中国皇帝的赦免。于是他们便听从了叛变投敌者的话。就这样，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武器都集中起来，运至指定的地点。郎谈收缴了武器以后，即下令烧城。当人们从教堂里抢出圣像和圣经时，他并未阻拦。城被焚毁以后，郎谈就开始询问每一个俘虏，问他愿意为哪国君主效劳。当一部分俘虏表示仍愿作本国君主的臣民时，郎谈即下令将这些人同那些愿意为中国满清皇帝效劳的人分开。俘虏中愿意返回俄国的有一百零一人，而愿意归顺满洲人的有五十人。郎谈了解了每个阿尔巴津人的愿望以后，对这两部分人分别作了如下的处置：愿意返回俄国的，由于他们忠君爱国，郎谈把他们带到北京去了；而那些愿意归顺中国皇帝的人，郎谈则把他们遣送到满洲的奉天②，并下令把他们分配到各个地方去种地③。郎谈都统对他们说，你们既然不忠君，不爱国，那你们还会忠于谁，热爱谁呢！因此你们不配享受国家的良好待遇。于是，这五十个人非常后悔他们上了当，只好到指定的地点去了。郎谈还

5

---

① 在记事本手稿中，对于中国人战胜阿尔巴津人的经过所作的如下的描述，我认为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曾经有五个人，即斯捷凡、阿加方、雅基姆、塔塔林，还有一个不知是谁（记事本中只提到三个人的名字，没有提到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在投向满洲人以后，就开始劝说其他阿尔巴津人，要他们不要去冒风险，不要再对抗优势的兵力。如果他们还珍惜自己的生命，就应该放下武器，归顺围城者。只要他们按照这样的忠告去做，不仅可以得到宽恕，而且自己愿意到哪里去，还有完全的自由。"

② 第二个抄本作："遣送到墨尔根④或奉天"，并加了一个附注："墨尔根城位于阿穆尔河的南岸。阿穆尔河，通古斯人称为石勒基尔河，满洲人称为萨哈连乌拉，汉人称为黑龙江"。

③ 第二个抄本在这里加了一个附注："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留在北京的俄国俘虏被编成半个连，另半个连被送往满洲，这些人至今仍在那里"。

④ 今嫩江县。——译者

把阿尔巴津人强行掳去的索伦人和布哈拉人释放回家①。

第八节

在这里介绍一下阿尔巴津人被带至北京后的情况虽然会是适宜的，但是由于清军还要攻打阿尔巴津人，因此，在这一节里，我想
6 先谈谈促使中国满清皇帝第三次派兵攻打罗刹的原因。雅克萨和屯被毁之后的第二年，理藩院的一位名叫满丕的郎中向康熙皇帝具奏说，他抓到一名罗刹，这个罗刹声称，他和他的同伴们又在阿尔巴津城旧址重建了他们的阿尔巴津城，用土把城墙垒得非常坚固。他们不仅在城里定居下来，而且还在城外种上了庄稼。康熙皇帝根据满丕的报告，再次命令上面提到过的郎谈带领以前的同僚和一支为数不少的军队去攻打罗刹②。郎谈到达阿尔巴津城附近后，又象上次那样秘密地派了几个人去劝说那些制造骚乱的人归顺，但是他们没有回答，却跑到城外四周挖好的壕边，用枪炮向满洲人射击。在(俄中双方)还没有就划分阿尔巴津城所在地方边界问题作出决定之前，他们一直未被打败。由于当时先皇彼得一世③陛下对阿尔巴津人在边界进行这类骚扰的情况已有所闻，考虑到这些盗贼以往的掠夺和蛮横无礼行为，因此决定同意中国满清皇帝关于划分边界的建议，但要以阿尔巴津为界。为此，特派一名专使向中国满清皇帝康熙报告彼得一世皇帝陛下的决定。康熙对彼得一世皇帝陛下的这一决定表示赞同，谕令(正如满文俄译本所

---

① 关于郎谈这样处理被俘的阿尔巴津人一事，在满文俄译本中根本未见记载，仅只提到有六十人被放回俄国，有四十五人被带往北京。然而关于有五十名阿尔巴津人被遣往满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其中有一个名叫列昂季的，就是由满洲调来为住在北京的俄国首席司祭当通译的，这个人后来就死在北京。

② 第二个抄本在此处加了一个注释："谁想知道此次进军的情况，可看同一卷第153章，但就我写本书的目的来说，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对此次进军情况详加叙述"。

③ 第二个抄本的注释说：时为彼得一世即全俄罗斯帝位的第三年。

述)郎谈率领军队撤离雅克萨和屯，等候俄国(**第二个抄本**在此处加了“划分边界的”一词)使者的到来①。

---

① 在满文俄译本第143页背面是这样记述的:“当时(即攻打雅克萨和屯时)郎谈还在城的前后动工修筑高大的炮垒,以便用大炮轰城;郎谈刚将炮垒修好,俄罗斯国王察罕汗(此为满语或蒙语,意为白帝)鉴于事穷势迫,便派使者前往中国满清皇帝处,建议下令解除雅克萨和屯之围,然后在边境划定地界”②。在这里,每一位明智的读者都会发现满洲人在明目张胆地大撒其谎。他们狂妄自大到了头脑发昏的地步,以致撒谎露出了马脚。在同一卷第136页他们的自我招供就戳穿了他们的谎言。在这一页上写道:“我们的军队将阿尔巴津城(城里居民最多不超过两百人,说得更确切些,没有这么多人)团团围住以后,从傍晚开始即向该城发动进攻,向城里开枪开炮,然而直至次日上午十时,仍然未能将该城攻下”③。由此可见,在郎谈没有想出火攻的计策以前,雅克萨和屯是不会攻下来的。所谓满洲人骁勇非凡原来不过如此!他们在没有放火烧城以前,竟不能用正规的战斗打败一伙聚集起来的猎人!他们还恬不知耻地把恐惧和胆怯这些字眼强加于这样一位君主,这位君主的神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震慑了整个欧洲,他曾勇敢地战胜许多称雄一时的著名的民族;而满洲人自己又怎么样呢?他们同一伙猎人一直打到最后也未能用武力取胜,这些满洲人当时并未攻下阿尔巴津,而是按照随后双方达成的划界协议,遵从他们的皇帝康熙的谕旨从阿尔巴津撤退了。关于此次会谈的情况,请看该书第153章第149页的记述。

② 此处是按俄文译出的。在《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中这一段的原文是:“郎谈又于城南、北二处,筑高台,架大炮,欲攻其城。台始成,鄂罗斯国王察罕汗因事穷势迫,遣使诣阙谢罪乞降,请释雅克萨城围,后即遣使来交地界。”——译者

③ 此处是按俄文译出的。在《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中这一段的原文是:“是晚,郎谈同官保、班达里沙等,分遣副都统雅钦、营门校尉胡布诺等,于城南进兵,设挡牌、土垄,施放弓弩,作欲攻之势。又令副都统温岱、护军参领瓦哈纳、汉军提督刘兆奇等,潜进红衣炮于城北攻之。又令护军参领博里秋、营门校尉乌沙、绿旗左都督何悠等,于两翼放神威将军炮夹攻之。又令副都统雅齐纳,镇守打虎儿提督白克进战船于城东南,以备水战。

攻至次日巳时,见城未能即下,遂令城下三面积柴,将焚城。其酋长穷迫,始遣人求降”。——译者

第 二 章

关于划分边界的简单情况

第九节

7 1689年，遵照两国皇帝的旨意，俄中双方的大臣们聚汇到一起办理划界事宜。俄国方面是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一大批随从人员；满清中国方面是几位大人①。郎谈及其同僚也奉命出席了这次划界会议。双方大臣们商定在离雅克萨和屯②和满营同等距离，即各距五俄里的地方举行会议。满清中国的大人们向我们的使节建议以勒拿乌拉③为界。他们说，这是因为中国的边界早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方大使阁下(关于这一点，如果相信俄译本翻译得正确的话)不同意这一点④。后来，于同年

---

① 大人：汉语，意即大人物。

② 原文如此，雅克萨和屯当系尼布楚之误。——译者

③ 勒拿乌拉：即勒拿河。

④ 满文俄译本是这样说的："当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同意满清中国大臣关于以勒拿河为界的要求时，郎谈就从森林里把军队调了出来。当中国军队刚一摆好架式进行恫吓时，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就立即求和，并用发誓证明自己的诚意"⑤。但是，这话谁愿意相信就让他相信吧！而我自己同中国人在一起呆过，我对他们有多么勇敢、有多么正直，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

⑤ 此处是按俄文译出的。在《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中这一段的原文是："七月初四日罗刹使臣费咬多罗等，至尼布抽城。约以初八日相见讲地界，去我营五里许，去彼城亦五里许，设帏幕见焉。是日，大臣尽衣礼服，从官尽锦衣佩刀相从。既相见，语其使曰：'里雅那江(即勒拿河。——译者)，原系我疆界。以此为界如何？'费咬多罗不从。次日议，又不成盟。

8月27日①在涅尔琴斯克缔结并签订了两国划界条约。随着条约的订立，猎人们骚扰边境的事件也随之结束，两国之间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划界会议结束后，我国大使即同满清中国的大臣们一道前往阿尔巴津。到达那里之后，就命令阿尔巴津的居民携带自己的家当立即撤离该城，返回俄国，不得迟延。居民们当即照办了。在俄国人离开阿尔巴津以后，双方大臣就开始拆毁该城的建筑物，于是整个城市立刻被夷为平地。阿尔巴津所在地，亦不归属任何一方了②③。

划界后，随即树立了一块石碑，碑上用俄文、拉丁文、汉文、满文、蒙文等五种文字刻上了两国所订条约的全文。这五种文字的 8
作用，就在于使这块石碑成为业已签订的划界条约的永恒纪念碑。

第三日，郎谈见费咬多罗语意不逊，乃密向诸大臣曰：'临行时，有密旨，令「相机而动」。今观罗刹，非以兵威勒之不可。今夜我潜率八旗与宁古塔劲兵渡江，设伏于其城近林谷中。天明，诸公试往讲之。从则已；设再不从，以兵威惧之，事可济也'。是夜，天未明，兵尽渡，伏于林间。侵晨，诸大臣仍至幕所，讲至日中，犹不从。郎谈因将上赐八龙纛，给八旗护军等执之，督众旌旗于周林谷中出入，以张声势。

罗刹等大惧，始乞盟"。——译者

① 此系俄历。公历为1689年9月8日。——译者

② 记事本这一段的原文是："当双方大臣前去拆毁雅克萨和屯时，猎人们曾进行反抗，然而他们没有能够坚持多久就被打败并作了俘虏，但他们这时已不是被当作俄国人，而是被当作叛匪看待了"。可是我并不相信这一点。我相信上面的记述。

③ 原文如此。根据《尼布楚条约》，雅克萨属于中国。——译者

第 三 章（一）

关于阿尔巴津人被带至北京后的情况

第 十 节

关于阿尔巴津人被俘以前的情况，我曾向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介绍过一些极其合适的资料，但对他们被俘后的情况，我除了记事本以外，已无法搞到其他资料了。就是这些记事本手稿，或者由于笔误，或者由于多处破损，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托上帝保祐，现一切已经整理就绪，谨此献给热心的读者们。

第十一节

阿尔巴津人被带到北京后，立即就被编入了满洲黄旗①。他们完全和满洲人一样受到尊重。给他们安排了住房，派了佣人，还规定每隔三年发给他们四时所需的衣服，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予他们为妻，还给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户人家的妇女。总之，康熙皇帝赐给了阿尔巴津人一切宽厚待遇。

第十二节

俄国人就这样在现今称之为满清中国的京城北京居住下来。他们来北京时，携带了教堂的圣像和圣经，同时还带来了他们在阿尔巴津时的司祭马克西姆及其妻小。阿尔巴津人来到北京后，一

① 第二个抄本补充说：中国话叫镶红旗②。

② 镶红旗，原文为：СЯНЪ-ХУНЪ-ЦИ。根据我国史书的记载，当时俄人被编入的是镶黄旗。这里俄语拼音可能不确。——译者

位中国大官将自己建造的一座庙宇赠给了他们，他们就把这座庙宇改为俄罗斯人住区的索菲亚教堂。这座教堂又称尼古拉教堂，这是因为教堂里有一帧由俘虏们从阿尔巴津带来的显圣者尼古拉的圣像，而俄国人对尼古拉圣像通常比对别的圣像更为崇敬的缘故。后来到北京来的俄国商队的全体人员都要到圣尼古拉像前作祈祷，而往返于教堂经常要使商队的业务活动停顿下来，因为他们要从奉献节教堂①步行到圣母安息教堂（即前面提到的尼古拉教堂的现名），而圣母安息教堂离俄罗斯馆将近七俄里②，所以在1732年劳伦茨·兰格任商队总管时，就把显圣者尼古拉的圣像迁到俄罗斯馆的奉献节教堂。现在这帧圣像还供在该教堂圣坛的左面。

第十三节 9

康熙皇帝赐予被带至北京的阿尔巴津人以三年的绝对自由，从而使这群猎人变得比野兽还要凶恶，他们成了一群强盗、酒鬼和不可思议的暴徒。一句话，他们简直放荡淫佚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关于俄国人胡作非为的种种恶劣行径，中国皇帝屡有所闻，尤其当他们动手杀害中国人时，中国官员更是频频上奏。然而皇上对此先是不置一词，随后却下了一道谕旨，敕令每个中国人都要尽可能地回避俄国人。后来，三年的期限过去了，阿尔巴津人如此有害的放任自由的生活也随之结束了。官家也不再发给他们衣服，还开始限制他们的行动。对那些早就应该予以处治的罪犯也着手惩办了。猎人们虽然看到自己的处境已发生上述变化，但由于纵饮无度，挥霍浪费，已变得赤贫如洗，然而又无处得到财物，于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死于饥饿，有些人则死于酗酒斗殴。因此，在短短几年之内剩下来的人也就寥寥无几了。

---

① 奉献节教堂位于俄罗斯馆（即南馆），在东交民巷。——译者

②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第十四节

助长阿尔巴津人腐化堕落的另一原因，就是清廷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赏给他们(虽然不是所有的人)为妻。既然是来自步军统领衙门这样地方的女人，又怎么能设想她们会是善良和诚实的人呢！步军统领衙门是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逮捕人的。这些猎人的妻子发现配予她们的丈夫都是些既不了解中国习俗，又不懂中国语言的人，于是就任意摆布自己的丈夫，眞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她们已经把自己的丈夫和财产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了。这些昔日的猎人现在看到自己脱下了原色粗呢外衣，换上了绸衣和棉布衣服，脱下了兽皮靴，换上了中国缎鞋，就得意忘形，以为自己简直是上了天堂了。他们虽然确实感到在北京过得很不错，但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处世，这是因为他们刚离开了自己的窝棚生活，而北京的环境却又是那样新奇的缘故。于是他们就只好完全依赖自己的妻子。这些做妻子的看到她们的丈夫全是些一无所知、对任何事物都不关心的人，所以她们不仅把持了房屋、财产，还把她们的丈夫本人也控制了起来。做丈夫的看到自己的妻子这样能干而又熟悉中国习俗，十分高兴，因此，他们就象对待老师那样地顺从她们。这些狡猾的女人既然成了他们的老师，就不仅教他们汉语和中国的风俗习惯，同时还向他们灌输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向他们解释说："你们出生在山里，和野兽一起成长，怎么能知道哪种宗教最好，应该敬哪位神灵呢？"每个女人都开导自己的丈夫说："因为你愚蠢，所以就体会不到你们来到此地后，皇上赐给你们所有的人的恩典。你们如不胡作非为，至今也许还能享受这种恩典。她们指着偶像①说，连皇帝本人也得尊敬它，向它

① 第二个抄本在此处加了一个附注："汉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家家都供的神像，而在满洲人的家里，甚至连任何神像都没有。众所周知，在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

磕头，何况全国人民都信它。你是一个在森林里长大的野人，难道你认为你比皇帝还要聪明？”于是，粗野的阿尔巴津人就不再与他们的司祭来往，完全按照妻子的话去做。他们严格地遵守中国的生活方式，不仅模仿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而且还信奉他们的宗教，处处都按他们的礼节行事。我们俄国的习惯是，母亲总是比父亲对自己的孩子照管得多一些，中国也是如此。因此，这些俄国人的孩子从襁褓时起就由母亲教他们崇拜偶像，而做父亲的因为害怕有违中国的行为准则，所以也不去过问。这样一来，他们的孩子在自己母亲的教育下，成了地地道道的偶像崇拜者。司祭马克西姆本人的孙子、费奥多尔的儿子扎哈尔，死于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还在北京的时候，而他从生到死也没进过教堂。他虽有一位受过相当的俄国教育的父亲，然而他死后遗体却由和尚①安葬。就连司祭马克西姆的儿子费奥多尔，虽然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儿子扎哈尔，但却不愿这样做。因此有很多人虽名曰俄罗斯人，但不仅其本人不愿领洗，而且也不设法带他们的孩子去领洗，因而后来几乎就没有一个人受过洗礼。

第十五节

人们这样不重视基督教也就使得俄国人非常蔑视他们的司祭。他们对司祭持这种蔑视的态度，可以由下述一事得到证实：康熙年间清廷曾命令俄国人出征。临出发时他们看到在自己就要去打仗的时候，而司祭却安安稳稳地呆在家里，因此非常嫉妒他。于是，这些俄国人全都起来反对司祭，强迫他和自己一起出征。当地的满洲人曾再三劝解，最后甚至还责骂他们蛮不讲理，但阿尔巴津人对辱骂他们的满洲人却回答说：“我们没有司祭怎么行呢？没有司祭我们怎么能上战场呢？”于是他们就把司祭的头剃光，只在后

① 和尚，在第二个抄本里解释为“中国的僧侣”。

脑勺留下一条象满洲人那样的辫子，带着他一块儿出征去了。后来，当司祭回到北京家里时，教民已寥寥无几。

11

第十六节

在被带到北京的阿尔巴津人中，比较富裕、对基督教也比较热心的人有：阿列克谢·斯塔里增（他后来因为丢失值俄国钱币五十卢布的银子而吊死在圣母安息教堂里）、担任过教堂堂长的涅斯托尔的儿子德米特里和一个名叫萨瓦的人。除了这三人以外，其余的阿尔巴津人中还有没有对基督教哪怕稍稍表示过一点好感的人，那就不得而知了①。

① 彼得大帝在位时曾派了一名使节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伊兹马伊洛夫从俄国来到北京，在他抵达北京以后，涅斯托尔的儿子德米特里和一些阿尔巴津人曾请求他把他们带回俄国。这位使节对他们的答复是这样的："把你们带回俄国？除非是要把你们当作叛国者押赴边界绞死，才能把你们带回俄国去。"

第 三 章 （二）

关于俄罗斯佐领[1]

第十七节

在第八节中提到，阿尔巴津人被带到北京后就被编入了黄旗。按照满清中国的排法，黄旗是第一旗，而把绿旗排作是最后一旗。为了便于管理起见，清廷还给他们那个佐领委派了一名长官。派去的长官的官衔和官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旗通常只由满洲人组成，阿尔巴津人在一切方面都得到了与满洲人同样的权利。管理俄国人的有时还是王公，虽然满清中国的“王”相当于俄国的大公，而“公”则相当于俄国的伯爵，但这些俄国人则通常把派来的王公称为百人长。

第十八节

在俄国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的事情，而在中国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虽然不完全如此和经常如此。俄罗斯佐领中如果有谁死了，他的儿子不能立刻被接受为俄罗斯佐领的士兵。要想使自己能补上父亲的遗缺，非花费很大力气和大量银钱不可。为此，必须向领催（五十人长）和其他五位副领催求情送礼，求他们把谋求遗缺的人推荐给主管长官，因为主管长官总是根据他们的推荐来批准谋缺者的请求的。

---

① 原文为 Русская Сотня（俄罗斯百人队）。我国史书上称为俄罗斯佐领，即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译者

第四章

向北京派遣俄国传道团的原因

第十九节

在这一章里，我打算暂且不谈阿尔巴津人对东正教的热忱如何以及被俘的俄国人中是否有人从定居北京之日起就象东正教教
12 徒一样行事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打算在叙述了这些俄国人的历史之后，在末尾处再谈，并将提及一些阿尔巴津人和被他们认作义子的中国人的名字。现在我来谈谈由俄国派遣传道团到中国的原因。

第二十节

前面提到的司祭马克西姆因年迈在北京去世以后，阿尔巴津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自己的司祭，他们也很少想到要不要司祭的问题。后来，眼看上帝大智大慧的神殿日渐倾圮，而又没有司祭，于是，在1710年，阿尔巴津人就向先皇彼得大帝恳求，同时还给当时的托博尔斯克都主教菲洛费伊·列辛斯基①写信，要求他鼎力奏请皇帝陛下派司祭到他们那里去主持宗教活动和圣事。

① 关于都主教菲洛费伊的情况在一些记事本中有如下的记述：当时他是全西伯利亚都主教，并且是相当闻名的。唯有这位至圣的托博尔斯克都主教和蒙古的格根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们曾经多次互赠礼物。格根隆重地接待过都主教派去的使者，还让这些使者带回书信。在这些信函中格根称都主教为：神父之长菲洛费伊神父。

第二十一节

托博尔斯克都主教菲洛费伊接到阿尔巴津人的请求书以后，不知通过谁给他们带去了一封复函，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司祭，可见——这位至圣的都主教提醒说——你们早已没有按照基督教教规生活了。"

第二十二节

在接到都主教的这封信后，前面提到过的德米特里·涅斯托罗夫和阿列克谢·斯塔里增以及其他一些人便上书给彼得一世大君主陛下，恳求他敕令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给他们委派一位司祭来。皇帝陛下从托博尔斯克都主教那里得知当时雅库次克的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的情况，于是就下令派他前往北京。除修士大司祭外，还要派修士司祭、修士辅祭和主教属下的教堂辅助人员随同前往。在此以前，陛下已敕令少校级商务专员彼得·伊罗季昂诺维奇·胡佳科夫将住在北京的基督教徒要求有本教的司祭一事奏闻康熙皇帝（第二个抄本在此处加了一句话：根据胡佳科夫呈给康熙皇帝关于俄国人上述愿望的奏折，康熙皇帝允准俄国司祭前来北京）。因此，托博尔斯克都主教（当时担任此职的已是约翰·马克西莫维奇）也就派了皇上指定的雅库次克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带领上述传道团成员前往北京。那时中国有一位名叫图理琛的使臣受康熙的派遣前去土尔扈特（卡尔梅克）的阿玉奇汗处。当这位使臣返回中国边境时，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也正好到了那里，他和满清的使臣图理琛会合以后，就和中国使臣一起来到北京，旅途一切费用均由清廷负担。随修士大司祭列扎伊斯基前来的俄国传道团成员计有七人，连同修士大司祭本人则共为八人。当时传道团中还没有学生。修士大司祭及其一行于

13

1716 年 1 月 11 日①到达北京。从这时起，满清中国的京城北京就住有正式的俄国宗教人员了②。

① 我国史书上作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715 年 4 月 30 日)。——译者

② 我从北京教堂档案里的一些文件中看到，俄国司祭似乎并不是根据阿尔巴津人的呈请，而是遵照康熙皇帝本人的要求来到北京的。这在发给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的驿马使用证上也有所记载。但我对此非常怀疑，因为中国满清皇帝是极端妄自尊大的，所以他无论有什么需要，也决不会向外国君主提出任何要求。与其认为他会向全俄罗斯君主友好地提出什么要求，还不如说他由于无知而向俄国发号施令。在第二个抄本中这条注释是这样写的："俄国司祭不是根据阿尔巴津人的呈请，而是象发给修士大司祭的驿马使用证上所注明的那样，系遵照康熙皇帝本人的要求派来的。康熙皇帝曾谕令自己的使臣们向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加加林说，他希望能在他那里见到俄国的宗教人员。"但我并没有找到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约翰·马克西莫维奇发给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的上述驿马使用证，所以只好从其他一些记事本中将有关的记述摘录于此。

第 五 章

1. 关于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及条约[1]缔结前俄国宗教人员在北京的给养情况[2]

第二十三节

如果只看俄国宗教人员目前的给养状况，是看不出从前康熙皇帝赐给他们的富裕生活的痕迹的。要是我沒有在一些记事本中发现有关清廷发给北京的修士大司祭和其他宗教人员给养的资料，那么我永远也不会料到他们还曾享受过如本节所述的那种待遇。修士大司祭到北京后，清廷就向他宣布了如下的令人愉快的消息：由官家发给他（修士大司祭）八百两银子，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六百两，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二百两，让他们用这笔钱为自己购置房产；还给修士大司祭七百两银子，给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五百两，给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一百五十两，让他们购买奴仆。理藩院每月还发给修士大司祭和其他宗教人员数量和现在一样的银两：按中国历法，大月发四两五钱，小月（二十九天）发四两三钱五分；对每个教堂辅助人员则每月发给一两五钱。此外，那时每隔三年还发给他们四季所需的衣服，每过五天就用数辆大车给他们送来鸡、鸭、鹅、羊等各种食物。总之一句话，所有的物品，甚至小到火柴，都是由官家供给的。所以，他们毫无必要上街去买东西，因为一切 14

---

① 指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译者

② 此处小标题是译者改拟的，原书仅题为："条约缔结前俄国宗教人员在北京的给养情况"。——译者

都给他们备办齐全了。[1]这种优渥的物质待遇，俄国宗教人员只是在俄中条约签订以前才享有，而自条约签订后，这种待遇就完全取消了。现在修士大司祭和其他宗教人员每月除了领取四两五钱银子，一点点谷物，还有官方免费供应他们食用的不太好的水外，再也得不到任何别的东西了。

第二十四节

康熙皇帝想使新来的俄国宗教人员对一切都感到满意，除他本人赐予他们恩惠外，还指派一位最亲信的大臣（将军衔）去关照他们。这位将军应该经常去探望修士大司祭，这样既可问候他的健康情况，也可了解修士大司祭和其他人员是否缺少什么，或者是否受过某人的欺负。这样的恩遇，除了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任何一位修士大司祭都从未享受过。那个时候，每当那位将军前来拜访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时，伊拉里昂可以不用走出大门，而只在堂屋里迎接他。他们按照满洲人的风俗习惯手牵着手相互问好。令人奇怪的是：过去达喇嘛[2]竟然能对极其傲慢的满洲人，而且是一个将军，采取这种态度，而现在即使是级别要低得多的武官也不仅不愿友好地对待达喇嘛，甚至都不愿和他谈话，除非是这位武官认为达喇嘛于己有利时才乐意和他交往。而在过去，一个将军在达喇嘛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的情况下，却能以如此友好的态度来对待他。因为就满洲人的风俗来说，手牵着手就意味着平等和友爱。

---

① 第二个抄本由此往下还有一段记述："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未发现一份材料，说明从何时起清廷就不再这样宽厚地对待俄国人了。不过我根据亲身的经历知道，现在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修士辅祭每月除了得到四两半银子外，就只能领取三小斗当地产的大米；而学生每月只领到三两银子，教堂辅助人员只领到一两半银子，再就是味道不佳的井水。除此之外，再也不供给别的什么东西了。"

② 达喇嘛意即"大喇嘛"，这是中国对传道团团长的正式称呼。——原编者

第二十五节

15

当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在北京的时候，他每次外出都有两个人骑着马在前面开道，马车两侧还各有一人骑马护卫。此外，每次出行他还带上好几名教堂辅助人员。修士大司祭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常以这种排场来显示自己的体面，因为这种气派的马车在中国人那里是颇受尊敬的。由于修士大司祭列扎伊斯基来北京时极为富裕，特别是他自己带来了大量皮货，所以无论哪个中国人到他那里，他都愿意结识，并非常慷慨地以礼物相赠。中国人看到俄国达喇嘛这样慷慨大方，所以去得非常之勤：有时亲自带去些普通的小礼物，如西瓜、水果以及其他不太值钱的物品，有时则让自己的孩子把这些东西送去。为此，修士大司祭也以狐皮和貂皮回赠他们。由于他为人慷慨大方，以致连自己的仓库钥匙也交给一位教堂辅助人员保管，自己财产的一切支出事宜也都托他办理。不久，当这位教堂辅助人员向他报告说狐皮和貂皮已全用光时，他也毫不在意，以为他还有很多银子。但他去取银子时，银子也所剩无几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财物已消耗殆尽，才开始过悭吝的生活，并亲手把手头所有的东西都锁起来。对于要做到不至由于手头拮据而中断同必须与之应酬的人交往，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神父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清廷发的给养虽很充裕，但也只敷日常生活之用。发的银两，其数量和现在一样，即大月（三十天）发四两五钱，小月（二十九天）发四两三钱五分。因此，要靠这点钱哪怕是接待最普通的客人，也是连想也不能想的事。至于俄国给修士大司祭规定的薪俸也不过一百卢布，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三十卢布，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二十卢布。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曾想建立一个由某个人作代表去理藩院领取银两的制度，于是就把派给他的通译叫来，让他到理藩院去，并吩咐他向那里的官员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一些报

酬，要求他们从中协助，好让达喇嘛一人去领月银，而不要让每个俄国人都去领。修士大司祭还说："因为我是传道团的团长，应该由我把银两发给我属下的每个人，不需人人都去理藩院领取。"当通译将此事告诉其他神职人员及辅助人员后，他们全都立即跑到理藩院声明说："理藩院给我们每个人都规定了薪俸，因此，我们的生活都是各管各的，而达喇嘛却想欺骗你们。"这样一来，理藩院只好仍象往常一样把银子分别发给他们每一个人。①

16

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神父看到自己无处可弄钱来接待客人和应酬他必须与之交往的人，而他的处境又要求他这样一位大司祭非和某些人进行礼节性的交往不可，加之前面提及的那位中国将军见他常常喝得醉醺醺的，也不再来访，他就更加伤心了。由于处境贫困，有时他就想去走访那些耶稣会教士，但他们甚至不让他进家门。因此他就借酒浇愁，狂喝滥饮，以致身染重病。病中，他曾到温泉去治疗，后来在从温泉返回住所的途中去世，②时为 1717 年③（即康熙五十七年）10 月 14 日。他在北京一共住了九个半月，于中国阴历九月十七日逝世。

他和他的属下人员相处得很不和睦。他被安葬在安定门和东

---

① 最糟糕的是：修士大司祭的属下人员在北京竟然放肆到甚至连全俄罗斯大君主给他们派来的上司也不予承认的地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派来的修士大司祭是自己的上司。因此，不管是什么事情，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也要跑到理藩院去控告，而且是控告自己的上司。他们这种行为当然就使中国人有理由鄙视和嘲笑俄国人。甚至连我在到达北京以后也听到一桩中国人嘲笑俄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嘲笑说："我们看到就连住在我们这里的九个人，他们的上司都无法管束，真不知道俄国的大臣们是怎样去管理自己的众多的部下的？"这种下级人员向满洲人控告自己的上司修士大司祭的事例，在列扎伊斯基之后，也屡见不鲜。即使是列扎伊斯基真象他的属下人员所说的似乎想独吞清廷发给他们的月银，但是在没有仔细调查他们的上司修士大司祭是否真的打算将他们的月银据为己有、也没有请示本国政府，并在自己的上司事前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擅自去理藩院向别国政府声明他们的得到正式任命的上司一点也不值得信任，还在外国当局面前称他为骗子，这样做是不是恰当呢？

② 第二个抄本补充说：终年六十岁。

③ 原文如此。按康熙五十七年系公元 1716 年。——译者

直门之间的墓地里。

2.关于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

第二十六节

俄中条约缔结后，在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死后十三年,即1729年，又派了另一名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前来补他的遗缺。但原定委派继任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职务的并非修士大司祭,而是主教。那么，原来决定派主教前往北京后来又撤销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后来要改派一名修士大司祭去,凡此种种,将在下一节里予以说明。

第二十七节

随同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一起到北京的托博尔斯克教区修士辅祭菲利蒙，在其上司修士大司祭死后，过了几年，向北京理藩院递了一份呈文,请求理藩院把需要一位新达喇嘛来继任已故达喇嘛的遗缺一事奏明中国皇帝。他还怂恿教徒们也这样做。理藩院接到辅祭的呈文后,遂将此事奏请中国皇帝圣裁。据此,中国皇帝降旨准许让该辅祭随带一名教堂辅助人员费奥多尔·别尔卡自费返回俄国。辅祭菲利蒙回国后到处造谣说什么康熙皇帝本人想领洗。当这个谣言传到俄国政府后，俄国政府就将此事奏明彼得一世皇帝陛下。不知是由于辅祭所造的谣言起了作用，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彼得一世皇帝陛下谕令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物色一名品德高尚的人，授予主教头衔后派往北京。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研究后认为，原在海军中服务的修士司祭长英诺森·库利奇茨基能胜任这一圣职和完成这一使命。于是英诺森就被提升为主教。在当时发给他的一道训令中将他的头衔写作弗拉基米尔和佩列斯拉夫利—扎列斯基两地主教。这道训令我记得是由彼得

17

一世皇帝陛下本人和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成员签署的。我在伊尔库次克期间还看到过这道训令。

第二十八节

出国时，至圣的英诺森主教奉命携带足够数量的与其主教身份相称的随从人员，其中既有神职人员，也有世俗人员，计十二名。英诺森主教领到上述数量的人员后，就到了边境地方，住在色楞格斯克，一直住到三等文官①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与满清中国的官员签订了一个协议②时为止。这个协议是在离恰克图不远的一条名叫布拉河③的小河旁最后达成的。在签订的协议中对派遣俄国神职人员前往北京一事还规定了一个条款，而且伯爵当时即向满清中国官员提出了派遣上述英诺森主教及其随员一事，要求准许他们进入中国。但是中国大臣们一听到俄国传道团由许多人组成，而伯爵又力争使传道团全部人员都能进入中国，就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主教得知有困难后，就同意带少量的人，只要中国让入境就成。正当伯爵考虑怎样做更有利时，前面提到的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当时任伊尔库次克主升天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却希望去北京，他千方百计搞阴谋，想使主教受到伯爵的怀疑。为此目的，他装作去办事的样子从伊尔库次克来到色楞格斯克，开始了他的阴谋活动。他打听到伯爵要到至圣的主教那里去的时间，就先到至圣的主教那里去做客，借长时间聊天的机会，灌了主教二杯伏特加酒。由于主教过去喝酒从未超过一小杯，因此他便喝得醉醺醺的，一下子睡着了。没过半小时，伯爵来了。至圣的主教得到通报后，勉强爬起来出去迎接。伯爵看到他神态异常，

18

① 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当时是四等文官，见《中俄边界条约集》。——译者

② 此处系指《中俄恰克图界约》。——译者

③ 即《中俄边界条约集》中的波尔河或布连河。——译者

认为他醉得很厉害，立刻就走了。普拉特科夫斯基得知自己的计谋很成功，于是又开始或者通过和伯爵亲近的人（为此，他还以自己的田产作为赠礼），或者通过自己的朋友，使伯爵对至圣的主教更加不信任。经过一段时间后，他的阴谋眞的得逞了，因为伯爵曾多次从为普拉特科夫斯基出力的人口中听到关于至圣的主教嗜酒这一虚构的事，而且有一次还亲眼看到至圣的主教醉酒的样子，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印象，好象主教经常酗酒，所以断然取消了派他去北京的决定①，改派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去北京。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生于基辅，曾在莫斯科神学院学习过诗歌和修辞，后来就从那里跟随至圣的菲洛费伊都主教到了托博尔斯克，在该地削发为修道士并被授予都主教手下的修士大辅祭之职。以后又被这位至圣的菲洛费伊都主教提升为修士大司祭并被派到伊尔库次克，在那里除管理自己的修道院外，同时还主管伊尔库次克教区的所有教堂（因为当时托博尔斯克副都主教瓦尔拉阿姆·科索夫斯基兼任伊尔库次克主教，不在伊尔库次克，接着又被提升为斯摩棱斯克的都主教）。在伊尔库次克期间，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发了大财，因此他于1729年6月17日靠中国提供的全部费用前往北京时是非常富有的。一路上都是由中国供给他和他属下的全体人员所需的车马和伙食。至于修士大司祭普拉特科夫斯基在北京是怎样生活的，都干了些什么和由于什么原因被押送回 19

① 我住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以后在圣彼得堡小住期间都曾听许多人说，至圣的英诺森主教之所以没有被中国放行入境，似乎是因为在通常是由枢密院写给中国理藩院的介绍信中称他为大人；但在我所找到的所有资料中，除了上述记载外，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英诺森主教未被允准进入中国是由于这一原因，因此我偏重于认为这样的一些说法是臆造的，而不是真实的。这种臆造和下述的虚构是类似的：我在圣彼得堡的时候也曾听到有关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的谣言，说什么他在边境被官家商队的总管八等文官格拉西姆·利勃拉托夫斯基拘捕。但是在边境时修士大司祭和商队总管之间除了进行过几次商谈外，再也没有打过什么交道。这是我确切知道的。因此我不知道这样的情节是怎样产生的。

国，这一切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都知道，因此我就不谈了。现在只说下面一件事：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到达北京时，那里只有俄国人住区的一座圣母安息教堂，还没有现在俄馆内的奉献节教堂，神职人员住的单人宿舍也还没有盖起来。修士大司祭安东尼就住在俄馆的客厅内，其他神职人员则住在别的地方。每逢节日和大祭日他们就到圣母安息教堂去举行祈祷仪式。这个教堂后来由于一次强烈地震全倒塌了，但在1732年，在劳伦茨·兰格率领的商队在北京期间又重新建起来了，同年8月5日在修士大司祭安东尼的主持下举行了教堂圣化仪式。这个教堂是被俘的阿尔巴津人按过去的办法大伙集资修建的。

3. 关于俄馆中的奉献节教堂

在我国外交事务委员会发给我的训令中第五条摘引了俄中两国所订条约有关条款，并提到由于大臣们的大力协助，在北京俄馆内建造了一座奉献节教堂。但究竟是哪一国的大臣，俄国的还是中国的，关于这一点我在所有的记事本中都没有见到有所记述，也没有听说过。而我根据所得到的资料确切知道，上述俄馆中的奉献节教堂是由中国皇帝出资修建，在1727年即在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到达以前开始动工，而在普拉特科夫斯基任职期间落成的。教堂圣化仪式是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主持的。圣像系从托博尔斯克运来，其中有一些是在基辅画的。至于其他的圣像则是在北京由耶稣会教士施洗的中国人画的。奉献节教堂在1735年才开始举行利图尔吉亚①。在此以前，由于缺少圣经，所以只举行了追荐亡灵和一些简短的祈祷仪式。

---

① 利图尔吉亚，原文为Литургия，希腊文为λειτουργία，相当于天主教的弥撒。——译者

4. 关于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

第二十九节

1731 年，劳伦茨·兰格率领的商队到达北京后，普拉特科夫斯基的属下人员全都跑到商队办事处去呈递状子，控告普拉特科夫斯基。商队总管劳伦茨·兰格审理了这些案件。他离开北京时把这些案卷带回俄国。回国后，他就将这些案卷转给了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当他还在北京时，他曾命令传道团所有成员要听修士大司祭的话，因为修士大司祭是全俄政府委派的，是他们的上司；受到责骂时就躲开他；并命令他们每个人都要等待最高当局来满足他们所提的要求。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审理了劳伦茨转来的案卷，决定派遣伊拉里昂·特鲁索夫前往北京接替普拉特科夫斯基任修士大司祭。 20

第三十节

1735 年，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听说接替他的人正是他想陷害的人，而且已在赴北京途中，于是他不知通过谁送了一封信给至圣的伊尔库次克主教英诺森（普拉特科夫斯基以前曾以狡猾的手段谋到了原应由英诺森担任的传道团团长职务，这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在信中普拉特科夫斯基请求主教向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报告他不愿再担任驻北京修士大司祭之职；在同一信中，他还说了他的继任者一些坏话，说后者没有上过神学校，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前一件事是普拉特科夫斯基必然要做的，因为即使他不提出这一请求，他也要被撤换了；而后一件事则是出于他对特鲁索夫的恶意。这从下面这件事情中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来：伊拉里昂·特鲁索夫在担任商队的修士司祭时，有一次由于不小心，把墨水滴在祈祷冥福用的已故大君主名册中一位大君主的

像上。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看到了这个情况，就告了他一状，说特鲁索夫这样做是出于他对那个头像被弄脏的大君主的蔑视。因此，特鲁索夫一返抵国境，就被押送到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经过审讯，判明他无罪后才被释放。

第三十一节

商队到达北京后，商队总管劳伦茨·兰格接到一道命令，要他审问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审查他在北京的品行和他所制造的纠纷。但普拉特科夫斯基却向商队办事处呈递了一张控告劳伦茨的状子，说劳伦茨是个异教徒，故意通过挖地窖来破坏教堂的祭坛，而且教堂的墙也因此裂了缝。经过调查，判明是普拉特科夫斯基诬告，因为教堂的所有神职人员和辅助人员都宣誓证明，教堂墙上的裂缝并不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是由于一次强烈的地震造成的。后来，劳伦茨让一名宣誓公务员将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命令送给修士大司祭普拉特科夫斯基。普拉特科夫斯基接过来就扔
21 在地上说："相信异端邪说的人怎么配给我送命令呢？"由于这样的行为，他受到了很厉害的鞭打，并被拘禁起来，任何人都不准到他那里去。但在安东尼因受鞭打而得了重病后，商队的司祭被允许前去听他的忏悔。修士大司祭就这样一直被监禁到商队离开北京时为止。在商队离开北京时，他被放了出来，接着就被押送回国，旅费归他自己负担。到达圣彼得堡后，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对他审讯了很长的时间，判明他确实有罪后，就把他送到圣谢尔基三位一体大修道院加以监管，列为无职权的修士司祭。1742 年，先帝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陛下临幸该修道院时，曾向该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杜宾涅维奇问到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的情况。阿姆夫罗西向女皇陛下启奏说，普拉特科夫斯基已经改悔，现在安份守己了。因此，女皇陛下谕令撤消普拉特科夫斯基

无职权的修士司祭的处分，并派他担任这个修道院的司库。后来，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被派到新成立的佩列斯拉夫[1]教区。据记事本上的记载，在那里仍任修士大司祭。

第三十二节

商队从俄国出发时，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曾命令商队总管劳伦茨·兰格在到达北京后，向修士大司祭接管教堂、教堂用具、以及归教堂所有的一切财产。修士大司祭所弄丢的东西也要一一向他索回。然后将上述房产财物移交给前来接任的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这一切兰格都照办了。这位伊拉里昂先前曾在堪察加海军中服务了十二年，是托博尔斯克都主教安东尼于1719年派去的。他于1731年返回，同年任商队修士司祭前往北京。回国后，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曾经审查了普拉特科夫斯基对他的控告。经判明无罪后，至圣的诺夫哥罗德主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就把他带到自己的主教府，考查了他的工作能力和态度，也发现他很有才干，认为能胜任修士大司祭之职，可以派驻北京。后来，根据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决定，修士司祭伊拉里昂从圣彼得堡被派到伊尔库次克。与此同时，最高宗务会议还给伊尔库次克主教英诺森一道命令，要英诺森主教提升伊拉里昂为使节修道院即主易圣容修道院(座落在北海的对岸[2])的修士大司祭，并将其派往北京。根据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上述命令，伊拉里昂便被提升为修士大司祭，并于同年，即1736年被派往北京。当时曾发给他二千卢布，用以修缮存放祭服及圣器的库房和教堂的全部用具，并用来购买 22
钟和其他为教堂所必备的物品。同时还头一次发给他五十卢布作

---

① 佩列斯拉夫(Переслав)，一作佩列雅斯拉夫(Переяслав)，又作佩列雅斯拉夫耳(Переяславль)，即今苏联佩列雅斯拉夫—赫米尔尼茨基市。——译者

② 第二个抄本作："位于贝加尔湖的东岸"。

为教堂的经费。在所有的物品购齐以后，伊拉里昂就带着这些物品到北京去了。商队离开北京以后，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在教堂旁边修建了一些供修士住的单人房间。为此共支出了七百两银子(1737年)。修建合同规定，七年内如屋顶漏水，则承包人应负责免费修理。修士大司祭在到达北京的那年12月20日主持了俄馆内的奉献节教堂圣化仪式，同时还在这个教堂屋顶上安了一个刻有花纹的铁质镀金十字架①。教堂的窗戶原先是用纸糊的，1737年则安上了云母片。教堂的圆顶以前是镀金的，1742年包上了白铁皮。同一年教堂的大门也包上了白铁皮。

第三十三节

由于在北京独居生活的时间过长，再加上属下人员胆大妄为，不受管束，历届的修士大司祭都感到很苦恼，因此总是郁郁寡欢。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借酒浇愁，狂喝滥饮。饮酒过多，即使在俄国也会引起严重疾病，断送许多嗜酒者的性命，而在北京这种极其有害的后果，在纵酒者身上更会大大提前发生，这是因为中国酒比俄国酒更为有害的缘故。因此，根据这里的气候，饮酒量应该比在俄国要少得多才好。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由于上述原因也大量饮酒，因而得了癫痫病，一直病到死。他死于1741年4月20日。在北京住了大约五年②。

5. 关于传道团团长拉夫连季③

第三十四节

在北京学习的学生阿列克谢·弗拉迪金准尉告发了修士大司

① 参见B.米罗特沃尔采夫《北京东正教传道团历史资料》(载《正教之友》，1888年10月号，第256页)。——原编者

② 第二个抄本写作："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死于1742年。他在北京住了不满七年"。——原编者

③ 即拉夫连季·鲍勃罗夫尼科夫。

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说他(指修士大司祭)偷了教堂的银器，还从圣像上剥走了银饰物。由于伊拉里昂在此以前是伊尔库次克教区主易圣容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因此至圣的伊尔库次克主教英诺森奉命派该修道院的副院长拉夫连季到北京来审理伊拉里昂的案件。根据主教府的指令，拉夫连季随同兰格所监护的商队到了北京。由于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在拉夫连季到达前不久就死了，所以根据商队办事处的决定，拉夫连季便留下来任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团长，而且还接管了二个教堂和归教堂所有的一切财物。他在1741年到达北京时身体已不很好，在北京住了大约三年，于1744年4月4日就去世了。他曾多次对人说过："要是我没有碰到审案的差事，我就不会呆在北京"①。 23

6. 关于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

第三十五节

传道团团长拉夫连季曾向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打了一个报告，说北京需要一位有学问的修士大司祭，而且如果东正教最高宗

①第二个抄本在此处加了一个注释："这位鲍勃罗夫尼科夫不是作为修士大司祭，而是作为普通的修士司祭被派往北京的。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神父曾经写了许多关于他的滑稽可笑的事。费奥多西神父所写的传道团大事记一定被保存下来了。至于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在北京的表现则很坏，很下流。在告发他的状子上有这样的叙述：他穿着女人的衣服在修道院里走来走去，自称是处女，还干了许多恶作剧。他花钱毫不在乎，以致当薪金花光了，公款也没有了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教堂银器上打主意。当他派人把这些银器送到小铺子去变卖时，由于铺主们认识传道团的人。就知道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达喇嘛派人送来的。而这类东西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因此要求留下来看看再说。后来，修士辅祭约阿萨夫(记得还带着学生或是教堂辅助人员)到铺子里来了，看见了教堂的物品，就赎了回来。回到教堂后他们立即带着这些东西去找修士大司祭，强迫他交出收支帐簿和钥匙，并且还写了一张状子寄到国内告发他。但他没有等到审讯，就因饮酒过度得了癫痫病，不久便去世了。现在很难判断，他们当中究竟是谁违反了法规？是属下人员(他们的行为是很蛮横无礼的)，还是他们的上司？但有一点是无疑的，正如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神父所说的，俄国宗教当局未必会责难后者，因为属下人员怎么敢冒犯自己的上司呢？这是违反条例的"。

务会议同意，修士司祭最好也是派有学问的来；说他自己也希望受有学问的修士大司祭领导。在报告中拉夫连季还提出他在传道方面无能为力，因为没有进过神学院；拉夫连季还说，这里“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①，因此也应有一些会“作工”的人。让没有到过北京的人认为拉夫连季的这份报告是正确的吧！而关于这次“要收割的庄稼”的事，我将在本书的末尾再谈。

第三十六节

24 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接到拉夫连季的报告后，就着手积极地物色学过哲学和神学而又能胜任驻北京修士大司祭之职的人。由于当时基辅佩切尔斯克大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季莫费伊正在莫斯科，因此，最高宗务会议就给佩切尔斯克大修道院副院长（即修士大司祭季莫费伊的副手）及该修道院宗务会议的全体成员下达了一道命令，要他们从索菲亚教区物色若干名能胜任驻北京修士大司祭之职的人选，上报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根据最高宗务会议的这道命令，共提出了七名候选人，他们都是从有学问的人当中选拔出来的②；其中六人则在各种借口下规避去北京传道团任职。命运注定了这个任务要落到米哈伊尔金顶修道院（在基辅）副院长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的身上。他虽然也曾向最高宗务会议提出过自己的腿有病，想借此逃避被派往北京，但是他提出的理由并没有被接受。这样，在1743年8月26日③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就被提升为修士大司祭，并于同年被派赴北京。

① “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这句话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七节，意指传道的任务重，而神职人员少。——译者

② 第二个抄本作：“执行最高宗务会议的命令的结果是，从佩切尔斯克大修道院选出了以下几名候选人：阿纳尼·莫克里茨基，他先前是莫斯科神学院的句法学教师；阿尔谢尼·庞季茨基，他当时是基辅神学院修辞学教师，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还有一位是米哈伊尔修道院的副院长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

③ 第二个抄本作：“1745年8月26日。”

为了进行神事活动，还派了二名归他领导的有学问的修士司祭：神学院的语法教师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和低级班①教师约伊利·弗鲁勃列夫斯基；辅祭则仍让在北京的约阿萨夫继续留任。格尔瓦西于1743年从莫斯科出发，于1745年11月27日随同八等文官格拉西姆·利勃拉托夫斯基所率领的商队抵达北京。正是这位利勃拉托夫斯基，我从圣彼得堡都主教加夫里伊尔那里听到过关于他的某些劣迹。但我根据在北京的一些记事本的材料，对事情了解得更清楚了，现在我就来比较详细地谈谈利勃拉托夫斯基的情况。格拉西姆·基里洛维奇·利勃拉托夫斯基出生在小俄罗斯科泽列茨市，后被带到莫斯科当了教堂唱诗班的歌手，住在已故的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家里；后来又当了公爵夫人维娅泽姆斯卡娅的管家；从那里作为教堂唱诗班的歌手随同至圣的英诺森主教准备前往北京。但是英诺森主教既然被撤消了派赴北京传道团的任命，因此，格拉西姆·利勃拉托夫斯基也就随主教留在伊尔库次克。以后这位主教派他去莫斯科请求增加伊尔库次克主教的薪俸，使主教能过与其身份更加相称的生活。格拉西姆·利勃拉托夫斯基办成了这件事。伊尔库次克主教看到利勃拉托夫斯基很能干，就让他当主教的全部世袭领地的总管。这个职务一直担任到一个名字也叫英诺森而姓涅鲁诺维奇的新主教前去接任已去世的英诺森·库利奇茨基的职务时为止。但是前驻北京的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在自己的记事本中提到，新到任的伊尔库次克主教涅鲁诺维奇仅仅是出于恶意和憎恨，就一度把利勃拉托夫斯基拘禁起来。这个谎言可能是由于斯莫尔热夫斯基对自己的上司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恨得太过份所致。在从边境到北京途中，他处处袒护和夸奖利勃拉托夫斯基，仅仅因为后

25

① 从前俄国东正教神学院分三个班级：低级班(инфима)，即修辞班(риторика)；其上为哲学班(философия)；再上为神学班(богословие)。——译者

者对待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的态度不好。但斯莫尔热夫斯基这样带有偏心的夸奖清楚地表明，利勃拉托夫斯基由于自己那种行为理应得到的是什么，因为中国方面派去护送商队从边境到北京的武官发觉商队总管对达喇嘛的这种态度就很注意，他看出了商队总管对待达喇嘛十分不公道：先是在边境拒绝给达喇嘛大车，后来在途经沙漠时对他更是百般刁难，不让商队的差役给他赶车。这些都是出于对修士大司祭的敌视。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继续谈利勃拉托夫斯基早先的情况。利勃拉托夫斯基遭到逮捕后被送到伊尔库次克主升天修道院监禁起来，后来不知怎样逃了出来，跑到伊尔库次克副省长普列谢耶夫那里去了。这位副省长与主教不和，因此就把利勃拉托夫斯基收留下来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保障了他的安全。当新来的主教得知利勃拉托夫斯基逃跑后，就发布了一道命令给伊尔库次克教区各个地方。根据这项命令，任何地方的教堂都不得收留利勃拉托夫斯基，也不能到他家里去举行圣事。后来甚至还把他革出了教门。主教之所以对利勃拉托夫斯基这样的愤恨，是因为利勃拉托夫斯基在管理主教的世袭领地时侵吞了大量的教会田产，并对这些领地上的居民进行过不少迫害。当至圣的主教要求利勃拉托夫斯基如数交还他所侵占的教会田产时，他拒不交出并矢口抵赖说，他对主教所要求的那些教会田产一无所知。由于利勃拉托夫斯基受到副省长的宠信，因此副省长就派他送公款到莫斯科去。他到了莫斯科以后，就跑到最高宗务会议那里一再请求恢复教籍。利勃拉托夫斯基在莫斯科期间竭力设法恢复自己的社会地位。那时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拉祖莫夫斯基
26 已经是煊赫显贵。不知是由于什么机缘，格拉西姆·利勃拉托夫斯基结识了他，以后不久又被拉祖莫夫斯基推荐给先帝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陛下。女皇陛下根据拉祖莫夫斯基的推荐，封格拉西姆·利勃拉托夫斯基为八等文官。同年，即1744年，格

拉西姆·利勃拉托夫斯基被任命为西伯利亚商队的总管，于1745年初到达伊尔库次克，后来就率领商队从伊尔库次克出发前往北京。除此之外，关于利勃拉托夫斯基的其他一些材料，我认为就不是很需要的了，因此我也就不再多谈他的事情了。

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到达北京后，就尽力去结识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由于他到达北京时很有钱，因此在这件事上他做得很成功。在北京他不喝酒，而且是一贯的。他善于用礼物互相酬答。他有很方便的条件本来可以为自己的继任者留下关于北京生活的有益的资料，但是除了一些碎纸片①外，我再也没有找到林采夫斯基的任何记事本。而前任没有给自己的继任者留下有关当地的任何有用的资料，这是很不好的。因为新任的修士大司祭到了北京(可以公正地说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以后，由于不知道当地的情况，不得不在许多场合犯错误。而如果有可以利用的资料，这种情况当然是可以避免的②。

7. 关于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

第三十七节

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在北京居住了九年以后，由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接替了他的职位。格尔瓦西在他驻京工作的第十年，即1755年返回俄国。他回国后，便被派到小俄罗斯的佩烈雅斯拉夫耳，并被提升为主教。他过去的下级并对他充满敌意的③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被提升为修士大司祭。至于继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和修士司祭费奥多西之后

---

① 第二个抄本补充写道："而且还不是那么有用的。"

② 第二个抄本在此处有一个注释："我曾听说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在恰克图曾被商队总管利勃拉托夫斯基拘捕，但这是十足的谎言。"

③ 第二个抄本在此处有一个小注："是什么原因使得斯莫尔热夫斯基成为自己上司的仇敌，记事本上没有进一步说明"。

曾在北京工作过的我的三位前任修士大司祭，我从记事本中没有了解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情况。因为无论我怎么查找，结果还是一无
27 所获。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找到发给他们的驿马使用证，或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发给他们的指示时，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特别是当我从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和曾在北京俄罗斯馆工作过的中国仆役那里打听到很多情况后，我就想把上述我的三位前任的轶事介绍给希望知道驻北京修士大司祭事迹的人们。

第三十八节

当驻北京的传道团到了应该换班的期限时，上面已经提到的莫斯科神学院诗歌教师修士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被挑选出来任新传道团团长，领导新传道团的全体宗教人员。他在晋升为修士大司祭以后，在1753年，曾被推荐给先帝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陛下，后来就被派赴北京。随他一道前来的还有两名修士司祭、一名修士辅祭和两名教堂辅助人员。这是我第二次看到随修士大司祭一道还派有两名教堂辅助人员。第一次是给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配备了两名教堂辅助人员。自阿姆夫罗西之后，给每一个修士大司祭派两名教堂辅助人员一事就定下来了。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于1754年9月4日离开国境，随阿列克谢·弗拉迪金所监护的商队前往北京。阿列克谢·弗拉迪金曾在北京学习过，回到俄国后，当上了八等文官，并被任命为商队的总管。由于严寒和供应不足，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神父在途经沙漠时所遭受的苦楚远比我为甚。因此，他于12月25日抵达北京时，也和我一样，已是疾病缠身。

阿姆夫罗西神父到达北京后，竭力结识传教士①。在这方面他做得很有成效。要结识人，唯一的手段是要有钱。修士大司祭阿

① 第二个抄本将“传教士”改为“耶稣会教士”。——原编者

姆夫罗西曾辛勤地栽培果树。他的这些劳动成果，我作为他的第三任继任者现正在享用。他还是一位优秀的住宅建筑家，因为凡是我所看到造得比较好的一些建筑物都是阿姆夫罗西辛勤修建的。在我来到北京以后，遇到了一些熟悉阿姆夫罗西的传教士，他们都以能获得他的友谊[1]而深感荣幸。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学识渊博、性格直率[2]、身材高大并蓄有很长的胡须。他既然要与耶稣会教士密切交往，因此为了和他们应酬，他的言谈举止都必须象一个俄国长者。由于这一缘故，他要把每月从各家各戶募集来的钱的很大一部分用到必需的交往之中。甚至可以公正地说，凡生 28
活在北京的修士大司祭都必须和耶稣会教士交往。因为除此之外，他从俄国得不到任何消息，而从传教士那里则可以知道不少新闻，而且通过他们可以比较方便、比较确切地打听到当地的事情；同时还因为他在当地沒有其他的人可以结识，因为只要一结识满洲人和汉人，他们隔上一个月就会前来借钱，而借到钱后，都不能很快归还，有时甚至借出去的银两一去就不复返了。

第三十九节

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神父看到给他规定居留北京的期限已经过去，可是俄国商队却不见前来，连信使也沒有来过，于是在十年的期限过去以后，他就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十三年的时间也过去了，而回国的希望仍然渺茫，于是他就开始拚命喝酒，以致患了结石症，终于在 1771 年 6 月 1 日，即在他来到北京的第十七年去世了[3]。他同样也沒有给继任者留下任何资料。

---

① 第二个抄本作："能和他交往。"

② 第二个抄本作："为人聪明、性格直率。"

③ 第二个抄本补充说："葬在安定门外。所有其他俄国人都葬在这里。阿姆夫罗西非常热心住宅建筑。在与人交往中总是面带笑容。他身材高大而健壮，留有很长的胡须"。

8. 关于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维特

第四十节

由修士辅祭晋升为修士司祭，继而又晋升为修士大司祭的尼古拉·茨维特，于1768年奉命接替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的职位。他于1771年[1] 12月初旬在康斯坦丁的儿子、十四等文官瓦西里[2]的护送下来到北京。尼古拉原系圣谢尔基三位一体大修道院所属神学校的法语和德语教师。而至圣的都主教普拉顿·廖夫申那时还是修士司祭，同时还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大公(后来是全俄罗斯皇帝)的神学教师。这时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他(因为他是圣谢尔基三位一体大修道院的副院长)一道命令，要修士辅祭尼古拉到彼得堡去，以便将他提升为修士大司祭并派往北京。根据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这道命令，尼古拉来到圣彼得堡，遂即被29提升为修士大司祭并被派往北京。他在从俄国出发前来中国时，曾请求最高当局增加修士大司祭的薪俸，但遭到了拒绝[3]。尼古拉到北京后除一名修士司祭西尔威斯特和一名教堂辅助人员外，再也没有看到一个还健在的前任人员了。甚至那位修士司祭也由于饮酒过多在苟延残喘。因此，新来的修士大司祭没法接收任何一件保管得象样的东西。无论是教堂，还是其他建筑物都是如此。甚至连一本财产登记簿[4]他都无法从修士司祭西尔威斯特那里得到。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也没有给他(如同没有给我的前任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和我一样)发一本装订好的财产登记簿。因此，新来

---

① 第二个抄本作："1772年。"

② 指瓦西里·伊古姆诺夫。——译者

③ 第二个抄本补充说："他是随同十四等文官瓦西里·伊古姆诺夫所监护的小商队前来北京的。这位伊古姆诺夫也曾护送过我的前任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后来又护送过我。不过护送我时他已晋升为十等文官了"。

④ 第二个抄本作："收支帐簿"。

的修士大司祭也和我一样，由于没有财产登记簿，在接收教堂及其所有的财产时也不知遇到了多少麻烦。上面提到的修士司祭西尔威斯特是属于喀山教区的。他在回到自己亲人那里的当天就死去了。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在北京居住了九年，在第十年的时候回到了俄国。他在北京期间常常大量地饮酒。回到俄国后，据说他到基辅基里尔修道院担任主持司祭① 职务。他之所以降职，是因为他到伊尔库次克后，打了一个报告控告瓦西里·伊古姆诺夫监护官，但这个报告与他的职位是十分不相称的。这个报告虽然是非常公正的，但是那时的伊尔库次克省省长克利奇卡却不相信。而且可以毫无疑问地想象到，省长也一定把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在北京的行为报告了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

9. 关于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

第四十一节

1780年，我的前任、涅夫斯基修道院的修士辅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被提升为修士大司祭，以接替尼古拉·茨维特的职位。约阿基姆曾在基辅神学院从低级班读到哲学班。正如他多次对我说的，他在读哲学班的第二年到了圣彼得堡，本来是去学医，但由于对医学不感兴趣，所以就进了亚历山大修道院② 削发成为修道士。过了一个时候，他当上了这座修道院的管库。在被提升为修士大司祭后，他奉命前往莫斯科去接受传道团人员。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同时发给当时还是莫斯科大主教至圣的普拉顿一道命令，要他从自己的教区挑选宗教人员和学生，组成一个完整的传道团后交由派往北京的修士大司祭负责领导。根据这一命令，至圣 30

① 主持司祭：小修道院院长，级别低于修士大司祭。——译者

② 亚历山大修道院，即涅夫斯基修道院，正式名称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座落在彼得堡（今列宁格勒）。——译者

的莫斯科大主教在选齐了驻北京传道团的人员以后，就将该传道团交给了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同年，即1780年10月14日，约阿基姆从莫斯科出发。他到达伊尔库次克后，在那个地方没有住多久。3月间，当时的省长克利奇卡就派他带着皮货前往恰克图。修士大司祭率领传道团于1781年3月24日到达该地。当时主管边境事务的是弗拉索夫中校，他奉令放修士大司祭及其所率领的传道团出国。修士大司祭在停留期间①与弗拉索夫不睦，因而他在启程出国时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弗拉索夫曾向他和他属下的宗教人员和学生索取了一百五十卢布的食物运费。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在这一年的4月23日离开国境，于11月2日抵达北京。在奉派前来北京的历届修士大司祭中，还没有一个象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那样得到如此优渥的待遇：一次就把驻北京七年的全部薪俸发给了他。在来到北京并接收了教堂及其所有的财产以后，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和自己的前任闹得极不愉快，只是在分手时他们俩才勉强地言归于好②。

10. 关于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③

第四十二节

我是小俄罗斯人，生在卢宾④城。在基辅神学院从低级班读到哲学班。后来于1782年在该班毕业以后，曾去莫斯科学医，在莫斯科总医院工作。但由于对医学不感兴趣，辞职从莫斯科到了莫洛昌斯克的索夫罗尼小修道院。在规定的三年期满以后，我削发当了修道士。在那里总共住了将近五年。根据我的意愿和请

---

① 第二个抄本作："当他在恰克图停留期间。"

② 第二个抄本补充说："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多，他在返回俄国途中，还未到达张家口，就猝然死去了"。

③ 第二个抄本补充说："姓格里鲍夫斯基"。

④ 卢宾(Лубень)，即卢勃内(Лубны)。——译者

求，至圣的莫斯科都主教普拉顿于1787年派我到莫斯科神学院去继续深造。在神学班毕业后，1790年我又被这位至圣的都主教派 31
到莫斯科帝国大学给青年讲授正教教义和宣讲圣经①。我担任此职差不多有两年光景。1792年12月18日，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至圣的都主教下了一道命令，要我到最高宗务会议去。在这以前我已听说要派一个新的驻北京传道团去替换那里的俄国人，而且也有消息说已从喀山教区挑出了两名候选人做驻北京的修士大司祭：一名是辛比尔斯克修道院的主持司祭叶拉兹姆，另一名是喀山神学校修辞教师、基日茨克修道院院长修士司祭根纳季；此外，还规定传道团全体成员都要从喀山教区选派。因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困惑莫解，为什么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要召我前去。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我都必须前往。于是，我从莫斯科教区公署领取了为我准备的身份证，并向友好们告别以后，于1792年12月23日由莫斯科出发，1793年1月3日到达彼得堡。当天我就谒见了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首席成员、至圣的诺夫哥罗德都主教加夫里伊尔。他当即命令给我分配一个单人宿舍。我在那里一直住到动身去北京时为止。从1月3日到14日我一直不知道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为什么要我到彼得堡来。后来，命令我带着身份证到最高宗务会议去。17日，至圣的都主教命令我去见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全体成员。都主教在提升我为修士大司祭的问题上曾感到相当为难，因为有人曾在他的面前诽谤我，说我是一个酒鬼②。但是鉴于对我的诽谤纯属虚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决定提升我为修士大司祭。因此，1793年1月27日，我被至圣的诺夫哥罗德和圣彼得堡两地的都主教加夫里伊尔提升为修士司祭。同月30日，根据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命令，他又提升我为修士大司祭。与

① 第二个抄本作："我被派到莫斯科大学去阐释教义和讲道。"

② 在页边有一个用铅笔写的批语："不是酒鬼，但是一个嘴馋的家伙。"

此同时，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将关于撤消原来已经推荐的派驻北京传道团的修士大司祭人选的命令送交喀山大主教阿姆夫罗西。从1月3日到5月14日，在有关财政部门还没有发给我和随我同行的一名学生一年的薪金和到喀山的驿站车马费，以及到达边境
32 沿途所需的口粮以前，我一直都住在彼得堡。5月14日，我从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那里领取了命令和工作指示后，就离开了圣彼得堡，晚上在皇村①我的一位兄弟家过夜。15日启程去莫斯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等待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指示和进入中国所必需的其他证件。8月23日，我从外交事务委员会领取了紧要公文。就在这个月28日的晚上，我冒着倾盆大雨启程上路了。9月15日到达喀山，接受了传道团成员——宗教人员和学生。9月29日与随行人员一道离开喀山奔赴伊尔库次克。1794年1月31日到达该地，住在大主教府里。在这里我和宗教人员一直住到7月16日。学生们则住在居民的家里。我在伊尔库次克呆了五个半月以后，就在上面已经提到的7月16日那一天，总督命令我带着皮货前往恰克图。当我在伊尔库次克的时候，曾经受到伊万·阿尔菲里耶维奇·皮利总督的热情友好的款待②。7月28日，我到达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要塞。同年9月2日离开国境。在饱尝了沙漠上的、特别是中国境内旅途上的千辛万苦之后，于11月27日抵达北京，这时我已疾病缠身③。我在到达北京后，发现原来的俄国传道团人员完全处于混乱的状态。属下人员都不听自己上司的话，不

---

① 即今列宁格勒附近的普希金城。——译者

② 在页边上有一个大概是尼尔大主教的批注："这对已故的维尼阿明主教是多么忘恩负义啊！我清楚地知道，写这本《历史纪事》的人曾受到过维尼阿明主教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而在这里却只对皮利总督阿谀奉承。"

③ 第二个抄本作："我是在5月14日带领一名学生帕维尔·卡缅斯基离开彼得堡的。9月15日到达喀山，接受了喀山教区选派的传道团人员。9月29日，我率领传道团从喀山出发。1794年7月28日到达国境。9月2日在瓦西里·伊古姆诺夫监护官的护送下离开俄国。11月28日抵达北京。"

守秩序，酗酒，挥霍浪费，还与中国人打架。传道团团长也没有任何办法来约束他们，他自己陷于极度不安和苦恼之中。有时甚至发生这样的事：他因他们的放荡行为打他们，而他们却反过来揍他。居住在俄罗斯馆的被雇佣的中国人看到俄国人的这种胡作非为就到处宣扬，而俄国人自己也确实就是这种胡作非为之辈。开始我由于新来乍到，对这种情况感到不胜惊讶，因为我看到住在北京的俄国人并不认为尊敬和服从自己的上司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然而，当我在这个地方久住之后就明白了，这些被称之为“属下人员”的人，由于无法无天，根本就瞧不起自己的上司，因而尽管驻北京的这位传道团团长本人非常高尚，但他的属下人员却不尊敬他，也不听他的话。

33

第六章

关于派往北京归修士大司祭管辖的宗教人员的简况及教堂辅助人员的人数（历届修士大司祭属下的教堂辅助人员的人数并不完全相等）

第四十三节

在叙述了向北京派遣俄国传道团的原因之后，我仅写了有关历届传道团团长的情况及其人数；现将派到北京来的由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管辖的宗教人员的名单开列于后，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随同历届修士大司祭前来北京的上述人员的人数并非总是一样的。

俄中条约缔结前派驻北京的宗教人员人数如下：

第四十四节

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的属下人员有：

修士司祭　拉夫连季｛曾被康熙封为武官，任过俄国学校教师，享有当地官员的一切待遇。这种情况全俄罗斯政府今后应该绝对禁止。

修士辅祭　菲利蒙

教堂辅助人员：

一、约瑟夫·阿法纳西耶夫

二、彼得·卡尔马克
三、尼卡诺尔·克柳索夫 } 彼得·卡尔马克和尼卡诺尔·克柳索夫在北京结了婚，他们被接纳入俄罗斯佐领，有武官衔，同时在教堂供职。①

四、伊拉里昂·雅库特

五、费奥多尔·别尔卡

条约缔结后

第四十五节

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的属下人员有：

司祭约翰，另一名是由上届传道团的修士司祭拉夫连季留任。这位拉夫连季买了一对夫妻，过着令人甚为怀疑而又荒淫的生活，俄罗斯佐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修士辅祭　约阿萨夫

教堂辅助人员：

一个名叫纳拉巴尔金的
一个名叫安德烈的 } 这里列出的是两名教堂辅助人员。

第四十六节

34

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的属下人员有：

修士司祭　拉夫连季（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

修士司祭　安东尼 } 在修士大司祭特鲁索夫到达北京后，此人由商队总管兰格带回俄国送交法庭审判。

修士辅祭是上届的约阿萨夫。

教堂辅助人员：

① 第二个抄本作："他们有武官头衔，完全成为中国皇帝的部下。"

一、彼得·约夫列夫①
二、彼得·卡缅斯基
三、雅科夫·雅库特
四、米哈伊洛·伊万诺夫

这里列出的又是四名教堂辅助人员。这四人是否全都被中国接受前往北京，还是只接受了其中二人，不详。

第四十七节

修道院院长拉夫连季②的属下人员就是上届传道团成员，另外还有新来的三名学生。

第四十八节

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的属下人员有：

修士司祭　约伊利·弗鲁勃列夫斯基

修士司祭　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　他由于留下了许多资料和敌视自己的上司修士大司祭而闻名。

修士辅祭　约阿萨夫③。

教堂辅助人员：

一、索宗特·卡尔波夫
二、基尔·别列茨基
三、基里尔·谢苗诺夫
四、斯捷凡·特列季雅科夫
五、伊万·库兹涅佐夫

这里列出的又是五名教堂辅助人员。他们是否全都被中国接受前往北京，还是只接受了其中几名，不详。只知道俄国派去了五名。

---

① 第二个抄本作：彼得·雅科夫列夫。

② 这是另一个拉夫连季。第四十四节提到的拉夫连季姓乌瓦罗夫，这一个拉夫连季姓鲍勃罗夫尼科夫。——译者

③ 第二个抄本作："就是上届的修士辅祭约阿萨夫。"

第四十九节

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的属下人员有:

修士司祭西尔威斯特,他虽然喝酒喝得特别多,但他在这种漫无节制的纵酒情况下,为人还是非常吝啬的。

修士司祭索夫罗尼,他在他居住的圣母安息教堂附近自缢而死。

修士辅祭谢尔基,他到北京后,由于酗酒和胡作非为,他的上司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曾把他交给商队总管阿列克谢·弗拉迪金,以便带回俄国。但商队总管没有接受,其原因正如商队总管给修士大司祭的信中所说,是因为谢尔基没有被开除修士籍和撤销辅祭职务。 35

教堂辅助人员:

一、斯捷凡·齐明
二、伊利亚·伊万诺夫
三、阿列克谢·达尼洛夫

这里列出的又是三名教堂辅助人员。①

修士大司祭和司祭的差役:

一、瓦西里·亚历山德罗夫
二、伊万·科兹洛夫斯基
三、格里戈里·斯皮增

这些人员不是由俄国政府,而是由中国理藩院派给修士大司祭等人的,因为他们都是逃人;当藩理院获悉俄国官家商队不久就要从俄国前来中国时,又把这些人从俄罗斯馆带走了。

第五十节②

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维特的属下人员有:

司祭　尤斯特

① 第二个抄本补充说:"没有学生。"

② 原书脱漏。——译者

司祭　约翰

修士辅祭　尼基弗尔

教堂辅助人员:

一、彼得·罗吉昂诺夫,他回到俄国后,在伊尔库次克教区被提升为司祭,并被派往库达村。

二、……①

第五十一节②

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的属下人员有:

修士司祭安东尼,他住在圣母安息教堂附近,后来因为喝醉了酒,睡在热炕上被烫伤了,不久就去世了。

修士司祭阿列克谢,他是修士大司祭的狡猾和凶恶的敌人。修士大司祭曾经在我面前流着眼泪抱怨这位修士司祭,说他竭力煽动教堂辅助人员和学生反对他这个修士大司祭③。

修士辅祭伊兹拉伊尔,他不仅纵酒无度,而且行为极其放荡淫佚。他终于因酗酒得病,在我到达之后,于1794年2月6日在北京去世。

36

教堂辅助人员:

一、伊万·奥尔洛夫,他由于不尊敬和不服从他的上司被送回俄国。很奇怪,作为一个反对上司的人,他在俄国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得到晋衔加薪的奖赏。

二、谢苗·索科洛夫斯基,这个教堂辅助人员的生活腐化不仅远远超过在他以前的历届驻北京的教堂辅助人员和学生,并且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俄国人;正象所有认识索科洛夫斯基的人对我

① 第二个抄本作:"教堂辅助人员:一、彼得·罗吉昂诺夫,二、尼康,这是他在离开北京后削发为修道士时取的名字"。

② 原书脱漏。——译者

③ 就内部混乱和胡作非为来说,这届传道团超过了我国历届驻北京传道团。见《驻北京传道团早期生活概况》(载1876年伊尔库次克教区公报)。——原编者

说的那样，尽管身为基督教的信徒，而且还是在教堂里供职的人，他的淫荡行为和极其精于勾引女人的本领也大大超过了那些最贪淫好色的不信教的中国人。

第五十二节

我(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的属下人员有：

修士司祭　伊耶谢

修士司祭　瓦尔拉阿姆

修士辅祭　瓦维拉

教堂辅助人员：

科兹马·库尔金斯基①

瓦西里·鲍戈罗茨基

① 第二个抄本作："卡拉金斯基。"

第七章

关于历届派往北京由修士大司祭管辖的学生人数

在条约缔结前北京没有俄国学生。

第五十三节

俄中条约缔结后，伊利里亚伯爵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于条约签定的当年就将下列三名学生派往北京：

一、卢卡·沃耶伊科夫

二、伊万·普霍尔特

三、费奥多尔·特列季雅科夫

第五十四节

1729年随同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来到北京的学生有：

一、伊拉里昂·罗索欣

二、格拉西姆·舒利金

三、米哈伊洛·波诺马廖夫

37

第五十五节

1732年随同劳伦茨·兰格率领的商队来到北京的学生有：

一、格拉西姆·巴里什尼科夫①，后来他因商队办事员死亡而被任命为该商队的办事员，补上了前任的遗缺。

二、阿列克谢·弗拉迪金

三、伊万·希希罗夫

四、伊万·贝科夫

第五十六节

1743 年随同信使绍科罗夫来到北京的学生有：

一、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

二、安德烈·科尼亚耶夫

三、×××，系商队总管格拉西姆·利勃拉托夫斯基留下的一个人，此人的名字我没有查到。

四、尼基塔·切卡诺夫②

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的属下没有学生。

第五十七节

1772 年随同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维特来到北京的学生有：

一、费奥多尔·巴克舍耶夫

二、阿列克谢·帕雷绍夫

三、雅科夫·科尔金，他是个酒鬼和莽汉。中国妇女在自己的小孩啼哭时，就用他来吓唬他们。他常到小酒店和小饭馆去，在那里和中国人打架；夜里常跟巡逻兵一起乱逛，打人，有一次把一个教堂辅助人员打死了。最后他因酗酒死在北京。

---

① 第二个抄本作："巴雷什金"。

② 第二个抄本作："一、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二、安德烈·科佩洛夫，三、尼基塔·恰卡诺夫"。

四、阿列克谢·阿加福诺夫

1781 年随同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来到北京的学生有:

一、叶戈尔·萨列尔托夫斯基
二、安东·弗拉迪金
三、伊万·菲洛诺夫①
四、阿列克谢·波波夫

其中有三名学生因酗酒死在中国，仅安东·弗拉迪金一人回到俄国后得到嘉奖，被授予八等文官，曾经担任过满汉语的翻译。

第五十八节

1794 年随同我(修士大司祭索弗罗尼)来到北京的学生有:

38 一、帕维尔·卡缅斯基②，他在被指定为去北京的学生之前，曾任下戈罗德③神学校的乡村教师，后来任圣彼得堡育婴堂监督。

二、喀山神学校训导教师卡尔普·克鲁格洛波列夫，后来因他患病，就由监护官瓦西里·伊古姆诺夫属下的翻译瓦西里·诺沃肖洛夫代替;而克鲁格洛波列夫则又从北京返回俄国。

三、斯捷凡·利波夫佐夫

四、伊万·马雷舍夫

自开始向北京派遣学生以来，包括随我一同前来的学生在内，前后共为二十四名。

---

① 第二个抄本作:“伊万·菲利莫诺夫”。

② 第二个抄本加了一个附注:“他削发为修道士后，取名彼得，并被任命为修士大司祭，于 1820 年派往北京。”

③ 即下诺夫哥罗德，今高尔基市。——译者

第 八 章

由俄国前来北京的信使

第五十九节

关于来北京的俄国使节和商队总管都是谁，一共来过多少人，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现在谈谈由俄国前来北京的信使人数。

一、阿法纳西·索洛维约夫①，中士，到北京来过两次。

二、费奥多尔·卡尔皮洛夫②，也是一名中士，到北京来过一次。

三、涅姆奇诺夫准尉，来过一次。

四、谢苗·彼得罗夫大尉，来过二次。

五、米哈伊洛·绍科罗夫中士，来过二次。他第二次来北京时已是少校了。

六、斯捷凡·萨维诺夫，来过一次。

七、沙里金少校，来过一次。

八、伊万·克罗波托夫上校，来过一次。

毫无疑问，前来北京的信使一定还要多一些，但糟糕的是，当地档案里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的材料③。

---

① 第二个抄本作："阿法纳西·索科洛夫斯基"。

② 第二个抄本作："费奥多尔·科尔尼洛夫"。

③ 第二个抄本是这样写的："毫无疑问，由俄国派往北京的信使人数一定会比这里列举的要多，因为一些俄国城市在条约缔结前也和中国保持了友好关系，但糟糕的是找不到任何有关他们的材料。"

第二个抄本到此处结束。——原编者

39

第 九 章

俄罗斯希腊正教在北京的早期情况　被俘的阿尔巴津人及其后代以及信奉正教的当地的中国人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对待正教的

第六十节

虽然从第二章①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中可以看出，居住在北京的被俘的俄罗斯人对基督教持什么态度和他们到北京后是怎样做的，但由于我在第四章第十九节中曾答应要向读者介绍某些被俘的俄罗斯人的名字，因此我就在这里交代一下他们的情况。同时还要告诉那些想了解阿尔巴津人情况的人，就是这些阿尔巴津人，除其中三人外，从在北京定居之日起就对基督教毫无诚意。我无从知道五十年以前，即我的前辈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在北京任职以前的历届修士大司祭任职期间阿尔巴津人当中有多少人领了洗，我仅知道在格尔瓦西任职期间只有上面提到的三个人对神圣的教堂比别人要热心一些。

他们的名字如下：

一、列昂季，他对教堂十分热心，每年都做忏悔和领圣餐。他的妻子费奥多拉每逢节日都去圣母安息教堂，但从不做忏悔，也不领圣餐。

① 本书为第三章(一)。——译者

二、谢尔基，做忏悔和领圣餐，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三、潘克拉季，他的父亲尼卡诺尔·克柳索夫曾是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属下的教堂辅助人员并在北京娶了妻子。

四、一个名叫格里戈里的。如上所述，这四个人还象保持着基督教信仰的人。

只领过洗的人有：

叶菲姆·萨文，他自己有一帧圣母像，这是商队总管兰格送给他的。叶菲姆在这帧圣像前经常点俄国和中国的蜡烛，还按照中国风俗习惯上供。他家里有一个小佛堂，里面供着几个偶像，他时常向这些偶像顶礼膜拜。他似乎只在复活节那天才进教堂。他全家都是偶像崇拜者。他在俄罗斯佐领中当过十人长。

列昂季的三个孙子，很少进教堂。他们全家都崇拜偶像，而且他们自己也象中国人一样，从不做忏悔，也不领圣餐。

一个名叫卢基扬的偶像崇拜者，就是在复活节也很少进教堂。40

雅科夫·萨文的两个儿子费奥多尔和德米特里，在俄国学校受过教育。他们甚至在复活节也很少进教堂，这已经是不止一年的事了。他们根本就瞧不起基督教的教规，而且对基督教极尽嘲笑之能事。

科兹马的孙子，曾在俄罗斯佐领中当过差，他一点也瞧不起基督教，当有人把他叫做领过洗的人时，他反而感到羞耻。这时他就对那些称他为基督徒的人说：一个婴儿当然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父母为他做过什么。我的父亲就是在我还在吃奶的时候给我领洗的，所以我不记得这件事。

上述这些人都是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在北京任职期间真正的阿尔巴津人的后代。

下列领过洗的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只是由于被俘的俄国人把他们收为养子，所以这些中国人才有俄国名字：

叶夫多基姆和他的妻子，有时去教堂，虽然不是经常去，他们的孩子没有领洗。

马卡里和他的母亲，除了教名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

至于其他的人就没有必要再提了。因为我们除了知道这里领过洗的阿尔巴津人在对待神圣的宗教信仰上和没有领过洗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而外，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至于那些没有领洗的阿尔巴津人则都是地道的无神论者。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有一次问当时在北京领过洗的人当中被认为是最虔诚的教徒列昂季：为什么你们的妻子领过洗却不去做忏悔？对费奥多西这个问题列昂季惊奇地回答道："谁见过妇女一个人跑到神甫那里去的！"

过去领过洗的阿尔巴津人都是按照教规在教堂举行婚礼，可是在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时期就已经不这样做了。现在领过洗的和没有领洗的阿尔巴津人都按照中国婚礼娶妻。我还从那些记事本中发现有些领过洗的阿尔巴津人也仿效中国人，把自己的妻子卖掉，另娶一个；只要生活富裕，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人不止娶一个妻子；临死时，并不请本教的司祭来作祷告；死后也是请当地的和尚按照中国的风俗安葬。

1798 年，伊万（他的中国名字叫德成）的三弟安德烈去世时，伊万就请了几个和尚为他送葬。当时教堂辅助人员鲍戈罗茨基恰巧也到那里去了。鲍戈罗茨基一看到正在为死者念经的和尚，就把死者安德烈的哥哥伊万（德成）训斥了一顿，因为离他住处不远
41 就住着自己的基督教司祭，他不去请来按基督教教规为死者唱挽歌，却把崇拜偶像的和尚请来念经。伊万（德成）受到这顿责备，起先是生教堂辅助人员鲍戈罗茨基的气，沉默不语，然后说道：我们有自己的皇帝，我们是领取皇饷的，因此应当象靠皇上恩典生活的人一样行事。当这位教堂辅助人员还想进一步说他这样做是违背

了基督教教规时，伊万(德成)愤怒地把这个教堂辅助人员从房间里赶了出去。结果，安德烈就由和尚安葬了。

关于俄罗斯佐领

从前，在俄罗斯佐领里曾有过这样的习俗：当一个女人因丈夫去世而成寡妇时，如果她想改嫁，而新夫又不属俄罗斯佐领，那么俄罗斯佐领的居民就把死者遗留下来的宅院和土地从寡妇手里买过来，以便除俄罗斯佐领里的人外，旁人不得占有这些东西。可是这种习俗已有五十多年没人遵守了。然而从记事本中可以看出，从前是有过这种习俗的。在领过洗的阿尔巴津人中间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惯例：如果教堂某处需要修缮，那么教堂堂长就把这件事告诉教徒们，教徒们就共同凑钱把坏的地方修理好。但是俄罗斯佐领里的人对教堂的这种热忱早就冷淡了，现在甚至连一点热忱的痕迹也都没有。

中国人从来没有象俄国商队来北京时那样起劲地要求领洗，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得到不少好处。他们往往在商队来到之前，先向别人借妥一笔钱或货，为的是等商队来了以后，领了洗，可以比较方便地同俄国人做生意；而且由于他们已入了教，商队总管也会允许他们同俄国人做生意。当商队在北京时，这些新领洗的人也经常进教堂；可是在这批商队走后到下一批商队到来之前，在教堂里任何时候也看不到他们的踪影①。

第六十一节

我到任后当时在北京有多少领过洗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已把名单附在报告中寄给最高宗务会议了；现在我仅提一下领过洗的

① 中国妇女隔着幔帐领洗，把腿伸出来，在应该涂圣油的地方，把袜子剪开一个口，涂上圣油。

阿尔巴津人及中国人是如何对待神圣的信仰的。

42 道地的阿尔巴津人:

一、格里戈里,又叫友发。在我驻北京整个时期,他一次也没有进过教堂。

二、格里戈里的儿子安德烈,同样一次也没有进过教堂。安德烈还有中国武官官衔。

已故的费奥多尔的妻子老太婆玛丽娅,从不做忏悔,也不领圣餐。

她的大儿子伊万(德成),很少进教堂。他做忏悔,领圣餐,但不是每年都是这样。

她的二儿子阿列克谢,常进教堂,很少有哪一年不做忏悔和不领圣餐。

伊万的孩子们:帕维尔,中国名字叫民泰,我在北京期间他一次也没有进过教堂;尼古拉,他只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才同父亲一起到教堂去;第三个儿子没有领洗。

已故的安德烈(即伊万和阿列克谢的弟弟)的儿子瓦西里,又名祥泰,虽不经常但还进过教堂。有一年还做过忏悔,领过圣餐。

至于其他的人,我除了知道他们的教名外,就别无所知了。这些人的名字如下:

一、伊万,我根本不认识他。

二、伊万(德成)的侄子亚历山大,我在他叔父那里见过他一次。

瓦西里,他有一次因事来过我的单人宿舍。

三、这三个人除了在领洗时给他们取的教名外,对基督教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进教堂是他们的义务。

第十章

第六十二节

1. 关于俄罗斯馆的仆役

俄国的修士大司祭及其他人员雇佣的中国仆役更加使人烦恼和不快。这些人除了偷盗和欺骗外，对俄国人更加有害的是，他们奉俄罗斯馆监视官的命令，注视着俄国人所发生的即使是极小的过失，并报告给监视官。而后者无疑会将他们从仆役那里听来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并对俄国人的所作所为评头评足，把一切都大肆渲染，向外传扬，对俄国人的一切事情都要议论一番。然而要想避开这些中国仆役又不可能，因为我雇的那个中国仆役，既替我跑外，又在我的单人宿舍内做事，因此，不管我的单人宿舍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有机会看到，然后到处乱说。这些蜘蛛(这样叫一点也不冤枉他们)都非常愿意钻进俄罗斯馆来当差。如果对他们当中某个人提到要他领洗，那他是会欣然同意的。因为他们知道，过去就有人用这种办法比较容易地谋得给俄国人当仆役的差事。而在俄国人这里作仆役，就可以有便利的条件进行偷盗和欺骗，从而捞到大量外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北京的俄国人所雇的仆役没有领洗的是极少的。所有的仆役几乎都是领了洗的。俄国人只要一把自己领过洗的仆役辞退，那么，这个仆役除咒骂、诬蔑自己过去的主人外，以后就再也不上教堂了。我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我把一个名叫瓦西里(中国名字叫常大成)的仆役因他进行欺骗而辞退以后，他在重新被雇进俄罗斯馆以前，就从没有来过教堂。另

43

外，我还雇过一个名叫德米特里(中国名字叫杨喜)的领过洗的老头子，他领洗已经四十年了，几乎一直在俄罗斯馆给修士大司祭作仆役，俄语说得很蹩脚，一条圣诫也不知道，而且根本也不想知道。1795年，我曾召集过领过洗的人来听我讲道，但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借口说不懂我的话，另一部分人则说太忙，都拒绝参加。有一次几个领过洗的中国人前来听我讲道，他们先是站在门口发笑，后来才进入我的单人宿舍。讲道结束后，我当时的仆役即上述的瓦西里(常大成)建议我请这些来听讲的人喝伏特加酒。对这个建议我什么话也没有向他说，就打发来听讲的人走了。第二个礼拜三我问常大成："领过洗的人还来不来听我讲道？"他回答说："现在谁也没有来。"我又问道："以后在别的时间他们会来吗？"他回答说："他们谁也不愿意来听讲道。"当我问及他们不愿意学习的原因时，他回答说："以前的大巴奇卡①(领过洗的人这样称呼修士大司祭)也曾象你一样召集过领过洗的人来听讲道，但他们都不愿意到修士大司祭这里来，现在当然也不愿意到你这里来。"听到常大成的这种回答后，我又问他："你们既然不愿意来听讲道，也不愿意上教堂来，那你们为什么要领洗呢？"他对我的这个问题默不作答。尽管我再三追问，他始终都没有答复。常大成有些不好意思地离开了我的单人宿舍。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一个领过洗的中国人到教堂来听讲道了。但复活节时例外，在这个大节日里，他们从教堂(因
44 为在这个节日里常有一些领过洗的中国人上教堂)到我的宿舍来表示祝贺时，会看到桌子上摆着有招待他们的各种食品。上面提到的我雇佣过的那个老头子德米特里不愿听讲道，据他说，是因为他的记忆力不好，特别是因为他的腿有毛病。讲道时我叫他坐下来听，但却无法使其他的人都坐下来。最后，那个老头子德米特里告诉我，他不需要学习基督教义，"因为"，他解释说，"我们也有你

① 巴奇卡，俄文为 Бачко，等于 Батько，即神父之意。——译者

所讲的那样的教义，也有勿偷盗，勿酗酒，勿近女色等等的戒律，别的我就不需要知道了。”还有象记事本中所记载的那种情形：在一些人中间有这种说法：“俄国人有一种风俗习惯，要是有谁做了坏事，偷了别人的东西，或者打死了人，或者做了别的什么犯法的事，只要单独向喇嘛①承认了，都会得到宽恕。”无疑，这种话是领过洗的中国人说的。总之，这份资料中关于从俄国派遣宗教人员来北京的原因，关于接受俄罗斯希腊正教信仰的阿尔巴津人及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情况，他们从前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以及他们现在信教的情况等等，我认为上述记载都是很充分的。

2. 关于俄罗斯馆的专门记述

俄国和中国缔结条约以后，中国拨出了一所官家的房屋供俄国商队来北京以及在北京的俄国司祭居住。这所房子，或者称之为馆，座落在一条叫做江米巷②的大街上，在皇宫南面半俄里，离前门外的主要商业闹区约一俄里，在大城墙③北面不到四分之一俄里，即距理藩院，或俄国人称之为外交事务委员会半俄里稍多一点。中国曾经把齐化门④附近的一所房子拨给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供来北京的俄国商队居住，但伯爵却选中了会同馆，即修士大司祭及其属下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靠近理藩院和主要市场。这所房子是中国式的，有四个门，院子中央是一个大客厅，四周是一排类似营房的厢房，间数足够那些携带皮货前来北京换成银子作为修士大司祭及其属下人员的薪俸的小规模商队使用。在第二个门与西面第三个门之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座 45
庙。这座庙对于住在会同馆的信奉基督教的俄国人来说是很不合

① 此处指神父。——译者

② 后改名交民巷。俄罗斯馆在东交民巷。——译者

③ 此处指正阳门至崇文门之间的城墙而言。——译者

④ 即朝阳门。——译者

适的，而且对于设在这个院子里的供奉上帝的教堂来说也是极不协调的。因为常有这样的情形：在中国阴历初一和十五，中国人一般都要烧香拜佛，而这时也常常碰上是我们的节日。当我们的教堂响起做早祷或午祷的钟声时，他们庙里也在敲着他们的大钟。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向理藩院的负责官员建议，请他们通知有关方面将上述庙宇从俄罗斯馆迁走，以维护基督教的虔诚信仰不受干扰，同时也是为了表示对上帝教堂的尊重。

俄罗斯馆东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从红城①流出来的叫做中玉河的河沟，俄罗斯馆的西面则是一大块空地。春节前，携带各种货物前来北京的蒙古人就在这里搭毡包居住，而在其他的时间里，这块空地就成了中国人的公共厕所。修士大司祭和他的属下人员现在居住的这所房子是很古老的，因为尚在明朝第三代皇帝（即永乐帝）在位时，浡泥国国王偕同王妃及其子女来北京朝贡，就住在如今的俄罗斯馆里②。从那时起至今（1805年）已过去四百多年了。这所房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我无从知道。上述国王在会同馆住了一些时候就病死了。中国皇帝敕令将他的王妃和子女遣送回国，而这所房子仍然保存下来，以备前来呈送礼品，或中国人称之为前来朝贡的使臣居住。在条约缔结以前，这些使臣一直是在这里居住，直至1728年末中国将这所房子永久拨给俄国人作为来北京的俄国商队和俄国司祭、其他宗教人员及学生居住时为止。

---

① 指紫禁城。——译者

② 浡泥国，也叫渤泥国或佛尼国。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古国名。此处当指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来华一事而言。见《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传第二百一十三，外国六。又见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历史分册》第378页《渤泥国》和第468页《浡泥国王墓》两条目。根据以上资料，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当时只到达我国南京（明朝开国时定都南京，明成祖在永乐元年至永乐十八年系在南京，后迁都北京），并未到达北京，后死于南京，葬于南京安德门外，1958年发现其墓址。因此，这里的记述不确，显然是把南京的会同馆与北京的会同馆混为一谈了。——译者

第二部分

对派至北京的传道团的补充记述[1]

1805年，提赫文一级修道院的修士司祭兼该地学校的教师阿波洛斯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被提升为修士大司祭，并由圣彼得堡教区派往北京接替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正值此时，特命全权大使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洛夫金伯爵奉派率领一北京从未见过的庞大使团出发前往北京。这个使团是由许多出身于名门世家的人及达官显贵所组成。但修士大司祭阿波洛斯由于行为不慎引起了伯爵的不满，因此就留在伊尔库次克的主升天修道院，后来任该修道院院长，还一度担任过伊尔库次克神学校的神学教师和校长。1814年，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调至雅罗斯拉夫教区的托勒格三级主显现修道院。而戈洛夫金伯爵也只到达中国的城镇库伦，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未能获准前往北京。 46

1806年，修士大司祭雅金夫被指定接替阿波洛斯前来北京。雅金夫当时是在托博尔斯克的伊万修道院修道，在这以前曾任伊尔库次克神学校的校长兼神学教师。他出身于喀山教区，原来是神学校低级班一名训导教师。同他一起派来的传道团人员当中还有两名修士司祭：一、阿尔卡季，二、谢拉菲姆；一名修士辅祭涅克塔里（此人不久即因品行恶劣而被勒令返回俄国）；两名教堂辅助人员：瓦西里·雅菲茨基、康斯坦丁·帕洛莫夫斯基[2]；四名学生：

① 这份补充记述系另一笔迹写的。——原编者

② 此处原稿有一边注："该帕洛莫夫斯基被勒令返回俄国（另一笔迹补充写道：因放荡不羁）"。

一、马尔克尔·拉克罗夫斯基，二、列夫·齐马伊洛夫，三、米哈伊洛·西帕科夫，四、来自伊尔库次克神学校的叶夫格拉夫·格罗莫夫①，他顶替了因病不能出国的波利特诺夫斯基。

注：这一届传道团是在1821年离开北京返国的。

派赴北京接替修士大司祭雅金夫职务的是外交事务委员会蒙满语翻译八等文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卡缅斯基（当修道士后取名彼得），他是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一级修道院晋升为修士大司祭的。这个人以前曾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那届传道团的学生。他的这届传道团人员，也象他本人一样，在各方面都享有优待。沙皇陛下在说服卡缅斯基接受了这一职务后，赐给他一枚珍贵的十字架和一枚二级圣安娜勋章，并赐给他一套极好的祭服，包括一顶贵重的帽子，还赏给他大量的图书，并敕令给所有修士司祭赏佩方挎②（这些方挎根据最高宗务会议的命令已在伊尔库次克颁发）。过了一些时候，还送来了赏给修士司祭戴的十字架（这些十字架在北京也颁发给他们了），给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教堂辅助人员及学生都增加了薪俸，还为他们派了一名医士。所有的学生都授予了官衔。医士沃伊采霍夫斯基是直接从圣
47 彼得堡派来的，派来时授予他九等文官的官衔。许诺他们所有的人过一些时候都能获得奖金③。还命令全传道团成立一个由修士大司祭主持的宗务会议。这位修士大司祭率领的传道团由以下人员组成。两名修士司祭：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④和达尼伊尔·西

---

① 此处原稿有一边注："该格罗莫夫死于北京（另一笔迹补充写道：因生活放荡）"。

② 方挎（набедреник）：系东正教神职人员斜佩在祭服外面股侧的一种用锦缎做的方形装饰物。——译者

③ 此处原文为чины（官职、官衔），根据后面的记述（见第83页），当为пенсия（奖金）之误。——译者

④ 此处有一个用铅笔写的小注："这位维尼阿明在修士大司祭彼得离开后曾留在北京代理修士大司祭之职，于1841年返回俄国。"

维洛夫。前者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神学院的学生，但没有学完全部课程；后者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神学校的学生，同样也没有学完全部课程。一名修士辅祭：伊兹拉伊尔。二名教堂辅助人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列克谢·伊萨科维奇·索斯尼茨基。四名学生：一、康德拉特·格里戈里耶维奇·克雷姆斯基，二、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昂季耶夫斯基，三、瓦西里·基里洛维奇·阿勃拉莫维奇，四、约瑟夫·帕夫洛维奇·沃伊采霍夫斯基医士。这届传道团是在同年即1820年6月□日①在八等文官商务专员勋章获得者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季姆科夫斯基②的带领下由伊尔库次克出发的。

---

① 原文未注明日子。——译者

② 关于第十届传道团的历史可参阅B.米罗特沃尔采夫的文章：《北京传道团的历史资料》（载《正教之友》，1888年9月号和10月号）。——原编者

第三部分

瓦·帕·瓦西里耶夫所作的补充记述

1830年，以参谋总部的拉迪任斯基上校为监护官（该上校后来任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其后任奥伦堡边务委员会长官）的新传道团前来北京接替他们①。已在北京的原传道团修士司祭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则被任命为新传道团团长（这样一来，从1820年②起，来北京的各届新传道团里就都有原已在北京的人员了）。维尼阿明是在他不在国内因而缺席的情况下被提升为修士大司祭的。奉派前来归他领导的有修士司祭阿瓦库姆·切斯诺伊神父（此人后来曾多次随普佳京③伯爵及阿穆尔斯基伯爵于太平洋各水域进行考察），费奥菲拉克特神父（此人于1840年那届新传道团到达北京前几个月死去），修士辅祭波利卡尔普（此人后来任下一届新传道团团长），教堂辅助人员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罗佐夫。世俗人员有：医士波尔菲里·叶夫多基莫维奇·基里洛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万尼科（此人回国后任火药局局长），……（此处字迹不清）④库尔梁德佐夫，叶皮凡·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及画家安东·米哈伊洛维奇·列加绍夫。同拉迪任斯基一起伴送

---

① 指接替1820年派赴北京的以彼得·卡缅斯基为首的那届传道团而言。——译者

② 根据本书所收的史料，应为1830年。——译者

③ 旧译普提雅廷。——译者

④ 原文如此，所以，后面的库尔德梁佐夫就只有姓，而不知道他的教名和父称。根据故宫所藏有关史料，此人名叫帕维尔（Павел）。——译者

新传道团到北京的还有科学院派的学者：邦格（系杰尔普特大学①的一位著名的教授——植物学家），富克斯（后来成为普尔科沃天文台②的天文学家），以及喀山大学的科瓦列夫斯基。

修士大司祭彼得所率领的那届传道团的成员回国后的情况如下：彼得本人（他是一个到处受人尊敬、品德完美、但缺乏远见的老人）受到了盛情接待，尽管他到达伊尔库次克后因当地的一位旅长说政府的坏话曾写信告发了这位旅长。有人曾建议让彼得担任主教，他拒绝了，他领取了二千银卢布的奖金，前往下戈罗德省巴拉赫纳县的戈罗杰茨修道院，四十年代末死于该地。彼得在北京期间曾有所记述，但他写的东西不知哪里去了，可能是在亚洲司丢失了。修士司祭达尼伊尔回国后曾在莫斯科的一个修道院（可能是扎顿斯克修道院？）任修士大司祭，后来（1837年）又从那里前往喀山，在喀山大学教汉语。其后，他又辞去教书的职务去外贝加尔的三位一体修道院（？）（可能在色楞格斯克附近？）。现在（1860年）仍住在那里。医士沃伊采霍夫斯基在中国由于治愈了一位亲王的病而出了名，但回国后在彼得堡却没有得到提升。他和他的同伴都没有得到曾经许诺他们在回国后给予他们的奖金。沃伊采霍夫斯基在达尼伊尔神父离开喀山后接替了他的职位任教，也开始教满语。他于1840年底去世，留下了很多子女（他的妻子是恰克图税务司戈利霍夫斯基的女儿）。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昂季耶夫斯基一直属亚洲司的编制，但薪水微薄。他曾参加普柳沙尔百科辞典③的撰写工作，也出版过一些小说和文章。他一直都未得到重用，可能是雅金夫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康德拉特·格

48

① 在爱沙尼亚，现名国立塔尔土大学。——译者

② 为苏联一著名天文台，在列宁格勒附近。——译者

③ 《普柳沙尔百科辞典》（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лексикон Плюшара），出版于1835—1841年，系俄国最早的百科辞典之一，因由普柳沙尔印刷所印刷出版而得名。——译者

里戈里耶维奇·克雷姆斯基很久前就在恰克图的一所学校里当教师。这个人虽不大聪明，但很善良（他曾跟随穆拉维约夫在阿穆尔河一带工作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在恰克图税关任翻译，后来就死于该地（他没有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索斯尼茨基任喀山中学附设实用汉语讲习班的学监。

修士大司祭维尼阿明的那届传道团内讧不已。维尼阿明是个狡猾、专横的修道士。他想把传道团的所有成员都当作自己的佣人来看待。由于远离俄国，他就自认为是国家的第一号要人。因此，库尔梁德采夫很快就回国去了；科万尼科接着也走了（系亚洲司召回的）；波利卡尔普也离开了传道团回国，为的是让他作下一届传道团的团长再返北京；费奥菲拉克特死了。维尼阿明的恶作剧终于使亚洲司再也不能容忍了，所以便委托阿瓦库姆神父于最后一段时期主持传道团。阿瓦库姆是一位罕见的品德高尚、对中国有
49 深刻研究、头脑清晰的人。即使他的短处也不使人感到讨厌。他自己常常对人提到当年在神学院学习时人们给他这个世俗大学生编的打油诗。当时他的名字还叫做德米特里。打油诗说："你不是德米特里·顿斯科伊①，也不是僭称沙皇的伪德米特里②，你是圣洁的③德米特里，可酒鬼中就数你第一。"传道团团员们相处得

①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Ди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Донской）：莫斯科大公（1359—1389），1380年9月在顿河附近组织了一次俄国历史上有名的库利科沃会战，击败了蒙古鞑靼人，"顿斯科伊"即得名于此。——译者

② 1598年，沙皇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死，外戚大贵族波里斯·戈都诺夫被推举为沙皇（1598—1605），其他大贵族极为忌恨。当1601—1603年俄国国内发生饥荒，农民四起暴动的时候，贵族散布谣言，说伊万四世的幼子德米特里（即沙皇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弟弟）未死，在波兰避难，不久就要回国。波兰国王西吉斯孟德三世乘机支持一个伪德米特里，于1604年秋率兵进攻俄国。1605年6月伪德米特里占领莫斯科，自立为沙皇，后被杀。波兰国王遂又支持第二个伪德米特里，进攻俄国，于1608年春打败当时在位的沙皇瓦西里·叔伊斯基（1606—1610），于同年6月初到达莫斯科邻近的土希诺村，时称土希诺沙皇。——译者

③ 圣洁的，俄文是Честной，因其中字母"т"不发音，故与这里所说的主人公德米特里的姓Чесной同音，根据下句，这里含有讽刺的意味。——译者

也不很和谐。据说，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最富有戏剧性的争吵。医士基里洛夫在这方面显然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他瞧不起传道团中的其他世俗人员，其实他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干净的。至于在同中国人交往方面，不论是从前的还是以后的任何一届传道团都比不上这一届传道团所交往的人那样显赫。最大的王公大臣都经常来拜访俄国人的寓所。仪表堂堂、精明能干的医士，修士大司祭维尼阿明(他也很会与中国人周旋)，还有画家列加绍夫(北京所有的达官显贵都到他这里来请他画像）都在这方面起了促进作用。至于学识，这届传道团中除阿瓦库姆神父外，就要算瑟切夫斯基了。他精通汉语，满语掌握得还要好些，但他的欧洲文化修养却不高，因为他是个布里亚特人，似乎连伊尔库次克中学都没有念完。他后来在恰克图和伊尔库次克供职。这个人很诚实，但性子比较暴躁，因而他常常做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例如有一次恰克图发生火灾，警察所长赶到火灾现场晚了，他就用鞭子把这位所长揍了一顿。

这届传道团回国后，全体成员都领得了奖金。维尼阿明被派往库尔斯克某一修道院任修士大司祭，那里经常举办盛大的贸易集市。后来，他过去的师傅都主教①把他召到彼得堡，让他当上了一级修道院的院长。据说，他在这里弄到了很多钱，并以管教修道士严厉而闻名。但在都主教死后，他因与新任的都主教不睦，遂被派至克里米亚的英诺森大主教处。据说这个大主教把维尼阿明搜刮一空，而维尼阿明则因忧郁而死。阿瓦库姆领到了一千卢布的奖金，留在亚洲司作顾问。基里洛夫也算作亚洲司的人，头衔是医生。他曾受到谢尼亚文的赏识，但后来与谢尼亚文相处得并不好。罗佐夫也留在了亚洲司，于 1853 年死去。安东·列加绍夫过着孤独的生活。

① 可能指都主教安东尼·拉法利斯基。——原编者

1840年，以亚洲司科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柳比莫夫为监护官（此人后来任亚洲司司长，现在是枢密大臣）、以修士大司祭波
50 利卡尔普为首的新传道团前来北京接替原传道团。波利卡尔普曾经是原传道团的修士辅祭，提前回国后得到了斯佩兰斯基的赏识。据说，他的这个职位正是斯佩兰斯基替他谋到手的。奉派出国之前，他刚从神学院毕业。传道团的大部分成员就是从这个神学院挑选出来的，计有：修士司祭英诺森·涅米罗夫和古里；修士辅祭帕拉季①；学生约瑟夫·戈什克维奇、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斯基、伊万·伊里奇·扎哈罗夫。波利卡尔普在神学院的好友戈什克维奇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好友画家科尔萨林。顺便说一句，此人的绘画技术比在他以前和以后到中国的画家都要高明。除这些成员外，只有两个人：医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塔塔林诺夫和派来完全归修士大司祭领导的喀山大学硕士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是波利卡尔普所不认识的。

这届传道团也说不上是相安无事的。亚洲司从来都没有赋予任何一个修士大司祭象波利卡尔普这样大的信任和权力。尽管如此，波利卡尔普还是害怕别人夺他的权，同时还在到处揽权。他是一个聪明人，而且也不能说是一个没有学识的人，所以他毫无修道士的那种伪善。虽然如此，他的那个乖张古怪、易于激动和反复无常的性格却使人难以忍受。例如：对待同一个人，他有时突然表示亲热，但没过几分钟又突然象对待佣人一样。虐待谁，袒护谁，他事先都有定见。毋庸讳言，在这方面他是按照亚洲司的意图行事的，甚至做过了头。修道士古里是造成混乱的另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尤其不可饶恕的原因。他在波利卡尔普手下所扮演的角色和维尼阿明在彼得手下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但古里比维尼阿明聪明

① 一译巴拉第。——译者

一些，因而也更阴险一些。而且古里与奥西普·戈什克维奇①都听阿尔巴津女人们的摆布。至于其他成员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看来科尔萨林似乎成了这些纠纷的牺牲品。古里及戈什克维奇曾唆使科尔萨林去控告瓦西里耶夫，说瓦西里耶夫与扎哈罗夫，还有塔塔林诺夫合谋要下毒药谋害他。天晓得这引起了一场多么大的争吵啊！修士大司祭非但未进行劝解，而且根本不想使科尔萨林与其他人重归和好（想必是科尔萨林向修士大司祭所控告的并不象修士大司祭对人们所说的那样），反而强令科尔萨林离开传道团回国，以此了结这一纠纷。但谁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令人特别应当惋惜的是那位有才干的心地极为善良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斯基。他完全是由于孜孜不倦的学习而死的。他甚至在吐血后仍通宵达旦地学习。他不仅学习汉语和满语，修士大司祭还要他学习藏语和蒙语，这就毁坏了他那钢铁般的身体。后来，对于他的死谁最感到惋惜呢？还是这位修士大司祭。 51

波利卡尔普回国后领得了一千五百银卢布的奖金，定居在雷宾斯克附近的尤格小修道院。英诺森和古里也领到了奖金，前者去旧鲁萨修道院当修士大司祭，后者留在基辅一级修道院。塔塔林诺夫与扎哈罗夫曾随科瓦列夫斯基去伊犁签订条约②，后来分别担任了伊犁领事和塔尔巴哈台领事。在塔尔巴哈台中国人焚烧贸易圈之事发生后，塔塔林诺夫于1855年返回俄国，后又被派往中国进行考察，和伯爵③到处进行活动，一直到天津和约签订时为止。和约签订后他又被派作信使返回彼得堡，1859年又随伊格纳季耶夫前来北京。扎哈罗夫一直在伊犁，后来去塔尔巴哈台同中国人签订了关于焚烧塔尔巴哈台贸易圈的赔偿条约。他再一次回

---

① 即约瑟夫·戈什克维奇。——译者

② 指1851年中俄伊犁通商条约。——译者

③ 此处漏掉了“普佳京”一词。——原编者

到伊犁时已是总领事了。戈什克维奇随普佳京去过日本，曾被英国人俘虏，回国后出版过一本日文字典，后又奉派出任函馆领事。虽然他在北京时曾是天文学家，而如今已经是又瘸又瞎了。瓦西里耶夫回国后，接替了已故的沃伊采霍夫斯基的职位在喀山大学任教授，之后，又从那里调至彼得堡大学。

帕拉季（他曾被提前从北京召回彼得堡以便让他削发为修士大司祭）为首的传道团是在1849年随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前来北京的。这届传道团的成员有：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和帕维尔（后者死于北京），修士辅祭伊拉里昂（也已去世），两个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个姓乌斯平斯基，另一个姓涅恰耶夫（均已故去），康斯坦丁·安德烈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此人因病比别人早回国，后来被派去接替塔塔林诺夫任塔尔巴哈台领事。到回国时，同帕拉季一起回去的只有：医士斯捷潘·伊万诺维奇·巴齐列夫斯基、米哈伊尔·达尼洛维奇·赫拉波维茨基（此人曾翻译天津条约）、画家伊万·伊万诺维奇·奇茹托夫及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此人已完全堕落成酒鬼）。

这一届传道团由以佩罗夫斯基为监护官、以古里为首的传道团所接替。

第四部分

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前往中国京城北京的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的工作指示 53

该修士大司祭于驻北京期间必须按下列规定行事:

一

尔修士大司祭于驻北京期间立身处世要符合神圣的修士身份。对宗教要笃信不渝,举止要端庄持重,要用热爱神的品德来管理当地的教徒;工作要勤奋努力,切勿怠惰;要以身作则,做出一切美德的榜样;要尽力防止你所管理的教徒发生不良行为,以免引起人们对俄国教会和俄国人民的非难;要按照你的品级穿着服装和从事神事活动,万万不得做没有规定的和不允许的事,万万不得做圣经、圣规和圣父箴言中所弃绝的以及教会章程中所绝对禁止的事;应当遵循圣徒和圣父的箴言并按照教会章程来管理教会的事务和其他与你的职务相适应的以及你的职务所特有的一切事务;遇有困惑莫解的宗教问题,可请求你所属教区即伊尔库次克教区至圣的主教给予解答。

二

一到中国就要努力学会使用他们的语言，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就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向他们传授福音眞理。尽可能地号召那些愿意信教的人虔信宗教。在这方面要尽一切努力按照福音训诫那样去做，宣讲的只应是新约中的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上的眞理。由于听道者尙处于信教的初期阶段，故除了最必要的、为奠定信教基础所必需的教义外，不要用许许多多的诫命去加重
54 他们理解上的困难。即使这样，也要遵照下列程序进行讲道，即论证：第一，神的存在，神创造世界的伟大、完美，神创世的全能和全智。第二，教义。第三，人罪。第四，需要赎罪，免受神的严厉审判。第五，需要救世主和圣诫。第六，关于教堂和圣事。讲解上述眞理要愼重。在听道者尙未接受，也沒相信某一条眞理之前，就不要讲另一条眞理；在讲解每一条眞理时，要努力做到使后一条眞理成为前一条眞理的结论。在讲解教义时特别要规劝教徒：第一，要全心全意地热爱神、崇敬神。第二，要摈弃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要把它完全忘掉。第三，以崇敬的心情默念神的名字，在起假誓时不得呼唤神的名字。第四，要爱戴和尊敬自己的父母。第五，星期日和节日要到教堂去，要虔诚地祈祷，要注意聆听神的道理；如果因故不能到教堂去，就要按时在自己家中祈祷。第六，要爱他人，不要做什么事情使他人感到委屈，不要使他人不快，不要给他人带来任何痛苦，更不能杀人；相反地，要尽可能为他人做好事；也要爱护自己的生命，需知，按照神的意旨，人沒有权利自己毁灭自己；还要劝人们不要酗酒，要热爱劳动。第七，夫妇生活中要保持忠实贞洁。在与别的异性交往方面也应如此。第八，不要抢夺他人的任何财物，更不能偷窃他人的任何财物；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一切，要努力用自己的劳动去获得。第九，不要诽谤、诋毁、欺骗他人。第十，不要

妒忌他人的财产，也不要贪图他人任何财物。第十一，不得只信教而不行善。第十二，关于圣像一节，要教诲人们不要把圣像就当作是神本身来崇拜，而是作为神的一个形象来崇敬，通过这个形象使人们记住圣像上所画的那个圣者的名字。因此在圣像面前祈祷时，要记住不是崇敬画像本身，而是崇敬画像上所画的那个圣者。第十三，开始时使信道人知道这些就行了。而所有这一切都应让信道人自己去判断，绝对不能加以任何威吓，更不能为此而施加任何强力。至于谈到教规，诸如每天要读很多经文，每周要恪守数日斋戒，每年要恪守数周斋期等，所有这些教规，在初期阶段，应经常提醒他们，绝不能强迫他们象从小就习于严守基督教教规的人那样严格遵守这些教规。要以最浅显的道理来宣讲信神和信救世主是基督教的首要原则，而遵守教会各种制度和恪守斋期则有助于眞心信教。此外，还要讲解，遵守圣经十诫是基督教最主要的美德，而 55
这种美德，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都是与信仰分不开的。在使信道者遵守复活节前的那一个礼拜的斋戒时要尽可能地用规劝的方式，因为就连圣徒保罗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采取迁就态度的。他在《达歌罗西人书》第二章第十六条中写道："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①又在《达罗马人书》第十四章第二十条中写道："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②既然迁就不会使应该向其传道的人犯罪，因此，在讲道时就不要强迫他们恪守斋戒，而应用耐心规劝和等待的方式达到这一点。这里应当明白，一个信仰异教的人一旦眞心实意地相信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他就会主动恪守所有的教规和教堂仪式。然而只要一强迫他们恪守斋戒，那么严格的要求就会使他们更加害怕，因为他们还不惯于分辨斋期该吃那些食物。总之，在上述传道活动中，也

① 引号中的译文引自圣经公会印发的《新约全书》第265页。——译者

② 同上，第208页。——译者

应当照着圣徒保罗那样去做。圣徒保罗决不是一下子就让新入教者(因为他们的信仰还不坚定)丢掉过去的、和基督教不相适应的一切仪式,而只是向新入教者加以解释,使他们不要以为过去的仪式就是一切宗教的常规。第十四,除上述教义外,不得添加任何迷信的东西,毫无意义的故事,伪造的神的奇迹和启示,更不得宣讲任何地方和任何教规都不准许的,至少圣经上没有记载的寓言,尤其不得自己杜撰一套,以免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在向他们进行上述劝化后,要给他们施以圣洗,并教导他们虔信教义,遵守圣诫以及合乎基督教教义的生活方式。在世俗生活方面由他们凭良心行事,绝不要使他们感到为难,不要反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特别在饮食和衣着上不要干涉他们,但他们的风俗习惯中有违教义者不在此限。同时要规劝他们不要再到自己过去的祈祷上供之处去(如果现在还存在的话),不要再听过去的师父祈祷念经,不要再保存偶像,而且不要再崇拜这些偶像。要提醒他们,根据圣经记载,由于犹太部落抛弃了拯救他们的神而崇拜偶像,神是怎样多次严厉地惩罚过他们。

三

接受新教徒入教要谨慎,不要对那些不是出于真心来听道的人发生兴趣,更不能接受他们入教。尔修士大司祭每年需向全俄
56 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和你所属教区的主教详细报告:当地人民中领洗的有多少人,什么时间领的洗,领洗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报告中应附上新领洗人的名单,列出新领洗人的中文名字、教名和身份,注明年龄。

四

上述北京教堂于二月份奉献节期间要举行宗教庆祝活动。这

时应向北京的笃信希腊正教和新入教的人宣讲奉献节的意义，并讲清楚为什么这一天俄国教堂要举行庆祝活动，目的是使他们不致误认为二月里举行庆祝活动，也跟中国人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在这个月举行庆祝活动是一样的道理。因此，不能按不信基督教的人的方法和精神举行庆祝活动，而要效仿和遵循神圣的俄国教堂的礼仪。这样做是神圣的虔诚信仰所要求的，不容稍有他们原先所信仰的异教色彩，更不容模仿那种异教的做法。

五

每逢女皇陛下的诞辰、命名日、登极和加冕典礼纪念日，皇室成员的诞辰和命名日以及凯旋纪念日，尔修士大司祭一定要按照教会规定的仪式举行彻夜的祈祷和包括唱祈祷诗在内的利图尔吉亚，以祈至善的神保佑。在规定的日子里，要为每一位已故的享有最大光荣的、值得后人永远怀念的、虔信神的沙皇、大公、俄国皇帝以及皇室成员举行追荐仪式，为死者祈福。如果由于某种充分的理由不能如期举行，也要在其他日子，至少在当月，按教会定的仪式悼念死者。

六

尔修士大司祭对待汉人和住在北京的其它民族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谦恭、温和、庄重、沉着。凡事都应审慎，要照顾和尊重他们当地的习俗。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表示怨恨，不要有任何敌对的举动，免得由于你的举止不端和傲慢无礼而妨碍他们虔信基督教，甚至引起对俄国人的非难。你在各方面都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是身负重任的人，举止要端正。 57

七

尔属下的修士司祭、修士辅祭、教堂辅助人员和学生都要绝对服从尔修士大司祭。要把你作为父亲、作为教诲并引导他们得到拯救的人来尊敬。因此在各方面他们都要象羊群听命于牧人、孩子听命于父亲、学生听命于自己的教师一样听命于你，不容有任何不听话的现象发生。要绝对服从，而且他们（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都应行为端庄、戒酒、不得有任何不体面的行为；学生则应勤奋学习，切勿虚度时光。对那些玩忽职守、不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以及那些酗酒、举止不端和其他行为不轨的人，尔修士大司祭均不得姑息。首先对他们应进行必要的规劝，按照他们过错大小加以申斥。如果这样处理以后，他们的行为尚无较好的表现，就用停发薪饷来制服他们。万不得已时，可以处罚他们，但要慎重；也可以吓唬他们，即要把他们作为违抗自己上司的人遣返俄国，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八

上述修士司祭和修士辅祭绝对不得参加住在当地的俄国人举办的宴会，要劝阻他们去。如果他们由于某种必要一旦去了，那么绝对不许喝醉，并且要想尽办法做到这一点。你们彼此之间以及和外人相处均不得蛮横无礼，争吵打架，胡作非为和侮辱他人，以免因此使俄国宫廷和俄国人民招致非难和耻辱。一旦需要进城找人，在街上行走态度要庄重，要规规矩矩，不要过问不相干的事情，任何地方都不要随便停留。

九

尔修士大司祭于驻北京期间，一有机会就应尽量把当地动态

认眞详细地写成材料上报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

十

如果尔修士大司祭有机会能与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或其它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什么地方相遇或交谈时，对待他们要亲热，但同 58 时要谨慎，不要深谈。绝对不要和他们辩论信仰和教义问题。

十一

在你前往北京途中和驻北京期间，为执行委托给你的职务，切勿做出任何与你的职位不相称的和与你的职位无关的泄密事情，否则，一定要受到命令上规定的惩罚，决不宽恕。如果国家事务中有什么必须保守秘密的事情，那么绝对不能在私人信件中提及。要按照彼得大帝于 1724 年 1 月 13 日颁发的谕旨所规定的那样去做。兹将此项谕旨的抄件附后①。

1780 年 4 月 6 日

① 原书未见附有该项谕旨抄件。——译者

59

第五部分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呈文节录[1][2]

靠修士大司祭的助手们传道，不仅不能使中国人改信正教的工作取得任何成效，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尤有甚者，由于他们没有学识，还要受自作聪明的中国人鄙视和嘲弄。中国人认为以这些野蛮无识之辈为师，是莫大的耻辱，因为这些人既不懂他们的风俗习惯，又不通其语言，蓄着不象他们那样的大胡子，衣著(高筒帽子和窄腰肥袖的袍子)也与他们完全不同，既古里古怪，又使他们极端反感。这些情况，就中国人的风尚来看，我认为是使他们改信正教的头一重障碍。

通过传道使中国人信奉基督教的第二重障碍是，连使异教徒真正了解上帝的最平常的慈善机关都没有。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只有等候圣座裁夺。因为要千千万万骄傲而又固执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去适应四个俄国人，仿效俄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同样，也不能指望某个中国人在看不到将来有好处的情况下就愿意学习俄文。因此，最好是象圣座给修士大司祭的工作指示中所吩咐的那样，让少数俄国人适应为数众多的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若能给修士大司祭一道手谕，命令他本人及其他神职人员穿

① 这个标题是我们根据内容改拟的，原文此处的标题是《一篇没有标题的记事》(Записка без заглавия)。——译者

② 这篇呈文节录无疑是出自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手笔。——原编者

戴都完全和中国人一样，则通过这种办法，则俄国司祭同自尊心很强的中国人交往起来，就比穿着中国人觉得可笑、又使他们反感的修士服装要方便得多。

使中国人改信神圣的基督教的第三重障碍是俄国人本身的品行，因为不仅修士司祭可以随随便便当着那里的居民的面极其下流无耻地指着鼻子辱骂自己的上司修士大司祭，连教堂辅助人员和学生也都可以轻易地干出这种事来。我的前任修士大司祭约阿 60
基姆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教堂辅助人员谢苗·索科洛夫斯基，在修士司祭阿列克谢的教唆和指使下，甚至揪掉了他的胡子。他曾经流着泪亲口向我述说过阿列克谢的许多阴谋捣乱活动。因为那里常有这等情事：只要这些名义上的属下人员全体商量好和自己的上司作对，那他们就会使他蒙受奇耻大辱。这种耻辱我也遭受过很多次，特别是受过教堂辅助人员鲍戈罗茨基的①，也受过别人的。由于在北京的这些属下人员认为会很长时期地住在那里，而且他们回到俄国也不会因这种行为而受到任何惩罚，所以他们就特别狂暴和厚颜无耻地攻击自己的上司，而后者却无从得到庇护。中国人见到这种情形，很受影响，而且由于无知，于是就觉得俄国的宗教不好，说它既不教其信徒遵守教规，也不教他们遵守良好秩序，所以俄国人没大没小，每个人都妄自尊大。

第四重障碍是皈依神圣的基督教的人反复无常。这从下面情况即可看出：天主教传教士现在还在给不少的中国人施洗，可是自从他们开始从这些中国人那里取得保证书以来已有好几年了，当时中国人就曾经提出过书面保证：永远信奉基督教，始终不渝地遵守罗马教会的教条，永不崇拜偶像，永远承认罗马教皇为全基督教的领袖。很显然，天主教传教士在从这些入教的中国人那里取得

---

① 在原稿中接着还有“和学生卡缅斯基的”这几个字，但被勾掉了。——原编者

保证书的当时就已经是深受其骗了。

上述对派到北京来的神职人员在使异教徒改信神圣的基督教方面非常不利的四重障碍，如果圣座认为可以制定如下措施，并命令派来北京的修士大司祭及他管辖的其他神职人员必须遵照办理，则其中某些障碍即可比较顺利地予以排除。

一、不论是修士大司祭或其属下神职人员，都要从上过神学校并修完全部课程的人员中选派。倘若其中有人懂得医学，那怕只懂得某一门医学，这对达到传教目的也不无好处，因为医生在那里是很受尊敬的。此外，年龄最好不超过二十二岁，或至多为二十
61 五岁，因为在这个岁数，还便于掌握汉语书写和会话。如果再让他们在服装上也与中国人完全一致（否则中国人总是排斥和鄙视外国人的），那他们就能使异教徒改信神圣的基督教了。现斗胆向圣座实言，由于穿着俄式修士服，中国人一见就惊奇和嘲笑，所以俄国神父连门都不能出。正因为如此，天主教传教士为了便于同中国人交往并引导他们入教，一从欧洲来到中国，马上就穿起满清中国的全套外装。另外，在文件中不称修士大司祭及其属下的司祭为喇嘛，也非常必要，大有好处。因为喇嘛是对多神教祭司的称呼，所以它不仅对神圣的基督教来说是不体面的、可耻的，而且基督教司祭用多神教祭司的称呼也很不相宜。若再就当地民众的风尚来看，那末对中国人说来，以蒙古喇嘛为师远比以纯粹外国喇嘛为师感到亲近。因为前者与他们有同一的信仰、同一的法律和同一个君主，连风俗习惯也几乎一样；而后者则在各个方面，如同信仰一样，全都与他们不同。而且在中国，由于皇帝本人就执行最高祭司之职，大臣们则是皇帝履行祭神仪式的助手。由此可见，世俗官员也执行着祭司职务。在中国，为民师表的头衔只归于皇帝和大小官吏，而他们被公认为全体民众的师表，也只是就道德和世俗法律方面而言，并非就供奉神灵方面而言，因为中国人和其他异教徒一

样，在供奉神灵方面没有这样可称做“为民师表”的人。因此，喇嘛、和尚和道士，由于上面没有象蒙古地方那样的宗教领袖，所以被视为平民和无足轻重的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任何一个汉人或满人都不以他们为师。

二、排除上述障碍的措施是设立神学校，以便仿效天主教传教士那样招收赤贫孤儿入学（人数由圣座规定）。首先教他们学习本国语文。为此，需要为他们聘请中国教师。这就还需由沙皇陛下拨出一笔款项。而建校初期，如建造教室、修建适于儿童居住的宿舍，以及购置其他一切必需物品（教室、宿舍及必需物品的数量需视圣座要招生多少而定），考虑到当地各种物品都十分昂贵，据我看，为此需沙皇陛下拨款白银一万两。中国教师除了教学生外，还 62
可教修士大司祭及其他神职人员的汉语。待学生们将汉语学到我认为可观的程度，就教他们诵读和按乐谱唱俄文诗歌，以便在教堂执行教堂辅助人员的职务。至于派来的教堂辅助人员，由于他们在北京生活放荡，为所欲为，不仅不尊重、不服从自己的上司，而且还下流地当面辱骂，甚至还有人竟敢殴打自己的上司。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使上司不得安生。因此，如果我们也象天主教传教士对待领过洗的中国人那样，教会神学校学生读经唱诗，并由教会供给他们生活用费，那么派教堂辅助人员前来北京就将既不需要，也无好处了。若有某些学生毕业后想当神职人员，我认为最宜于教他们下述课程：俄语语法、演讲术、逻辑学和必不可少的劝人为善的神学。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花很大气力，而且由于我们没有仿效欧洲传教士那样在中国设主教，将来由谁提升他们为神职人员呢？天主教传教士通过中国神父在中国拥有教徒二十万。假使他们要自己直接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即使他们的办法再好，恐怕连使五千人改信基督教也办不到。可见中国神父使自己的同胞改信神圣的基督教的本领比俄国或罗马神父要大得不可比拟。

三、[1] 至于通过传道使中国人改信神圣的基督教的第三重障碍，那就唯有圣座才能予以消除。办法是对那些在北京的名义上是修士大司祭的属下人员，只要他们不尊重自己的上司，回国后不容他们作任何辩解，就加以体罚，决不宽恕。因为除了体罚以外，任何其他惩罚，他们都不害怕。否则，修士大司祭由于孤立无援，无法自卫，对这些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之徒不仅束手无策，自己反而成为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攻击和莫可名状的污辱的人了。

四、[2] 传教的第四重障碍与中国人的特性有关。怎样才能更好地克服这一障碍，要看将来在采取了上述三项措施后的情况如何而定。上述各项办法之所以在1798年致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呈文中没有提及，是由于那时我新来乍到，还不懂得这些办法。63 现在对这些办法既已了解，故特恭呈圣座明鉴。然我并不敢要圣座一定相信，采取上述措施后在中国传播神圣的基督教就一定能取得良好成绩(这完全要仰赖上帝的保佑)，而是因为如欲消除上述四重障碍，就必须制定完全不同于现在驻北京的神职人员通常所遵守的条例。但如果不考虑到在中国法律上明文规定不许中国人与外国人(俄国人也在内)交往这一事实，也许就无法制定出新的条例来。此外，还必须每年从沙皇陛下的国库中拨出不少款项用于上述措施，而且每年都必须及时领到。但是除了上述办法外，我就再也想不出用合乎福音的传道方式使中国人信奉神圣基督教的更好的办法了。

关于阿尔巴津人的情况，谨向圣座禀报如下：他们很早以前就已完全不信基督教了。因此，他们还和早先一样，既不重视教堂，也瞧不起司祭。而且他们现今还活在人间的已为数不多了。目前这些人当中有三、四人只是在复活节那天才到教堂来，因为过这个大

---

① 原文此处未标明“三”。这是我们为了清楚起见加上的。——译者

② 原文此处未标明“四”。这是我们为了清楚起见加上的。——译者

节设筵颇为丰盛，他们常是席上客，即使如此，也并非每年都来；若不是为了这餐饭，恐怕连一个到教堂来的都不会有。而且只要他们到教堂来过复活节，就得好好看着他们，以免他们偷走什么东西。另一些阿尔巴津人，则难得有一年于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做斋戒祈祷、忏悔、领圣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以肯定，也是出于上述原因，并非要尽基督徒的义务。

至于说到要派四名学生来学汉语和满语一事，仅向圣座冒昧进言，为了节省国库开支和避免无谓的损失，可否允许不派他们到北京来，而改在伊尔库次克教这两种语言，并为此开设学校，按所需人数招生，指定上述两种语文的翻译为其教师，或者，如果圣座认为在紧靠边界的地方设立此种学校，由北京朝廷派教师教他们为好，这样也行。这也比让他们在北京学习能大大节省国库的开支。更何况学生们是在本国学习，又处于自己政府的监管之下，他们或者害怕由于行为不良和学习懒惰而会立即受到应有的惩罚，或者感到如果品行良好、学习努力就可望立即受到应得的奖励，所以必然很快就会在掌握他们要学的语言上显示出良好的成绩，并 64
因有所畏惧，一定会经常注意保持自己的品行端正。若在北京，他们就会因无所畏惧而轻视这些分内之事，且由于长期住在那里，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寂寞无聊，因而纵饮无度，断送自己的天赋，甚至往往葬送自己的生命。如果圣座认为除中国外，在俄国任何地方教学生上述语言都不适宜，那么就极需为他们在北京的住房和其他不可缺少的需要，如购置足够的图书等，拨出一笔专款，因为中国理藩院在俄国新传道团到达之前从不修理学生用房，而教堂经费为数又很有限，无论如何也不能挪作修理学生住房之用，因此，一遇雨天，宿舍漏水，学生们就无处可以容身。

第六部分

65

修士司祭

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所著《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择录

（此人系1745—1755年以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为首的驻北京传道团成员）

在该《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末尾，斯莫尔热夫斯基亲笔写道："这部著作是我这个有罪的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于1751年1月22日写就，时逢三十五周岁生日。"

第二节[1]

随修士大司祭列扎伊斯基来的修士司祭拉夫连季神父

1. 从俄国人开始在北京居留起直到现在，在北京共有三个名叫拉夫连季的，而且都是修士司祭。头一个就是随列扎伊斯基来的那个拉夫连季；第二个是随特鲁索夫来的，姓乌瓦洛夫[2]；第三个姓鲍勃罗夫尼科夫，曾接替特鲁索夫，代理其修道院院长之

① 原书仅择录了第二节和第四节。——译者

② 前两个拉夫连季实为一人，见本书第六章第四十四节——第四十六节。——译者

职。为了分清他们三人，读者必须记住这一点。

2. 因此，先在这里谈一谈头一个拉夫连季。据说，他原是一个未削发的首席司祭，以后隐瞒了身分干了某种勾当（当强盗），后来逃往西伯利亚……① 削发为修道士，由列扎伊斯基选拔为修士司祭，并随他来到北京，来的时候很穷，甚至连件好衣服都没有。

3. 下面这件事本来可以不谈，但通过这件事可以使我们在派遣传道团方面得到很大教训并今后引以为戒，所以还是不妨追述一下。在前面第一章第八节②中业已谈到，在列扎伊斯基率领的传道团前来北京时，曾给他们发过购买仆役和房屋用的银两。拉夫连季用这笔钱买了一个男仆及其妻子，给他们二人施了洗礼，并给男的取名叫谢苗，女的叫费奥多西娅。

4. 他和这个费奥多西娅之间是否有暧昧关系，将来上帝会裁判，不过这里的人对他是有议论的（此事下面再谈）。关于费奥多西娅的传闻，不仅在俄国人中间，而且在没有领洗的中国人中间都广为流传，因此我现在就来谈谈这种传闻。但我所谈的只是依据传闻，并无真凭实据。

5. 这个费奥多西娅不论在其夫生前或死后，差不多总是住在拉夫连季那里，仿佛是他的妻子和他家的主妇那样招待客人，照应拉夫连季。对拉夫连季这个醉鬼的身体健康十分爱护，对他的财物也极尽保管之能事。 66

6. 由于费奥多西娅经常到他这里来，而且多半是晚间（特别是因为住在他那里），所以一群中国孩子就聚集在他家大门前，照他们自己想象的或者听见过她到拉夫连季这里来时叩门呼唤的那种声音，一边推门，一边用手指捏着鼻子喊道："让我进去，我来

① 手稿此处空白。——原编者

② 见本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第35页。——译者

了”，以致拉夫连季不得不常常拿着鞭子跑出去撵他们。

7. 这个费奥多西娅生了两个儿子。拉夫连季给他们施了洗，一个取名叫伊万，另一个叫伊拉里昂；拉夫连季在自己家里教育他们，教他们认俄中两种文字；给他们娶了媳妇，还给他们买了房子、置了地，把他们当作养子或义子来赡养，并把他们的媳妇由乡下弄来施了洗礼。

8. 人们通常称他们二人为司祭的儿子，而他们自己有时自称为谢苗之子，有时也自称为司祭之子，署名也是如此。

9. 至于他在日常生活方面则极其吝啬，爱财如命。据说，他常常只穿一件汗衫，戴着一顶草帽，在市场上逛游，买了什么东西就往肩上一放，扛回家去。

10. 在列扎伊斯基故去，菲利蒙也回国后，他就照管他们遗留下来的房子，收取租金。后来菲利蒙随伊尔库次克主教定居于伊尔库次克，继而身殁，就是这时他仍把出租房子所得的那些银子据为己有。科兹马和雅科夫·萨文发现别人的银子归拉夫连季享用，而他们却没有用着，而且拉夫连季还使两个儿子或养子发财致富，所以不知是出于羡慕，还是出于忌妒，抑或出于愤懑，他们就开始逼他，要他把出租房子所得的那笔银子交给教堂。拉夫连季拒不交出，于是他们就跑到蒙古衙门① 去说：如今他们那里已经没有修士大司祭和修士辅祭了，现有的人都是住在俄罗斯馆里，何必让某处和某处的房子闲着，最好把闲置不用的房子收归官家。于是这些房子就被蒙古衙门收回去了，直到现在还由蒙古衙门出租。据说，当蒙古衙门从他们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蒙古衙门的办事人员就把租银私分了。关于这一点在第四册中将详加叙述。不过，请读者记住这一点，以便将来一定要有所交待。

11. 在这以前，先是至圣的伊尔库次克主教英诺森，后来菲利

① 即理藩院。——译者

蒙本人也都给拉夫连季写过信，要他将租银换成货物连同菲利蒙 67
留在北京的衣服一并寄给他们。但是拉夫连季却只给他们寄去了一件或几件祭服，说别的都被老鼠和黄鼠狼咬坏了。至于银子，则避而不谈，只是说两所房子都已为中国官家收回，但收回的原因和时间，却只字未提。

这个拉夫连季在商队来到北京的时候，还烤过面包干卖。1732年卖面包干时，他曾对拉夫连季耶维奇① 说，天晓得你们是什么鬼秤。结果好不容易才从这场风波中脱身，因为兰格不依不饶，问他为什么要诋毁官秤。

1736年，修士大司祭特鲁索夫带了两名修士司祭来到北京，要把这个拉夫连季带回俄国。就在这时，连普拉特科夫斯基也乘机告他，说他和别人的妻子私通并有了两个孩子，而且带醉进教堂作祈祷。于是商队办公处就把修士辅祭约阿萨夫（普拉特科夫斯基提出约阿萨夫可以作证人）召去，问他："你是否见过拉夫连季和别人的妻子在一起睡觉？"他说，没看见过，只见过这个女的在他家里当佣人。关于此事，也问过拉夫连季本人，还问过别的人，但谁都没有说出什么来。这样，商队办公处便认为修士大司祭是在诬告拉夫连季。

第 四 节

关于列扎伊斯基率领的传道团中的教堂辅助人员

1. 在上文中，我已提到这些教堂辅助人员的人数，也许只是漏了两名，而且也谈到了中国皇帝赐给他们购买口粮、住宅、奴仆

① 即劳伦茨·兰格，俄国名字是拉夫连季·拉夫连季耶维奇·兰格——译者

等的款项。现在再简单地追述一下其他情况。

先一般谈谈。首先从日常生活谈起。在列扎伊斯基前来北京途中，他的马车队由教堂辅助人员照料。夜间，安德烈·彼得罗夫想喝酒，他躺在床上对别人说起话来："喂，夥计们，夥计们！你们怎么不看看马，喂喂它们！"说了一遍又一遍，一直说到修士大司祭听见了，问道："是谁还没睡？"于是他回答道："是我在给马添点草料！"他一边回答一边又说："嘿，恰尔科，恰尔科；嘿，你这个雷日科，雷日科；西夫科，西夫科①！"一直用这样的声音来哄弄修士大司祭，好象他在抚摸它们。于是修士大司祭叫他到跟前来，说："我已看出，唯有你心地善良，赏给你两个钱，拿去买杯酒喝吧！"接着就给了他钱，这时他便立即起身去买酒。他这样哄骗修士大司祭，搞了不少时日，直到别人说他是躺在床上空口说白话假装喂马为止。

在那批学生当中，结婚的只有约阿萨夫。他先是给女的施了洗礼，随即就跟这个女的结了婚。他精通满汉两种语言，并在蒙古衙门设立的俄语学校里教课。几乎只有他一个人会唱诗，读经，不喝酒，给神圣的教堂增添了光彩。他死后没有留下子女，妻子改嫁满人，也不再信教了。68

关于修士大司祭普拉特科夫斯基

条约缔结以后，普拉特科夫斯基以修士大司祭身分来到北京。司祭则是伊万·菲利莫诺夫②（另一名司祭则让老拉夫连季留任），修士辅祭是约阿萨夫，教堂辅助人员是一个名叫纳拉巴尔金的和另一名叫安德烈的。关于所有这些人员的情况，我都要分别加以叙述。

1. 关于修士大司祭普拉特科夫斯基。由前所述可知伊利里

① 恰尔科：带杂色的灰马；雷日科：棕色马；西夫科：灰黄色马。——译者

② 即本书第六章第四十五节提到的约翰，见第61页。——译者

亚伯爵[1]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是怎样及何时作为使节被派往中国的。关于派遣该使团的缘由及驻华时间和上文提到的他所签订的那些条款，这里没有必要再加以追述，请看前文。

从前一章第三节第六点[2]中还可以看出，菲利蒙回国后散布了一些什么，而且也可看出他已向某处递交了一份呈文。不知是由于他的呈文起了作用，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们后来只听说最高当局当时曾下达了一道谕令。如果在那以前早就颁下这道谕令，星星之火自然会形成燎原之势的。

由于那时决定派往北京的不是修士大司祭，而是主教，为此特将在海军中服务的修士司祭长英诺森·库利奇茨基提升为主教，名义是弗拉基米尔和佩列斯拉夫利—扎列斯基两地教区的主教。发给他的训令是彼得大帝陛下御笔签署的，其中有很多条都是极仁慈的皇上亲笔所加(这是我听约瑟夫说的，此人曾不止一次见过这道训令)。训令中命令他从僧俗两界为传道团挑选足够的人员，因此他从莫斯科挑选了不少人：从纳法奈伊尔主显节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中挑选了英诺森、戈卢别茨·塔拉斯(现名吉洪)、格拉西姆·基里洛维奇·列勃拉托夫斯基、约瑟夫即约阿萨夫等人作可以接受忏悔的神父。

他来到边界驻在色楞格斯克，当时正值伯爵先在北京，后又回到俄国与中国人着手谈判派遣他赴华事宜。伯爵曾坚持让主教带十二名人员赴华，而中国人则最多只接受四名。主教开始让了点步，只要能进入中国，四名也行，并把这种想法禀告了伯爵。

伯爵尚在全面衡量如何处理更为合适，这时在伊尔库次克当修士大司祭的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由于想去北京开始设法博 69
取伯爵的信任。为了使伯爵更加讨厌主教，普拉特科夫斯基竟玩

① 伊利里亚伯爵原文作 Граф Алирийский，应为 Граф Иллирийский，《中俄边界条约集》译作伊里礼伯爵。——译者

② 见本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第39页。——译者

弄了这样一套把戏：他先打听到伯爵要到主教那里去的时间，然后他本人提前到主教那里去聊天，硬劝至圣的主教同他喝了两盅。由于主教平常很少喝酒且酒量极小，因此就喝醉了并且睡着了。刚一睡着伯爵就来了。人们把主教唤醒，但他从醉梦中惊起，神态与平常大不相同，在伯爵面前显得醉的非常厉害。接着普拉特科夫斯基本人或者通过伯爵的亲信，或者通过自己的秘密帮手变本加厉地在伯爵面前反复地说这件事，致使伯爵对主教有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他经常醉酒，因而断然取消了派他去北京的任命。这件事不仅当时在场的修士辅祭约阿萨夫知道，就连普拉特科夫斯基本人也在北京当着领过洗的中国人的面胡吹过、取笑过。

普拉特科夫斯基被选中后于1729年6月17日带领传道团来到北京。盘费全由中国负担，沿途供给大车和饮食。但是由于普拉特科夫斯基在北京的所作所为荒诞之极，不论俄国人或北京人，不论是在蒙古衙门当差的或耶稣会教士，没有一个人对他本人和他的所作所为说过一句好话。例如，当我们即将离莫斯科前往北京时，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办事人员安德烈·马尔索奇尼科夫、米哈伊洛·弗先，就把办公厅里一大堆有关普拉特科夫斯基的案卷拿给我们看，并说：当心，你们在北京可不要出这么多事。瞧，他是根据条约第一个到北京的，可是却开创了这样的先例和风气。至于现在糟到什么程度，还是有所改善，这就全在他了。

另外，还有在俄罗斯馆盖房等项也是从他那时开始的。关于所有这些，笔者都要费点气力加以叙述，而各位读者也要记住。下面大家就会亲眼看到所有这一切的详细情节。

普拉特科夫斯基带领传道团到达北京时，当时北京只有尼古拉教堂一座。普拉特科夫斯基在北京时是住在俄罗斯馆的客厅里，其他宗教人员则有时住在商队的宿舍，有时住在后边一排学生宿舍，只是遇有节日或隆重典礼时才从这里到尼古拉教堂去。

尼古拉教堂在大地震时完全毁坏，后由俄罗斯佐领集资重建，于1732年在拉夫连季·拉夫连季耶维奇·兰格率领的商队到北京期间峻工，同年8月5日由普拉特科夫斯基主持了教堂圣化仪式。

由于议约时中国大臣们答应将协助建立一座新教堂，因此，缔约后就在俄罗斯馆内由中国朝廷出资修建了一座新的教堂。虽然条约载明由中国大臣等协助修建，但由于是中国朝廷出资，所以这座教堂是按照刚刚传到东方来的法国天主教教堂的样式修建的。这座教堂在普拉特科夫斯基到来之前就已动工。在举行奠基礼时本来派了尼古拉教堂的拉夫连季前来主持，但是由于他醉得象死人一样，不能出席，只好由教堂堂长德米特里·涅斯托罗夫自己奠了基。至于为什么以奉献节的名义奠基，我怎么也弄不清原委，但我猜想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伯爵是在1727年3月21日在北京签订了条约的头几项条款的，所以他大概是二月间来到北京的，而二月里没有比奉献节更大的节日，所以就用奉献节的名义奠基。如果伯爵到达北京的那天正是奉献节，这种猜想就更为切合实际了。第二，可能中国新年开始在二月上旬，或者就在2月2日①这一天，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所以要在此期间让人们举行庆祝和祷告来崇敬上帝而不要去崇拜偶像，也许就是这一想法促使伯爵以这个节日的名义去建立教堂。这种情况我们在历史上也可以看到。古罗马规定奉献节要举行隆重的庆祝，就是因为正是在奉献节期间那些有罪的和亵渎上帝的人们为酒神巴克科斯②举行庆祝仪式的缘故。也许这就是伯爵如此决定的眞实原因。

70

这座教堂是在普拉特科夫斯基任内落成的，可是落成后，直到1735年，由于没有大祭坛（因为当时没有造大祭坛的材料），这座

---

① 俄历2月2日为奉献节。——译者

② 巴克科斯（Bakchus），此处原文作 Бакх，应作 Вакх 或 Бахус，系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在希腊神话中称作狄俄尼索斯（Dionysos）。——译者

教堂每天只念几次时课经，以及追荐亡灵和祈祷仪式。

常供的圣像是从托博尔斯克运来的，但却是在基辅画的。其余的圣像则是先由中国画师画了些时日，后来又经1735年菲尔索夫商队中一个叫格列别什科夫的司祭和当时也在北京的一个叫维克托的人作了修改并最后完成。关于维克托及其作品以后还要谈到。还有一些圣经，大概早就有了。因为普拉特科夫斯基是从伊尔库次克而不是从莫斯科派来的，所以没有带书来，因此更多的时候是在尼古拉教堂举行祷告等仪式。修士大司祭几件最主要的祭服领子和领带都是用金线绣的。这都是1704年率领商队来的商务专员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伊斯托普尼科夫捐赠给尼古拉教堂的，同时还捐赠了一部用绘图纸印的福音书。这部书的封面还嵌有珐琅和各种颜色的玻璃（一位福音著者的十字架被当时代理修士大司祭拉夫连季看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该伊斯托普尼科夫还捐赠了若干口钟，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只剩下一两口和一个大盆。

教堂落成后，普拉特科夫斯基就开始向蒙古衙门要圣像，要和修士大司祭职位相称的祭服以及圣经、钟等物品。要五千两左右银子购置所有这些东西。另外还要给他打一枚镶嵌宝石的金戒指，所镶的宝石要值数百两银子。说没有这类物品，他作为修士大司祭就不能呆在那里。最后，帽子和权杖都要镶上金子和宝石，要闪闪发光。为此他被召到蒙古衙门去。当他到达蒙古衙门以后，就让他把一定要这么多银子的用场以及他穿哪种衣服才体面，一件件地向他们说清。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弄明白他的装饰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就让他把祭服、帽子及其他教堂用品都带到蒙古衙门去，而衣着则要带那些合乎修士大司祭品级的去。于是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祭服都拿去了。

附录一　俄汉译名对照表

一、人　名

Абрамович, Василий Кирилович　瓦西里·基里洛维奇·阿勃拉莫维奇，学生

Агафон　阿加方，俘虏

Агафонов, Алексей　阿列克谢·阿加福诺夫，学生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修士大司祭

Алексей　阿列克谢，修士司祭

Андрей　安德烈，教堂辅助人员

Антоний　安东尼，修士司祭

Аполлос　阿波洛斯，修士大司祭

Аркадий　阿尔卡季，修士司祭

Артемий (Ернеший)　阿尔捷米(叶尔涅希)，阿尔巴津首领

Афанасьев, Иосиф　约瑟夫·阿法纳西耶夫，教堂辅助人员

Базилевский, 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斯捷潘·伊万诺维奇·巴齐列夫斯基，医士

Бакшеев, Феодор　费奥多尔·巴克舍耶夫，学生

Баришников (Барышкин), Герасим　格拉西姆·巴里什尼科夫（巴雷什金），学生

Белецкий, Кир　基尔·别列茨基，教堂辅助人员

Белка, Феодор　费奥多尔·别尔卡，教堂辅助人员

Бичурин, Иакинф　雅金夫·比丘林，修士大司祭

Бобровников, Лаврентий　拉夫连季·鲍勃罗夫尼科夫，修道院院长

Богородский,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鲍戈罗茨基，教堂辅助人员

Бунге　邦格，杰尔普特大学教授，植物学家

Быков, Иван　伊万·贝科夫，学生

Вавила　瓦维拉，修士辅祭

Варлаам　瓦尔拉阿姆，修士司祭

Василье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喀山大学硕士

Владыкин, Алексей　阿列克谢·弗拉迪金，学生，后任商队总管

Владыкин, Антон　安东·弗拉迪金，学生

Власов　弗拉索夫，主管边境事务的官员

Воейков, Лука　卢卡·沃耶伊科夫，学生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教堂辅助人员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 Иосиф Павлович　约瑟夫·帕夫洛维奇·沃伊采霍夫斯基，医士

Врублевский, Иоиль　约伊利·弗鲁勃列夫斯基，修士司祭

Вяземский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Гавриил　加夫里伊尔，都主教

Гагарин　加加林，托博尔斯克省省长

Геннадий　根纳季，修士司祭

Гервасий　格尔瓦西，修士大司祭

Головин,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内大臣，尼布楚条约谈判俄方全权大使

Головкин, 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洛夫金，特命全权大使，伯爵

Гор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斯基，学生

Гошкевич, Иосиф　约瑟夫·戈什克维奇，学生

Грибовский, Софроний　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修士大司祭

Громов, Евграф　叶夫格拉夫·格罗莫夫，学生

Гумилевский, Филарет　菲拉列特·古米列夫斯基，主教

Гурий　古里，修士大司祭

Даниил　达尼伊尔，修士司祭

Данилов, Алексей　阿列克谢·达尼洛夫，教堂辅助人员

Дружинин, В. В.　德鲁任宁，帝俄考古学会书记

Дубиневич, Амвросий　阿姆夫罗西·杜比涅维奇，修士大司祭

Евлампий　叶夫拉姆皮，修士司祭

Елис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俄国女皇

Еразм　叶拉兹姆，主持司祭

Ермоген　叶尔莫根，修道院院长

Захаров, Иван Ильич　伊万·伊里奇·扎哈罗夫，学生

Зимайлов, Лев　列夫·齐马伊洛夫，学生

Зимин, Стефан　斯捷凡·齐明，教堂辅助人员

Иванов, Илья　伊利亚·伊万诺夫，教堂辅助人员

Иванов, Михайло　米哈伊洛·伊万诺夫，教堂辅助人员

Игнатий　伊格纳季，大主教

Игнатьев　伊格纳季耶夫，先是学生，后为1860年俄中续增条约的俄方全权代表

Игумнов,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伊古姆诺夫，学生，后任商队监护官

Иовлев (Иаковлев), Петр　彼得·约夫列夫(雅科夫列夫)，教堂辅助人员

Иессей　伊耶谢，修士司祭

Измайлов, Лев Васильевич　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伊兹马伊洛夫，彼得大帝时派往北京的使者

Израил　伊兹拉伊尔，修士辅祭

Илларион　伊拉里昂，修士辅祭

Иоанн　约翰，修士司祭

Иоасаф (Иосиф)　约阿萨夫(约瑟夫)，修士辅祭

Исакович, Нил　尼尔·伊萨科维奇，大主教

Иуст　尤斯特，司祭

Калмак, Петр　彼得·卡尔马克，教堂辅助人员

Каменский,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卡缅斯基，学生

Каменский Петр　彼得·卡缅斯基(即帕维尔·卡缅斯基，他削发为修士后，圣名为彼得)，修士大司祭

Карпилов (Корнилов), Феодор　费奥多尔·卡尔皮洛夫(科尔尼洛夫)，信使

Карпов, Созонт　索宗特·卡尔波夫，教堂辅助人员

Кафаров, Палладий　帕拉季·卡法罗夫，修士大司祭

Кирилов, Порфирий Евдокимович　波尔菲里·叶夫多基莫维奇·基里

洛夫，医士

Кличка　克利奇卡，伊尔库次克省省长

Клюсов, Никанор　尼卡诺尔·克柳索夫，教堂辅助人员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гор Петрович　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作家

Кованько,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万尼科，医士

Коняев (Копылов), Андрей　安德烈·科尼亚耶夫(科佩洛夫)，学生

Коркин, Яков　雅科夫·科尔金，学生

Корсалин　科尔萨林，画家

Косовский, Варлаам　瓦尔拉阿姆·科索夫斯基，都主教

Кропотов, Иван　伊万·克罗波托夫，信使

Круглополев, Карп　卡尔普·克鲁格洛波列夫，学生

Крымский, Кондрат Григорьевич　康德拉特·格里戈里耶维奇·克雷姆斯基，学生

Кузнецов, Иван　伊万·库兹涅佐夫，教堂辅助人员

Кульчицкий, Иннокентий　英诺森·库利奇茨基，主教

Кургинский (Караґинский), Козма　科兹马·库尔金斯基(卡拉金斯基)，教堂辅助人员

Курляндцов　库尔梁德佐夫，医士

Ладыженский　拉迪任斯基，托博尔斯克省省长

Лакровский, Маркел　马尔克尔·拉克罗夫斯基，学生

Ланг, Лоренц　劳伦茨·兰格，商队总管

Лёвшин, Платон　普拉顿·廖夫申，都主教

Легашёв, Антон Михайлович　安东·米哈伊洛维奇·列加绍夫，画家

Лежайский, Иларион　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修士大司祭

Леонтиев, Алексей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学生

Леонтьев, Максим　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司祭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Захар Федорович　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昂季耶夫斯基，学生

Лещинский, Филофей　菲洛费伊·列辛斯基，都主教

Либратовский, Герасим Кирилович　格拉西姆·基里洛维奇·利勃拉托夫斯基，商队总管

Линцевский, Гервасий　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修士大司祭

Липовцев, Стефан　斯捷凡·利波夫采夫，学生

Любим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柳比莫夫，亚洲司科长，商队总管，后任亚洲司司长，枢密大臣

Максим　马克西姆，司祭

Максимович, Иоанн　约翰·马克西莫维奇，托博尔斯克都主教

Малышев, Иван　伊万·马雷舍夫，学生

Мокрицкий, Ананий　阿纳尼·莫克里茨基，莫斯科神学院的句法教师

Морачевич, Вениамин　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修士大司祭

Налабардин　纳拉巴尔金，教堂辅助人员

Наталия Алексеевна　娜塔莉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公主

Нектарий　涅克塔里，修士辅祭

Немиров, Иннокентий　英诺森·涅米罗夫，修士大司祭

Немчинов　涅姆奇诺夫，信使

Нерунович, Иннокентий　英诺森·涅鲁诺维奇，主教

Нестор　涅斯托尔，教堂堂长

Нечае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涅恰耶夫，修士辅祭

Никифор　尼基弗尔，修士辅祭

Никон　尼康，教堂辅助人员

Новосёлов,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诺沃肖洛夫，学生

Обхов, Лаврентий Авдеевич　拉夫连季·阿夫杰耶维奇·奥布霍夫，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

Орлов, Иван　伊万·奥尔洛夫，教堂辅助人员

Павел　帕维尔，修士司祭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沙皇

Паломо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康斯坦丁·帕洛莫夫斯基，教堂辅助人员

Парышов, Алексей　阿列克谢·帕雷绍夫，学生

Перовский　佩罗夫斯基，商队监护官

Петров, Андрей　安德烈·彼得罗夫，教堂辅助人员

Петров, Семен　谢苗·彼得罗夫，信使

Пиль, Иван Алфирьевич　伊万·阿尔菲里耶维奇·皮利，西伯利亚总督

Платковский, Антоний 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修士大司祭

Платон 普拉顿，都主教

Плещеев 普列谢耶夫，伊尔库次克省副省长

Пономарёв, Михайло 米哈伊洛·波诺马廖夫，学生

Понтицкий, Арсений 阿尔谢尼·庞季茨基，基辅神学院修辞学教师

Попов, Алексей 阿列克谢·波波夫，学生

Путятин 普佳京(旧译普提雅廷)，伯爵，驻华使节

Пухорт, Иван 伊万·普霍尔特，学生

Разумов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拉祖莫夫斯基，公爵

Рафальский, Антоний 安东尼·拉法利斯基，都主教

Родионов, Петр 彼得·罗吉昂诺夫，教堂辅助人员

Розов, 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罗佐夫，教堂辅助人员

Россохин, Иларион 伊拉里昂·罗索欣，学生

Савва Владиславич 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伊利里亚伯爵，中俄恰克图界约谈判俄方全权大使

Савинов, Стефан 斯捷凡·萨维诺夫，信使

Салертовский, Егор 叶戈尔·萨列尔托夫斯基，学生

Семёнов, Кирил 基里尔·谢苗诺夫，教堂辅助人员

Серафим 谢拉菲姆，修士司祭

Сергий 谢尔基，修士辅祭

Сивиллов, Даниил 达尼伊尔·西维洛夫，修士司祭

Сильвестр 西尔威斯特，修士司祭

Сипаков, Михайло 米哈伊洛·西帕科夫，学生

Скачк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еянович 康斯坦丁·安德烈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修士辅祭

Сморжевский,Феодосий 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修士司祭

Соколовский, Семён 谢苗·索科洛夫斯基，教堂辅助人员

Соловьёв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Афанасий 阿法纳西·索洛维约夫(索科洛夫斯基)，信使

Сосницкий,Алексей Исакович 阿列克谢·伊萨科维奇·索斯尼茨基，教

堂辅助人员

Сперанский 斯佩兰斯基，西伯利亚总督

Стефан 斯捷凡，俘虏

Сычевский, Епифан Иванович 叶皮凡·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医士

Татарин 塔塔林，俘虏

Тата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еевич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塔塔林诺夫，医士

Тимковский, Егор Федорович 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季姆科夫斯基，商务专员

Тимофей 季莫费伊，修士大司祭

Толбузин, Алексей Ларионович 阿列克谢·拉里昂诺维奇·托尔布津，阿尔巴津军政长官

Третьяков, Стефан 斯捷凡·特列季雅科夫，教堂辅助人员

Третьяков, Феодор 费奥多尔·特列季雅科夫，学生

Трусов, Иларион 伊拉里昂·特鲁索夫，修士大司祭

Тугаринов, Поликарп 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修士大司祭

Уваров, Лаврентий 拉夫连季·乌瓦罗夫，修士司祭

Успен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乌斯平斯基，修士辅祭

Феодор 费奥多尔，俘虏

Феофилакт 费奥菲拉克特，修士司祭

Филимон 菲利蒙，修士辅祭

Филонов (Филимонов), Иван 伊万·菲洛诺夫(菲利莫诺夫)，学生

Филофей 菲洛费伊，都主教

Фукс 富克斯，普尔科沃天文台的天文学家

Храповицкий, Михаил Данилович 米哈伊尔·达尼洛维奇·赫拉波维茨基，医士

Худяков, Петр Иродионович 彼得·伊罗季昂诺维奇·胡佳科夫，商务专员

Цвет, Николай 尼古拉·茨维特，修士大司祭

Чеканов (Чаканов), Никита 尼基塔·切卡诺夫(恰卡诺夫)，学生

Черниковский, Никифор 尼基弗尔·切尔尼戈夫斯基，窃据我国雅克萨

城的俄国匪首

Чесной, Аввакум 阿瓦库姆·切斯诺伊，修士司祭

Чжут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伊万·伊万诺维奇·奇茹托夫，画家

Шаригин 沙里金，信使

Шихиров, Иван 伊万·希希罗夫，学生

Шишковский, Иоаким 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修士大司祭

Шокоров 绍科罗夫，学生，后为信使

Шульгин, Герасим 格拉西姆·舒利金，学生

Юматов, Амвросий 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修士大司祭

Яким 雅基姆，俘虏

Якут, Иларион 伊拉里昂·雅库特，教堂辅助人员

Якут, Яков 雅科夫·雅库特，教堂辅助人员

Яфицкий,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雅菲茨基，教堂辅助人员

二、书 刊 名

«Буддизм» «佛教»

（著者：Нил Исакович 尼尔·伊萨科维奇）

«Известие о Китайском, ныне манджуро-китай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关于中国（即今满清中国）的报导»

（著者：Софроний Грибовский 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ерархии» «俄国圣秩制度史»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Пекин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中国北京修道院简述»

（著者：Амвросий Дубиневич 阿姆夫罗西·杜比涅维奇）

«Об езуитах в Китае» «耶稣会教士在中国»

（著者：Феодосий Сморжевский 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俄国宗教文献一览»

（著者：Филарет Гумилевский 菲拉列特·古米列夫斯基）

«О начале торговых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и о заведении в Пекин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еркви и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俄中贸易和国事交往的早期情况及俄国教堂和传道团在北京的设立»

（著者：Спасский 斯帕斯基）

«Отец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雅金夫·比丘林神父»

（著者：Николай Адоратский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

«Подробное сведение об иезуитах» «关于耶稣会教士的详细资料»

（著者：Софроний Грибовский 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ё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东正教驻华传道团二百年»

（著者：Николай Адоратский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обеседник» «正教之友»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арх. Софрония Грибовского от Пекина до Кяхты в 1808 году»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1808年从北京到恰克图旅行记»

（著者：Софроний Грибовский 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中国旅行记»

（著者：Е. Ф. Тимковский 叶·费·季姆科夫斯基）

«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 «西伯利亚通报»

«Уведомление о начале бытия россиян в Пейдзине и 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в оном Грекороссийской веры» «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及北京之有俄罗斯希腊正教的情况报导»

（著者：Софроний Грибовский 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Чтения в И. обществе истории и древностей российских» «俄国皇家历史和文物学会会刊»

«Ярославские епархиа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и» «雅罗斯拉夫教区公报»

三、修道院、教堂名

Александро-Не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主显节修道院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主升天修道院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主复活修道院

Городе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戈罗杰茨修道院

Задо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扎顿斯克修道院

Знам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主显现修道院

Золотоверхо-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米哈伊尔金顶修道院

Иван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伊万修道院
Кижит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基日茨克修道院
Кирил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基里尔修道院
Кур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库尔斯克修道院
Молчанская Софрониева пустынь 莫洛昌斯克索夫罗尼小修道院
Монастырь во имя Спаса Всемилостивого 仁慈救世主修道院
Никольский церковь 尼古拉教堂
Новоспас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新救世主修道院
Печерская лавра① 佩切尔斯克大修道院
Посоль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使节修道院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主易圣容修道院
Се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塞夫斯克修道院
Сретенская церковь 奉献节教堂
Старорус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旧鲁萨修道院
Тихви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提赫文修道院
Толг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托勒格修道院
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я лавра 圣谢尔基三位一体大修道院
Трои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三位一体修道院
Успенская церковь 圣母安息教堂
Храм во имя Софии 索菲亚教堂
Храм во имя Успения Богоматери 圣母安息教堂
Церковь Воскресения Христова 主复活教堂
Югская пустынь 尤格小修道院

四、神职人员职称

Архидьякон 修士大辅祭
Архиепископ 大主教
Архимандрит 修士大司祭，掌院大司祭
Дьякон 辅祭
Епископ 主教

---

① 全称为：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ая лавра（基辅佩切尔斯克大修道院）。——译者

Игумент　主持司祭

Иеродьякон　修士辅祭

Иеромонах　修士司祭

Иподьякон　副辅祭

Коадьютор митрополита　副都主教

Митрополит　都主教

Обер-иеромонах　修士司祭长

Патриарх　牧首

Протодьякон　大辅祭

Протоиерей　大司祭

Протопресвитер　司祭长，首席司祭

Священник　司祭，神甫

Старший священник　首席司祭

附录二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第1—15届人员名单①

（包括学生及其他世俗人员）

第一届（1716—1729）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Иларион Лежайский）（1716年10月14日在北京去世。传道团团长一职暂缺。）

修士司祭　拉夫连季·乌瓦罗夫（Лаврентий Уваров）

修士辅祭　菲利蒙（Филимон）

教堂辅助人员　约瑟夫·阿法纳西耶夫（Иосиф Афанасьев）

彼得·卡尔马克（Петр Калмак）

尼卡诺尔·克柳索夫（Никанор Клюсов）

伊拉里昂·雅库特（Иларион Якут）

费奥多尔·别尔卡（Феодор Белка）

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缔结的当年即有三名学生来京：

卢卡·沃耶伊科夫（Лука Воейков）

伊万·普霍尔特（Иван Пухорт）

费奥多尔·特列季雅科夫（Феодор Третьяков）

第二届（1729—1736）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Антоний Платковский）

司祭　约翰（Иоанн）②

修士司祭　拉夫连季（上届留任）

修士辅祭　约阿萨夫（Иоасаф）

教堂辅助人员　纳拉巴尔金（Налабардин）

安德烈（Андрей）

---

① 这份名单是我们为了便于读者查考，根据本书所载的资料整理的。最后几届名单有些残缺不全，人名也与故宫所藏有关史料不尽相同，请予注意。——译者

②即伊万·菲利莫诺夫（Иван Филимонов）。——译者

学生　伊拉里昂·罗索欣 (Иларион Россохин)

格拉西姆·舒利金 (Герасим Шульгин)

米哈伊洛·波诺马廖夫 (Михайло Пономарёв)

第三届 (1736—1744)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伊拉里昂·特鲁索夫 (Иларион Трусов) (1736—1741，后因故遣返回国)

传道团代理团长、修士司祭

拉夫连季·鲍勃罗夫尼科夫　(Лаврентий　Бобровников) (1741—1744)

修士司祭　拉夫连季·乌瓦罗夫（上届留任，旋即回国）

安东尼 (Антоний)（此人在特鲁索夫抵京后随兰格返回俄国）

修士辅祭　约阿萨夫（上届留任）

教堂辅助人员　彼得·约夫列夫 (Петр Иовлев)，一作：雅科夫列夫 (Иаковлев)

彼得·卡缅斯基 (Петр Каменский)

雅科夫·雅库特 (Яков Якут)

米哈伊洛·伊万诺夫 (Михайло Иванов)

1732年来京的学生　格拉西姆·巴里什尼科夫 (Герасим Баришников)，一作：巴雷什金 (Барышкин)

阿列克谢·弗拉迪金 (Алексей Владыкин)

伊万·希希罗夫 (Иван Шихиров)

伊万·贝科夫 (Иван Быков)

1743年来京的学生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 (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иев)

安德烈·科尼亚耶夫 (Андрей Коняев)，一作：科佩洛夫 (Копылов)

尼基塔·切卡诺夫 (Никита Чеканов)，一作：恰卡诺夫 (Чаканов)

第四届（1745—1755）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Гервасий Линцевский）

修士司祭　约伊利·弗鲁勃列夫斯基（Иоиль Врублевский）

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Феодосий Сморжевский）

修士辅祭　约阿萨夫（上届留任）

教堂辅助人员　索宗特·卡尔波夫（Созонт Карпов）

基尔·别列茨基（Кир Белецкий）

基里尔·谢苗诺夫（Кирил Семёнов）

斯捷凡·特列季雅科夫（Стефан Третьяков）

伊万·库兹涅佐夫（Иван Кузнецов）

第五届（1754—1771）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Амвросий Юматов）

修士司祭　西尔威斯特（Сильвестр）

索夫罗尼（Софроний）

修士辅祭　谢尔基（Сергий）

教堂辅助人员　斯捷凡·齐明（Стефан Зимин）

伊利亚·伊万诺夫（Илья Иванов）

阿列克谢·达尼罗夫（Алексей Данилов）

注：本届没有学生。

第六届（1772—1781）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尼古拉·茨维特（Николай Цвет）

司祭　尤斯特（Иуст）

约翰·普罗托波波夫（Иоанн Протопопов）

修士辅祭　尼基弗尔（Никифор）

教堂辅助人员　彼得·罗吉昂诺夫（Петр Родионов）

尼康（Никон）

学生　费奥多尔·巴克舍耶夫 (Феодор Бакшеев)

阿列克谢·帕雷绍夫 (Алексей Парышов)

雅科夫·科尔金 (Яков Коргин)

阿列克谢·阿加福诺夫 (Алексей Агафонов)

第七届 (1781—1795)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 (Иоаким Шишковский)

修士司祭　安东尼 (Антоний)

阿列克谢 (Алексей)

修士辅祭　伊兹拉伊尔 (Израил)

教堂辅助人员　伊万·奥尔洛夫 (Иван Орлов)

谢苗·索科洛夫斯基 (Семён Соколовский)

学生　叶戈尔·萨列尔托夫斯基 (Егор Салертовский)

安东·弗拉迪金 (Антон Владыкин)

伊万·菲洛诺夫 (Иван Филонов), 一作: 菲利莫洛夫 (Филимонов)

阿列克谢·波波夫 (Алексей Попов)

第八届 (1795①—1808)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Софроний Грибовский)

修士司祭　伊耶谢 (Иесей)

瓦尔拉阿姆 (Варлаам)

修士辅祭　瓦维拉 (Вавила)

教堂辅助人员　科兹马·库尔金斯基 (Козма Кургинский), 一作: 卡拉金斯基 (Карагинский)

瓦西里·鲍戈罗茨基 (Василий Богородский)

学生　帕维尔·卡缅斯基 (Павел Каменский)

卡尔普·克鲁格洛波列夫 (Карп Круглополев)

---

① 本书原作 1794 年，系任命日期。按索夫罗尼于 1795 年 11 月 27 日到京，本表以到京日期为准。——译者

瓦西里·诺沃肖洛夫 (Василий Новосёлов)
斯捷凡·利波夫佐夫 (Стефан Липовцев)
伊万·马雷舍夫 (Иван Малышев)

第九届 (1808—1821)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雅金夫·比丘林 (Якинф Бичурин)
修士司祭 阿尔卡季 (Аркадий)
谢拉菲姆 (Серафим)
修士辅祭 涅克塔里 (Нектарий)
教堂辅助人员 瓦西里·雅菲茨基 (Василий Яфицкий)
康斯坦丁·帕洛莫夫斯基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ломовский)
学生 马尔克尔·拉克罗夫斯基 (Маркел Лакровский)
列夫·齐马伊洛夫 (Лев Зимайлов)
米哈伊洛·西帕科夫 (Михайло Сипаков)
叶夫格拉夫·格罗莫夫 (Евграф Громов)

第十届 (1821—1831)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彼得·卡缅斯基 (Петр Каменский) (即第八届学生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卡缅斯基,削发为修士后,圣名为彼得)
修士司祭 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 (Ве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
达尼伊尔·西维洛夫 (Даниил Сивиллов)
修士辅祭 伊兹拉伊尔 (Израил)
教堂辅助人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阿列克谢·伊萨科维奇·索斯尼茨基(Алексей Исакович Сосницкий)
学生 康德拉特·格里戈里耶维奇·克雷姆斯基 (Кондрат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Крымский)

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昂季耶夫斯基(Захар Федорович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瓦西里·基里洛维奇·阿勃拉莫维奇 (Василий Кирил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

医士 约瑟夫·帕夫洛维奇·沃伊采霍夫斯基 (Иосиф Павлович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

第十一届 (1831—1840)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 (Ве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 (上届修士司祭)

修士司祭 阿瓦库姆·切斯诺伊 (Аввакум Чесной)

费奥菲拉克特 (Феофилакт)

修士辅祭 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 (Поликарп Тугаринов)

教堂辅助人员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罗佐夫 (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Розов)

世俗人员:

医士 波尔菲里·叶夫多基莫维奇·基里洛夫 (Порфирий Евдокимович Кирилов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万尼科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Кованько)

库尔梁德佐夫 (Курляндцов)

叶皮凡·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 (Епифан Иванович-Сычевский)

画家 安东·米哈伊洛维奇·列加绍夫 (Анто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егашёв)

第十二届 (1840—1849)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 (Поликарп Тугаринов) (上届修士辅祭)

修士司祭 英诺森·涅米罗夫 (Иннокентий Немиров)

古里 (Гурий)

修士辅祭　帕拉季·卡法罗夫 (Пал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

学生　约瑟夫·戈什克维奇 (Иосиф Гошкевич)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斯基 (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рский)

伊万·伊里奇·扎哈罗夫 (Иван Ильич Захаров)

世俗人员:

医士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塔塔林诺夫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еевич Татаринов)

画家　科尔萨林 (Корсалин)①

硕士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第十三届 (1849—1859)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帕拉季·卡法罗夫 (Пал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 (上届修士辅祭)

修士司祭　叶夫拉姆皮 (Евлампий)

帕维尔 (Павел)

修士辅祭　伊拉里昂 (Илларион)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乌斯平斯基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Успенский)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涅恰耶夫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Нечаев)

康斯坦丁·安德烈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ея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世俗人员:

医士　斯捷潘·伊万诺维奇·巴齐列夫斯基 (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Базилевский)

米哈伊尔·达尼洛维奇·赫拉波维茨基 (Михаил Данилович Храповицкий)

画家　伊万·伊万诺维奇·奇茹托夫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Чжу-

① 此人名叫康德拉特(Кондрат)。——译者

тов)

第十四届（1860—1865）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古里（Гурий）（第十二届修士司祭）

第十五届（1865—？　）

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

帕拉季·卡法罗夫（Пал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第十三届修士大司祭）